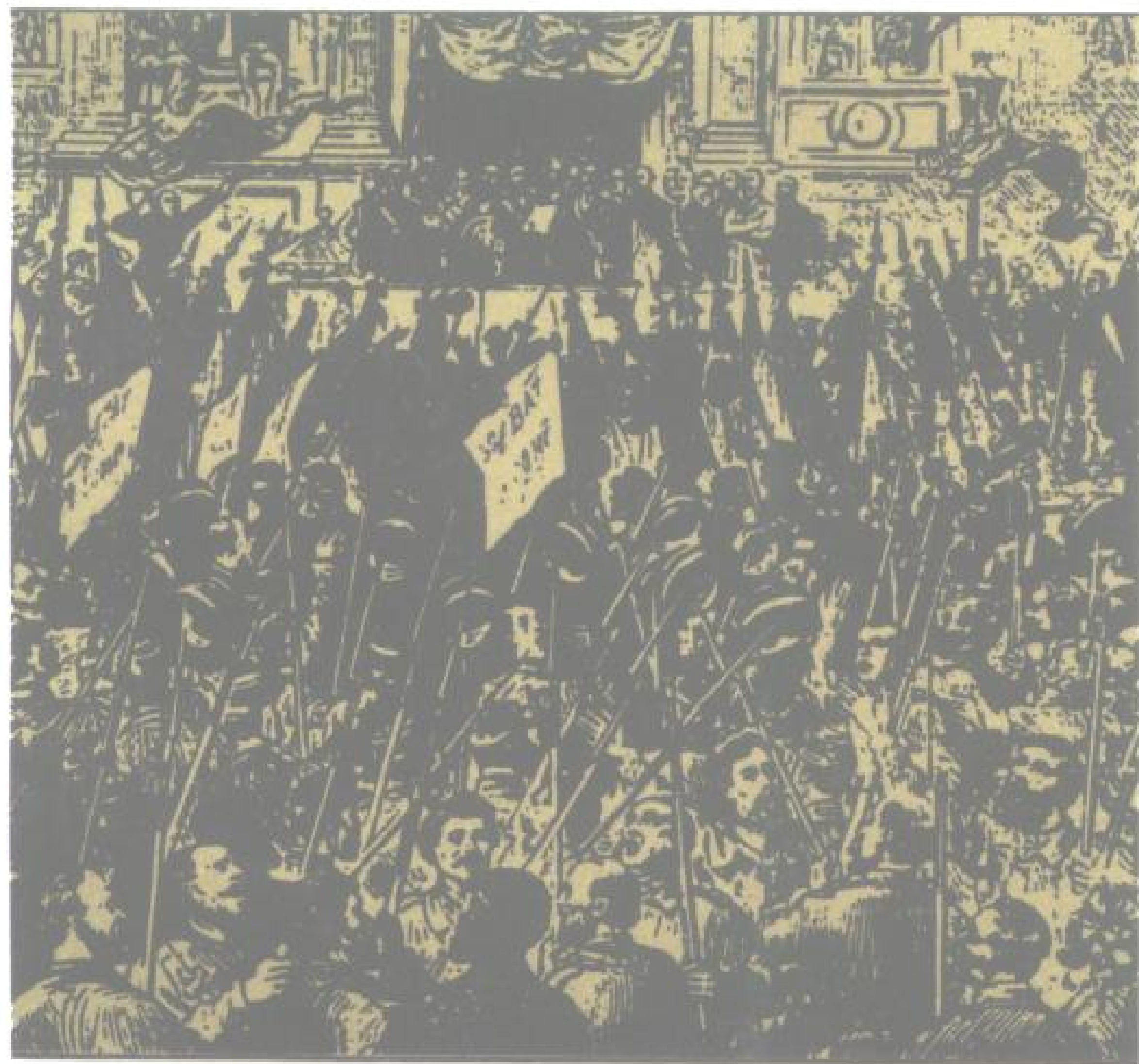


法國社會主義簡史

(法) 克洛德·維拉尔 著

曹松豪 译



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

前 言

本书作者克洛德·维拉尔（Claude Willard）系巴黎第八大学教授、法国“巴黎公社之友协会”主席、颇有名望的现代史学家。他的著述甚丰。1986年克洛德·维拉尔教授应邀来我国访问、讲学。应法国共产党中央的请求，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李淑铮同志会见了。我和一些研究法国和国际共运问题的学者，与维拉尔教授就法国共运和国际共运的理论、历史和现实问题进行了座谈。维拉尔教授把他的几部主要代表作赠送给我。这里，曹松豪同志把其中的《法国社会主义简史》的中译本奉献给大家，以飨读者。

法国是欧洲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法兰西民族在历史上创造了灿烂的文化。雨果、司汤达、巴尔扎克和莫泊桑的著作是中国人民喜爱的。法兰西民族是一个富有革命传统的民族。法国的资产阶级大革命是最深刻最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它震撼并唤醒了当时的欧洲乃至世界。法国曾单独领导过资产阶级的世界革命，它在1789年至1798年间的资产阶级大革命中所起的作用，不仅是首倡者，而且是领导者。巴黎曾被认为是世界的首都和文明的中心。特别是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伏尔泰、孟德斯鸠和卢梭等的思想和著述影响是广泛和深远的。

本书作者称法国是社会主义的主要发祥地，是社会主义

的故乡。这是有其根据的。作为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直接来源是空想社会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的三位大师中，有两位是法国人，即昂利·圣西门和沙尔·傅利叶。法国真可以说是各类社会主义应有尽有。空想共产主义的代表人物有摩莱里、加布里埃尔·马布利、格拉右·巴贝夫、埃蒂耶纳·卡贝和布朗基；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庸俗的社会主义代表人物有蒲鲁东和路易·勃朗；基督教的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有拉梅耐、毕舍；不伦不类的折衷的社会主义代表人物有勒鲁、孔西德朗；……空想社会主义严厉地抨击了资本主义的腐朽统治，提出必须改造它并建立理想的新制度的主张，为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提供了许多宝贵的思想材料。空想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有着重要作用。

法国的无产阶级继承和发扬了法兰西民族的光荣传统，还在它未成为一个独立的阶级的时候，就是法国的第三等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和资产阶级一道从封建统治者手中争得了民主和自由，但是其成果为新兴的资产阶级所独占。新生的工人阶级不得不开展独立的斗争。1831年里昂工人为要求增加工资而斗争，被市政当局拒绝并遭军警镇压。这些纺织工人被迫拿起武器举行起义，经过三天浴血奋战，工人终于控制整个城市达10天之久。1834年里昂工人为反对政府颁布的禁止工人集会结社的法令再次起义，这次起义提出了“建立共和国”的政治口号。起义又一次遭到政府镇压，造成340多人死亡。这两次起义是世界历史上最早的工人武装起义。它标志着法国工人已经走上了独立的政治斗争的道路，法国工人站到了欧洲工人也是世界工人斗争的最前列，揭开了工人运动史的新篇章。法国无产阶级在1848—1849年的席卷欧洲

大陆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成为了主力军。在1848年的二月革命中,工人从总罢工发展到武装起义,推翻了奥尔良王朝并使第二共和国建立。同年6月由于资产阶级剥夺了工人阶级在二月革命中争得的利益,巴黎无产阶级发动了直接针对资产阶级的武装起义,提出了建立“民主与社会共和国”的口号。这次巴黎的大规模起义,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大对立阶级间的第一次伟大战斗。高喊“自由、平等、博爱”的资产阶级对起义的工人进行野蛮而残忍的镇压,卡芬雅克枪杀了1万1千余名工人,逮捕、流放、判刑者共约3万人。马克思对此评论说,“这就是博爱,就是一方剥削另一方的那些互相对立的阶级之间的博爱”;“博爱只有在资产阶级利益还和无产阶级利益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才继续存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61页)

1848年欧洲大陆革命失败后,欧洲一片白色恐怖,工人运动转入低潮,长期处于沉寂状态。随着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导言》和《资本论》第1卷的问世,科学社会主义最终确立起来,并在工人中得到理解和迅速广泛传播,工人运动又逐渐兴起,并于1864年创立了国际工人协会即第一国际。1871年3月18日巴黎工人阶级又一次举行武装起义。这是19世纪最大的一次革命,是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第一次伟大的尝试。起义后建立的巴黎公社坚持了72天。恩格斯说,最光荣和最富悲剧性的巴黎公社,是工人阶级有自己的历史以来第一次在一个作为首都的大城市中掌握了政权。工人第一次选举自己的政府。公社失败,近3万名公社社员被杀害,3万8千5百余人被捕。被杀、被关和逃亡者的总数在10万人以上,约占当时巴黎男性工人的四分之一。在第一个发表《人权与公民权宣言》的国度里,资产阶级就是这样对

待无产阶级的“自由、民主和人权”的。

巴黎公社失败后，法国和国际工人运动又遇到挫折转入低潮，为了解决面临的纷繁而复杂的问题和严峻的挑战，为了粉碎社会主义敌人的攻击，马克思及时地写了《法兰西内战》一书，总结了公社的成败和经验教训。为了统一思想，团结队伍，迎接挑战，为新高潮的到来做理论上的准备，马克思恩格斯在总结公社经验教训的同时，更加深入地进行艰苦的理论探索和系统地阐明他们已经探明的理论，以恩格斯为主写了《反杜林论》这部继《资本论》之后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文献，全面、系统地阐述并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公社失败后，在一些人看来，社会主义已经淹死在血泊之中，无产阶级不是被埋葬了，也已经注定要永远受奴役了。维拉尔在他的书中提到早在1854年，路易·雷博就宣称“社会主义已经死亡；现在来评说社会主义就是为它致悼词。”巴黎公社失败后，反动头子梯也尔又说，“社会主义这些词已经在我国永远被埋葬了。”恩格斯针锋相对地指出，“恰恰相反，无产阶级最强有力的进展，是从公社和普法战争的时候开始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600页）1879年，法国的社会主义者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创建了法国无产阶级的第一个政党——法国工人党，到1889年该党拥有1万6千余名党员，成为当时国际工人运动中仅次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第二大党。领导法国工人阶级进行斗争，并于1889年，在恩格斯的帮助下召开国际社会党人代表大会，即后来称之为第二国际的第一次代表大会。1901年在工人党的倡议下布朗基派和一些地方联合会联合成立法兰西社会党。1905年两个社会党合并，成立“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即法国统一社会党

拥有党员近3万5千人。后来，法国社会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同第二国际的党一样发生蜕变，右派公开站在社会沙文主义立场。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法国社会党左派党决定加入共产国际，宣布成立法国共产党。党成立后队伍不断扩大，1936年党员达到28万人。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德军占领法国，共产党被取缔、党的报刊被封、党员遭到追捕，党的力量被削弱，但是党没有被消灭，它是法国内抵抗运动中唯一一支有组织的政治力量。共产党人的大无畏的牺牲精神，赢得了人民的信任和支持。1946年党员达80余万人，是法国的第一大党。

历史是一种文化，又是一面镜子。恩格斯说：“历史上常常有惊人的相似之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91页）这几年来，国际上发生了一些令人目眩神迷的事件，特别是东欧国家的演变和苏联的衰落解体，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到巨大损失和严重挫折，处于战后的最低点，面临严峻的挑战。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兴高采烈，得意猖狂。“共产主义已经失败”、“马克思主义一去不复返”、“历史的终结”就将到来，1999年就会“不战而胜”之类的叫喊甚嚣尘上。当前法国的社会主义运动也处在极大的困难之中，有人说，“社会主义在法国，在世界将从地图上消失”。维拉尔教授在《中译本序言》中指出，目前法国共产党“陷入了极困难的境地”，“但它却继续保持着强大的斗争活力”，并“试图开辟新的前景”。法国共产党坚持在共产党的旗帜下开展活动和斗争。法国无产阶级经过长期艰苦的工作和斗争，社会主义运动在法国重新得到发展和壮大是毫无疑问的。

社会主义事业和共产主义运动同其他事物一样，都是在

曲折发展壮大的。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是本世纪最伟大的社会实践。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初期的发展是很迅速的，并发展到了相当的程度，又取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战后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一系列国家也都曾有过经济高速增长、政治安定团结、国家欣欣向荣的时期。与此同时，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危机接连发生，社会动荡，政局不稳。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尽管总体力量对比还不如资本主义，但是它所呈现的优越性、影响力和声望都曾旧制度所不能比拟的。一些原来的殖民地国家在获得独立后也纷纷宣布要搞社会主义，而拒绝资本主义。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经过一段高速发展之后，在前进的道路上出现了这样或那样的失误，特别是没有集中力量搞好经济建设，发展社会生产力，对科技革命没有给予应有重视，导致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没有得到应有的发挥。而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在某些方面采取改良和调整措施，利用最新科学技术，创造了大量社会财富。统治者也拿出一部分钱来提高人民生活。这就致使社会主义国家与西方发达国家经济科技发展水平及人民生活水平开始缩小的差距又拉大。这导致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人特别是其领导人的马克思主义信念和社会主义信念动摇，从而采取一些错误的政策，结果发生了这次巨大的挫折。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的这次挫折，不是科学社会主义的过错，而恰恰是违背马克思主义原理、放弃了社会主义道路的结果。社会历史发展本来就是曲折前进的。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是一种新的剥削制度取代一种旧的剥削制度，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发生过多次复辟和反复辟斗争，有些国家至今尚保留着封建的遗迹——如国王或女皇。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是一种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全新的社会制度代替一切剥削

压迫的旧制度，其难度更大。在这个历史长河中出现一些曲折甚至是严重的挫折是一种很自然的现象，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如前所述，世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在历史上发生过多次曲折，但它不仅没有被消灭，反而规模越来越大。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趋势绝不会因为这次挫折，更不会因为敌视社会主义势力的咒骂而改变。资本主义制度所固有的矛盾是它自身所无法解决的。只要资本剥削劳动的现实存在，剩余价值的生产及其规律决定了的资本主义的历史地位和命运就是不可改变的。资本主义必然要为一个更高的、更合理的、更公平的社会形态所取代。资本主义社会绝不会是人类“历史的终结”。人类社会历史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是永无止境的。

维拉尔教授的《法国社会主义简史》是一部有价值的严肃的学术专著。全书共三卷十二章，约10余万字。第1卷分析马克思主义以前法国的社会主义思想；第2卷介绍第一国际解散以后从法国工人党产生到第三国际成立这一时期法国的各社会主义流派；第3卷概述1920年法国共产党诞生至1978年间法国的社会主义运动。作者深入浅出，在对大量史料研究的基础上，经过审慎的加工，仅用10余万字的篇幅就完整地勾画了法国社会主义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历史的全貌；对从空想社会主义以来法国各社会主义流派的基本观点、理论主张、思想体系都做了介绍，对它们之间争论的过程、发展演变的线索、差异缺陷、是非功过都有评述。有史有论，史论结合，有史实，有观点，有分析，有对比，有考证。作者不论是叙述历史事件，还是介绍人物思想；不论是阐述各社会主义派别的产生及兴衰成败，还是分析各派别之间和各派内部论争、分化、组合都力求全面公正。该书结构严

谨，体系完整，纲目有序。通读全书，对法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的来龙去脉就会有一个清晰的总印象。进一步体味，我们可以了解法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规律性和法国无产阶级历经磨难、百折不挠、愈挫愈奋的斗争精神和光荣传统。

在当今的形势下，维拉尔教授的《法国社会主义简史》的中译本的出版，不仅有学术价值，而且有着现实意义。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此书不失为一种卓识之举。

应译者的盛情，写了这些话，有不妥之处，敬请指正。

郭庆仕

1992年1月30日

中译本序言

1986年秋，我曾在杭州大学讲学数周。当我感觉到杭大的中国教员和大学生们对法国史，特别是对法国工人运动史兴趣浓厚时，我的心情是欣喜若狂的。中国的教员和大学生之所以兴趣浓厚，多半是因为法兰西这个“阶级斗争的典型国家”曾经爆发过18世纪和19世纪的革命，是社会主义的主要发祥地之一。

诚然，本书出版于1978年。但时至今日，当年所写的每字每句我都不作改动。随着历史的演变，当年已经觉察到的一些现象有了迅速的发展。社会民主主义道路导致资本主义的管理，以及社会不公的爆炸性局势（1981至1991年的“密特朗年代”），已经有点变为现实。法国共产党则陷入了极其困难的境地（尤其是伴随着东欧国家的社会主义崩溃和苏联改革的艰难），因而未能为社会变革展示出一幅令人可信的前景；但它却继续保持着强大的斗争活力。不仅如此，而且在整个左翼内部，都在开展更多的思考、探索、辩论和会晤活动，试图开辟新的前景。这是因为，资本主义（尽管有人低估其适应和变化能力）因其追逐利润的目的和对人力物力的浪费，是不符合人类的需要和愿望的。法兰西具有人民的革命和民主的丰富遗产，正在探索其后资本主义道路。当然，历史学家不是先知先觉……

最后，希望这个中译本为发展法中两国的文化关系，促

目 录

前 言	郭庆任
中译本序言	克洛德·维拉尔
第一卷 马克思主义以前的社会主义	(1)
第一章 社会主义的诞生地法国	(1)
法国社会主义诞生的思想根源(2) 机器时代的曙光 (4)	
第二章 王朝复辟时期：社会主义含苞待放	(8)
圣西门(1760—1825年)(8) 夏尔·傅立叶(1772—1837年)(11)	
第三章 七月王朝时期：社会主义繁花如锦	(15)
缺乏思想指导的工人运动	(15)
社会主义(16) 圣西门派和傅立叶派(16) 基督教社会主义(18) 路易·勃朗(1811—1882年)(19) 皮埃尔·约瑟夫·蒲鲁东(1809—1865年)(19) 共产主义(22) 埃蒂耶纳·卡贝(1788—1856年)和伊卡里亚人(23) 革命的共产主义者和奥古斯特·布朗基(1805—1881年)(24) 几点结论(28)	
第四章 1848—1871年期间：“思想的低潮，工运的高潮”	(31)
同第二共和国现实对立的空想社会主义(31)	
在第二帝国时期发生的变化(35) 巴黎公社：	

“冲天的精神”(41)

第二卷 从对立的宗派到统一的政党…………… (44)

第五章 四分五裂的社会主义…………… (44)

社会主义的复苏(44) 法国社会主义分裂的原因(46) 法国工人党(盖德派)(48) 中央革命委员会(布朗基派)(54) 社会主义工人联合会(布鲁斯派)(58) 革命的社会主义工人党(阿勒马派)(61) 无政府主义派(64) 独立社会主义派和饶勒斯(68) 走向“社会主义统一的金色太阳”(饶勒斯语)(74)

第六章 统一的社会主义…………… (76)

1905年至1914年期间的工人国际法国支部…………… (76)

革命的社会主义表面上取胜(76) 工人国际法国支部的组织结构(77) 社会主义力量的增长(78) “革命主义者”派(80) 改良和革命(81) 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和工会组织(82) 反对战争(84)

震撼世界的战争和革命…………… (86)

神圣团结(86) 支持战争,还是反对战争(1914—1916年)(88) 1917年的危机(91) 支持参加第三国际,还是反对参加第三国际(92)

第三卷 旧大厦和新大厦…………… (99)

第七章 走向一个新型的党…………… (99)

法国共产党诞生的特殊条件(99) 牙牙学语的童年时代(100) 艰难的学徒期:“布尔什维克化”(102) 幼稚病(105)

第八章	忠于“旧大厦”	(108)
	首先是要重建(108) 工人国际法国支部的学说(同共产党的学说相对照)(109) 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进行自相残杀战争(114) 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党内的派别斗争(115)	
第九章	美好而短暂的春天：人民阵线	(117)
	历史背景的变化(117) 改变了角色(118) 拉开了序幕(121) 1936年4、5月间举行的大选(124) 1936年5、6月间举行的罢工(127) 胜利的收获季节(129) 人民阵线的瓦解(131)	
第十章	战争的考验	(135)
	“奇怪的战争”(135) 抵抗斗争时期的共产党(137) 工人国际法国支部的复活(140)	
第十一章	从第四共和国到第五共和国	(143)
	法国解放后出现的高潮(1944—1947年)(143) 不和、争执与低潮(1947—1962年)(148) 难于驱除的魔鬼(1962—1965年)(153) 开始出现了统一的势头(1965—1967年)(154) 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和法国共产党的基层组织情况(154) 1968年5、6月间的火热斗争周(157)	
第十二章	左翼联盟	(160)
	共产党和社会党的演变(160) 左翼联盟(161) 法国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162) 左翼联盟的危机和挫折(163)	
附件一：	1945年至1978年期间议会选举结果	(166)

附件二：1978年议会选举情况	(168)
参考书目	(170)
译后记	(173)

第一卷

马克思主义以前的社会主义

第一章 社会主义的诞生地法国

社会主义一词（“Socialisme”）是一位名不见经传的意大利作家吉尤拉尼于1803年发明创造的，但它一开始却并未引起世人的注意。在法国，好象到了1831年，社会主义才首次出现在一家名字带有预见性的耶稣教日报《播种者》上。1832年2月和1833年4月，“社会主义者”的机关报——圣西门派的《环球》和傅立叶派的《法伦斯泰尔》先后使用过社会主义一词；自诩发明这个新词的皮埃尔·勒鲁充其量也只是在1834年再造此词。

但“社会主义”最初采用的涵义仅仅是一个与个人主义相对立的道德观念。只是到了19世纪40年代，社会主义才具有该词的现代涵义，虽然这种现代涵义当时还模糊不清。

不管怎样，社会主义一词的诞生早于对它的命名。

法国是培育社会主义的土壤。马克思主义以前的社会主义如同种类繁多、根深叶茂的植物一样，在法兰西的国土上发芽、生长。唯独欧文主义作为社会主义的一大变种，是在异国他乡成熟起来的。为什么法国的天时地理是那样适合社会主义的生长呢？

看来有必要回溯一下遥远的历史年代。在法国，封建社会和绝对君主制曾先后具有完美、颇具典型的特点，这种特点难道不能说明资产阶级面对任何妥协和改良办法都不可避免地遭到挫折。被迫斗争到底的历史事实吗？首先是资产阶级进行的思想斗争，诞生了18世纪的哲学；其次是资产阶级进行的社会和政治革命；同法国和欧洲的封建制度进行的殊死斗争使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变得必不可少，因而使这场革命具有激进民主主义的、民主的特点。

法国的社会主义扎根于18世纪的革命传统和社会思潮，但它只是在适当的时节，即在复辟和七月王朝时期，经济和社会形势促使经济矛盾和社会对抗变得更加尖锐的时候，才破土而出、生长和分枝的。

法国社会主义诞生的思想根源

启蒙运动时期的哲学继承了笛卡儿主义，披荆斩棘，开辟了前进的道路。

18世纪的哲学家们批判权威、传统及现有的秩序——宗教、道德、经济组织、社会组织 and 政治组织，将它们送上了理智和批判精神的法庭。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反映了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乐观主义，重新发现了伟大的运动法则，歌颂了他们对人的信任，表明了他们对进步的信仰，将文艺复兴以来被遗忘已久的、关于幸福的主导思想再次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重农主义和伦理主义这两种思潮对社会主义后来的发展产生了特殊的影响。重农主义者提出了经济问题，并且首次对资本主义生产进行了分析，虽然这种分析还很不完全。伦理主义者卢梭、马布利、摩莱里则从正义和平等的观念出发，关心社会财富的分配问题，激烈地抨击私有制是压迫人

类的万恶之源。由于无法重返原始公社的黄金时代，平民卢梭鼓吹平均地权，并声称准备将技术进步供奉到平等的祭坛上去。摩莱里对原始社会也具有田园诗般的看法，因而得出了共产主义这个象链条一样把莫尔、康巴内拉和梅斯利埃同巴贝夫连结在一起的结论。

人民群众在大革命时期，为捍卫其更好生活的权利、幸福的权利而战，为实现卢梭关于建立一个平等共和国的幻想而战；而且直到1802年，还使大革命登上了走向政治民主乃至社会民主的阶梯。这种成功是不稳固的，昙花一现的。历史的演变最终要谴责这些独立的小生产者，因为他们无法解决自己的矛盾。一方面，他们尊重财产那种神圣不可侵犯、不受时效约束的特点；另一方面，他们想要对生产和获利的自由加以限制，阻止资本的集中。那么，怎样来调和这两者呢？巴贝夫试图解决这个矛盾，认为只要使“财产和产品”共同所有，就能建立生活的平等，建立真正的社会和政治民主。这是否是一种在饥饿折磨“空腹”的阶段里想象出来的“节衣缩食的社会主义”(E·拉布罗斯语)呢？这是否是一座建造在沙滩上的共产主义城堡（因为它不是依靠未来的经济，而是想要永远保持陈旧的生产方法）呢？苏联历史学家达利纳则摒弃这种对巴贝夫主义的传统解释，坚持认为巴贝夫主义具有“现代性”。他从巴贝夫在1786年6月草拟的一封信稿出发，断言从此时起，巴贝夫已经预感到建立劳动的集体组织、生产的共产主义的必要性。但后来(也许出于对效率的考虑)，巴贝夫不再重提这个基本问题。

这场辩论并没有结束。不管怎样，“人人平等的社会”是第一个没有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的社会秩序、没有对抗阶

级社会的雏形。它预示着一个新的1789年，一个工人的1789年的到来。

机器时代的曙光

法国大革命摧毁了行会的束缚、手工制造业的特权，由此建立了企业的自由，这就为新的生产力的飞跃发展和自由竞争开辟了道路。但这种变化很慢，比当时业已明显进入机器时代的英国还要缓慢得多。

蒸汽机在法国工业中的应用只是一些个别现象。1820年有65台，1830年底有625台。棉纺厂作为机械化程度最高的部门，主要还使用水力发动机：靠水的落差来推动叶片轮；许多棉纺厂的织机一直靠老式的牛马转车盘来推动；手工纺织还继续存在，尤其是在农村。简陋的冶铁业还使用原始的技术。在西班牙的卡塔卢尼亚地区，低矮的炉子使炼铁工业保留着家庭手工业的方式；而那些高炉也往往用木头来炼铁，焦炭用得很少。

在古老的生产结构——手工作坊和地点分散的小工厂——远远压倒现代生产方式的工业部门里，是不可能存在清一色的工人阶级的。手工业者拼命地抓住其作坊、织机的财产（即使名义上的财产也罢），抓住其或多或少相对的独立性不放。手工业工人是比较有文化和较高工资的熟练工人，他们为新兴的工人运动输送了大部分干部，并组成了基本队伍。但由于他们的劳动条件本身，由于作坊里弥漫的家长制气氛，在雇佣劳动者和雇主之间形成了某种利害一致的关系。家庭劳动者处于孤立的状态，象手足被缚一样受到雇主随心所欲的摆布，因而对悲惨的生活条件不堪重负。产业工人即无产者，他们往往是一些离乡背井的人，难于同城市生活打

成一片的。学徒期速成后进了工场的乡巴佬，是机器的奴隶，受到严酷的劳动法规的束缚，工资低，营养差，随时都会失业和患病。

这样，工人们为了工业革命的完成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他们也为经济形势的好转付出了代价。经过1726至1817年百年的物价上涨，1817至1850年期间的物价呈现出下降的趋向。雇主通过增加劳动数量，获得更大的关税保护，以及压低工人工资来维持乃至增加其利润。随着生活费用的提高（5%至10%），工人的实际工资下降了，在实行机械化的行业中尤其如此；随着雇用妇女儿童做工，就业不足的现象作为机械化带来的后果加剧了，在经济发生周期性的危机时尤其如此。

关于工人在生理和精神上所处的悲惨境地，有许许多多证据，其中大多数是在1830年之后的证据。

有人在里尔的地下室里，
在石头天花板底下死亡……
是他们的痛苦变成了你们的财富，
工业大王！”

——维克托·雨果《天罚集》

自由派经济学家阿道夫·布朗基是这样重现里尔市郊的一个纺织工人的家庭开支的。“这个有4个孩子的工人一天挣两个法郎，当花边工的妻子一天挣10至15个生丁。全家每周吃24公斤面包，以1公斤面包22个生丁的价格计算，开支5法郎40生丁；每周吃3顿肉杂碎，75个生丁；黄油、废糖蜜或水果，1法郎30生丁。3米长的一间地下室，房租为1法郎50生丁；煤，1法郎35生丁。肥皂和照明费，1法郎10生丁。共计每周开支12法郎75生丁。救济署每两周发给这个工人3

公斤面包；发给他孩子一两件内衣。”工人说：“尽管有这种照顾，尽管我们上班干活（否则我们就会衣不蔽体），但我们却过着乞丐一样的生活，而法律禁止沿街乞讨。”

加塞大夫指出，“在里尔，在皇家街不满5岁的孩子中，3个里就有1个夭折，而在埃达克街^①，我们看到48个初生婴儿里有46个死亡。但愿此后，有人来同我们谈谈死亡面前人人平等的问题。”昂热·盖宾大夫还指出，“在南特，工人的孩子被抚养成人的，平均连四分之一都不到。”

在这种贫困的后面，伤风败俗、酗酒、妇女卖淫、犯罪接踵而来。

直至1848年，社会主义被走向工业社会的这前几步打上了深刻的烙印。生产方式的进步使人们对资本主义的观察不再象对重农主义的观察那样只限于土地方面，而且使人们看到了“富裕的社会主义”的前景。此外，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达到了相当先进的阶段，足以使人们对社会不公产生强烈的反应。社会的财富日益增加，工人的贫困日益加剧，这种发展过程是否不可避免？难道人们在打破经济和社会结构中不能有所作为？然而，资本主义毕竟太不完善，太年青，以致无法使人们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从中发现便于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规律和结论。看来无产阶级与其说是一个有活动能力，能够并且唯一能够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阶级，不如说是一个苦难深重的阶级。

因此，法国的社会主义一诞生，就以其两重性著称于世。它既是——用杜尔克姆的话来说——“一声痛苦的呐喊”，也是一种对正义和博爱精神的呼唤。它是一种“空想”

① 工人住宅区——加塞大夫原注。

的社会主义，或者“观念形态上”的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的理论家不是从社会的演变中寻找解决办法，而是从自己的头脑中框构出一个建设理想社会的计划，来反对悲惨的现实。而且，为了建造这个幻想中的城堡，他们对自己所处的时代究竟成熟到什么程度都丝毫不加考虑。

社会主义这种观念形态上的特点，那些培育社会主义的思想和革命传统的多样性，都说明了社会主义是形形色色的。有多少个理论家，也就有多少个理论体系。

第二章 王朝复辟时期：社会主义含苞待放

圣西门（1760—1825年）

克洛德-亨利·德·圣西门伯爵出生于皮卡底的一个自诩以查理曼为祖先的贵族世家，在这个贵族世家的显赫的成员中，有过在路易十四宫廷中供职的残酷无情的史官。不过，圣西门属于这个贵族世家的一个分支，即遭到部分破产的桑德里库家族。

继拉法耶特之后，圣西门作为自由派的年轻贵族子弟，于1779年远涉重洋来到了美洲。战争胜利后，他向墨西哥总督提交了一份开凿洋际运河的计划，表现出“企业家”的气魄。他满腔热情地赞成法国大革命，并参与了对那些被没收的国有财产进行的投机活动。他在革命的督政府的统治时期，在圣佩拉齐监狱里关过11个月。除此之外，他一边做生意，一边过着上流社会的奢侈生活，一边还进行科学研究，直至法兰西帝国建立为止。他于1805年遭到破产，所以不得不同意到当铺里去当一名抄写员，并接受其过去的家仆的接济。1816年12月，56岁的圣西门创办了《工业》杂志。由于有了这份刊名颇为引人联想的杂志，他开始发表有关经济和社会问题的文章。这些文章是经圣西门启示、指导，但由撰稿人执笔写成的集体成果。奥古斯坦·蒂埃里，夏皮塔尔，以及后来的奥古斯特·孔德，都是他的卓越的合作者。

即使圣西门不象他自诩的那样是达朗贝尔的门生，他也深受18世纪哲学家的影响，同时也深受重农主义者和那些认为人类可以日臻完善的理论家的影响。圣西门与他之前的空想主义者相反，他强调发展生产，并反对人类历史的任何倒退。

无论技术治国论者还是社会主义者都愿意继承圣西门的思想遗产。前者和后者都可以理所当然地把圣西门的肖像挂在他们先哲的画廊里。这是因为，圣西门著作的核心本身就存在着矛盾。

圣西门是主张“左翼技术治国论”的前驱吗？他批判资本主义，主要是针对生产的无政府主义状态。他的基本目标决不是消灭资本主义，而是要组织资本主义：通过合理地组织生产，成倍地增加社会财富，改善人数最多、生活最穷困的工人阶级的命运，达到共同的幸福。当然，这种对经济——部分有计划的经济——的科学管理，会维护资本家的利润。政府主要是承担领导经济的任务，因而建立在“技术治国论的三仆从”(E·拉布鲁斯语)之上。三仆从即发明委员会(工程师、作家和艺术家)，审查委员会(数学家和物理学家)和执行委员会(富有的工业、农业、商业企业主)。科学被视为宗教，积极的宗教，科学家则是传教的大神甫。

为着“组织”资本主义，圣西门依靠资本家他们自己。资本家不仅没有失去一切，而且赢得了一切。难道他们不会捍卫自己的利润，不会管理新的社会吗？圣西门的呼吁还得到了某种反响：在预订《工业》杂志的读者中，有自由派的巨商，有银行家佩雷戈、拉菲特、卡齐米尔、佩里埃，有工场主泰尔诺。广而言之，圣西门愿意在“民族党”(1789年的革命者珍惜此词)的旗号下，或者在“工业党”的旗号

下，把农夫、商人、银行家和工业家，不分雇佣劳动者和大小雇主，全部联合起来。这些就业的国民将要叫形形色色的有闲者退赃，因为他们象大胡蜂那样，把蜜蜂酿成的蜜非法地占为己有。在著名的《寓意集》里，圣西门依照西哀士所著《什么是第三等级？》的传统，假设法兰西突然丧失其技术精英——“三千名第一流的学者、艺术家和能工巧匠”，那它就“至少需要有整整一代人来消除这个不幸”；但是，假如有“三万个名人，最重要的国家人物”——王族、廷臣、大臣、高官、红衣主教、法官、军官等去世，那么，法兰西民族无疑对此会感到悲痛，但它却不会感到大伤元气。

圣西门作为技术治国论的鼻祖，对社会主义的历史作出了崭新的、独特的贡献。首先，他毫不留情地揭露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但由于时代的局限性，他没有揭示出后来由马克思揭示出来的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即社会化的劳动方式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因此，他不能意识到说话结结巴巴的无产阶级是为社会主义社会接生的稳婆。此外，圣西门生活在资产阶级同贵族的对抗使资本家同无产者的对抗一直降至第二位的统治时期，他作为这个时期的同龄人，将其攻击的主要矛头对准地主和贵族的大地产，对准他们在思想和政治方面的支持。如果说圣西门宽容工业、商业和银行资本，那么，有些弟子却比他走得更远，将要否定生产资料私有制。就社会主义者的完整词义而言，圣西门本人不是集体主义者，不是社会主义者。但他给社会主义留下了遗产，对未来世界作了某些卓越的预测：实行计划经济，由最终联合起来的人们合理地开发地球，建立一个消灭阶级对立、由“管理事务取代管理人”的社会。

夏尔·傅立叶（1772—1837年）

傅立叶象圣西门一样，是一个失去社会地位的人。他出身于贝藏松一个有钱的呢绒商家庭，一生都从事其所厌恶的经商，但他不是雇主，而是雇员。他也象圣西门那样，试图利用大革命来进行投机活动。他在取得那份家产以后，在21岁那年定居里昂，专门从事批发殖民地食品的业务。但他那支装运咖啡、食糖、大米和棉花的车队从马赛抵达里昂时，恰好赶上吉伦特派举行的起义高潮，起义者没收了傅立叶的货物，强迫他当了兵，去同国民公会的军队打仗。起义失败之后，他遭到逮捕，并受到上断头台的威胁。虽经脱险，但他在经济上却遭到了部分破产^①，所以对大革命深恶痛绝。

傅立叶的经商能力变成了他的谋生手段，无论当推销员、经纪人和商店职员，他都对经商又爱又恨。不过，照他说来，正是由于这些行当，才使他发现了“工业机制”基本上处于“混乱状况”，由此建立了他的理论学说。著名的美食家布里亚-萨瓦兰由他陪同，在巴黎的一家饭馆里吃晚饭，他预订了一个苹果做甜食，并支付了14个苏。可是，在前一天，傅立叶在鲁昂看到，有人用同样的钱买到了100多个苹果。事隔22年之后，傅立叶以其特有的谦逊态度，讲述了这个多少有些真实的轶事，并下结论说：“从此，我就发现将来可以列举4个著名的苹果，其中有两个是因为它们造成的灾难而著称于世的，它们是亚当的苹果和巴黎的苹果；有两个是因为它们为科学作出的贡献而著称于世的，它们是牛

^① 此后剩下的财产丧失于1799年发生的一次沉船事故。

顿的苹果和我的苹果。这4个著名的苹果，难道不值得在史册上写下一笔吗？”

从出版的年月来看，傅立叶的著作是为圣西门的著作做陪衬的。关于“法朗吉”制度^①的普遍哲学，是在傅立叶1808年出版的一部匿名著作《关于四种运动和普遍运动的理论》中加以阐述的；但他著作中的主要部分却是在王朝复辟时期，甚至是在七月王朝时期开始发表的。他比圣西门多活了12年，是1825至1826年期间和1828至1832年期间先后发生两次严重的经济危机的历史见证人。

在傅立叶的著作中，最“有建设性”的部分实际上是“有破坏性”的部分，即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在他看来，“这个被颠倒的世界”存在着“两种根本的弊病”：土地的分割和商业的寄生性。小块土地阻碍了生产的发展，并且自我破坏。“商业的无政府主义或自由竞争”造成投机倒把和哄抬物价现象，导致社会财富集中到某一社会阶层手里。他愤世嫉俗，反对劳动者少消费、寄生虫多消费，生产的发展反而造成劳动者贫困和失业这种社会反常现象。这样的社会制度之所以能够维持下来，唯一的原因是国家的大权掌握在唯利是图的金融贵族手中，社会的伦理道德让穷人信守逆来顺受和“自我牺牲”的美德。

傅立叶主张用“社团秩序”和“大和谐”来反对混乱。拥有所有权的人们把财产、劳动和才能组合起来，在大约4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组建一个1600人至2000人的联合体；他们收入的分配，十二分之四归资本，十二分之五归劳动，十二

^① 19世纪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所设想的理想社会的基本组织单位。
——译注。

分之三归才能。这种制度通过所有制的普及消灭了雇佣劳动，但它却捍卫了生产资本的所有制。种植业和畜牧业是这个联合体的两大来源，而工业收入不如种植业和畜牧业那样“富有魅力”，其主要用途是使法伦斯泰尔维持其冬季活动。由此，大城市、大工业消失了。由于这种经济的倒退，傅立叶主义变得同18世纪末的道德学说颇为相似。他主张的这种社团制度，是否从他故乡汝拉的农民和手工业者组织的生产联合体那里得到了启示呢？也许他从1793年里昂工人初次表现出来的联合精神那里也得到了启示，而“朗热的小册子里强有力地表达了”这种精神（H·布尔安语）。这里只是推测而已。

傅立叶为劳动恢复了名誉。既然每个人的爱好，更确切地说，每个人的嗜好都得到满足，劳动就会从讨厌或者厌恶变为快乐和可爱。如同世界被万有引力推动那样，人类受到“十二种原始的情欲”的引导，其中五种是与五种感官的活动相连的肉体情欲，四种是友爱的情欲（友谊、爱情、父爱和雄心），三种是分配的情欲（“魔法”或曰想搞阴谋的情欲，“混合型”的情欲或曰感官与灵魂的快乐，“蝴蝶型”的情欲或曰好动癖）。为了满足这些情欲，并由此达到和谐，个人将通过“情欲系列”来加以组合，而整个联合体就是法朗吉。

傅立叶在其主张的法朗吉中，是不作任何种族和性别的区分的。人们以集体的方式进行消费：在一起生活，住社团旅馆，吃集体食堂，让孩子入托儿所，让行为放荡的男人和女人去满足那些孤单的人的性要求，从而实现男女平等，建立起新的关系。那种迄今为止“受压抑”的爱情，从教化的束缚下逐步解放出来。长期以来，有关傅立叶的研究著作阉割

了他在性方面大胆提出的观点；但10年来，由于一种自然平衡的作用，有些作者（S·德布，R·巴尔特）倾向于优先研究傅立叶著作中这个十分时髦的方面，而且有点做过了头。

法朗吉后来取得的成果是那样辉煌，以致越来越发展，并且传播开来，很快就传遍了整个世界，但还要设立法伦斯泰尔的试点。为此，必须投入大量的资本。正如圣西门求助于拿破仑、路易十八和“神圣联盟”的创始人那样，傅立叶首先同第一帝国的部长、王朝复辟者和七月王朝时期的大臣们谈话，然后找一个隐姓埋名的股东。他每天都呆在家里，幻想到了中午能接待那个决心预付数以千万计巨款的资助人。他天天都在翘首等待，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

法朗吉决不是自我终结，而是“一块试验田”，一条走向普及社团的通道。因此，在法朗吉和合作之间没有直接的历史关系。“合作者的‘傅立叶主义’，是一种持不同政见者的傅立叶主义……把傅立叶看成是合作的先驱，这未免有些言过其实。”（J·布律阿语）

第三章 七月王朝时期：社会主义繁花如锦

缺乏思想指导的工人运动

直至1830年，社会主义还仅仅接触到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小团体。社会主义的理论家们无视工人的斗争便向空想社会主义进军。工人的队伍进行了一场英勇的、分散的和必定要失败的斗争，斗争没有学说的指导，也就没有胜利的前景。

经历百年斗争实践的手工业行会，在王朝复辟时期重新获得了活力；此外还出现了诸如“互助合作社”的地方组织，其中有些互助合作社为了开展斗争，组织了“抵抗社”。大多数自发产生的罢工、骚动此起彼伏，并且遭到了严酷的镇压。工人们奋起反抗。反对谁？准确地说，反对什么？首先，他们不是反对生产关系，而是反对生产工具：破坏机器，认为机器是失业和贫困的根源（路德主义语）；其次，他们反对漫长的工作、昂贵的生活费用、微薄的工资和失业。由于经济危机，工人们动员起来，走上了1830年7月革命的街垒。他们人数少，既无领袖，又无组织和纲领，所以，越是无法捍卫自己的胜利果实，他们在斗争中所作的贡献对资产阶级就越有价值。

因此，工人们不是一支顺从的力量，而是一支辅助的力量。由于第一次意识到自身的作用，他们在1830年以后，为

争取自己的切身利益而进行斗争。里昂丝绸工人的“光荣的三日”，是对1830年7月巴黎工人“光荣的三日”的反响：手工业者和工人的起义不再反抗织机，而是反抗剥削者。新闻记者圣马克·吉拉尔丹说：“里昂的骚动揭露了一个重大的秘密，即社会内部存在着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斗争……在它（中产阶级）的下面，生活着一大群无产者，他们躁动着，震颤着，不知道自己的意愿，不知道自己的前进目标；但这有什么关系？他们是邪恶。他们思变。这是现代社会的危险之所在，也是那些将来摧毁现代社会的‘野蛮人’现在可能解放的地方。”

一直到1834年，到处爆发了工人的骚动：各种形式的罢工、示威游行和秘密结社。工人阶级在斗争中觉醒，从而促进了社会主义带着怯生生的表情，第一次到工人中间去进行传播，而这种传播又促进了社会主义思想的更新。

社会主义

圣西门派和傅立叶派

除了罗德里格以外，圣西门主义者表现了“这种弟子从未认识师长的不平常的特点”（J·多特里语）。该派主要吸取了一些巴黎综合工科学校的老毕业生和未来的技术治国论者：普罗斯佩·昂方坦，费尔迪南·德·莱塞普斯，米歇尔·谢瓦利埃和佩雷尔兄弟。

1830年以后，圣西门派通过其宣传手段（报刊和演讲会，尤其是后者），第一次接触到巴黎、里昂、马赛等地的工人读者和听众。他们以比圣西门更大的勇气，向工人鼓吹实现生产资料的社会化，取消遗产继承，结束人剥削人的现象，并且提出这样的箴言：“按能力分配，按成果分配。”

但这只是一阵旺火而已。从1832年起，圣西门派很快就丧失其社会主义的特点，并土崩瓦解了。首先，他们遭到一种同圣西门的遗教——世俗的和理性的道德相距甚远的荒谬宗教的危害，由于这种荒谬宗教，“教皇”昂方坦变成了圣西门这个偶像的化身。其次，这些资产阶级的小捣蛋们因失去坚强的社会支持而变得温和起来，并且用他们非凡的才能，为当时蓬勃发展的资本主义效劳。

但是，有一个圣西门主义者却并未滑向技术治国论，而是继续为用和平的方式改善“人数最多和生活最贫困的阶级”的命运而斗争，此人名叫皮埃尔·勒鲁（1797—1871年）。勒鲁对昂方坦神父的胡说八道感到气愤，所以于1831年同圣西门派决裂，并且采纳了傅立叶的许多观点。虽然勒鲁对当时的社会现实作了精辟的分析（《论寡头政治》），但他却陷入了一种与神秘论混为一体的空想主义。他对某些文学社团（乔治·桑，欧仁·苏）的影响远远超过其对工人运动的影响。

1832年以后，很大一部分圣西门主义者摒弃了昂方坦神父提出的神权政治论，壮大了傅立叶派。傅立叶逝世后，傅立叶派由一个综合工科学校的学生维克托·康西德朗（1808—1893年）领导。康西德朗同傅立叶同籍贯，也来自果树满山遍野、小生产合作社如雨后春笋般的汝拉山区。他继承了傅立叶关于联合体的幻想，用自己榜样的力量去改造世界。但他的两次试验——第一次于1832年，在韦斯格尔河畔的孔德（塞纳和乌阿兹）进行，那时傅立叶还健在；第二次在20年后，在泰克萨进行——都以失败而告终。

维·康西德朗进行了革新的尝试，进一步深化了傅立叶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更加强调了傅立叶关于社会划分为

对抗阶级的观点。他还通过著作和报纸宣传了傅立叶生前没有明确阐述过的学说。这种努力取得了部分成功：在国内的好几个城市，甚至在国外（瑞士、比利时和美国）都建立了傅立叶派的核心组织，这些核心组织数量有限，但生命力却很强。

基督教社会主义

法国的社会主义一诞生，就已经充满了基督教的“救世主降临说”的观点。这里且不谈“教皇”昂方坦对基督教所作的曲解。圣西门把他的最后一部著作取名为《新基督教主义》，是有象征意义的。傅立叶主义充满了带有神秘主义色彩的泛神论，卡贝则按照他对原始基督教所描绘的蓝图，建设了伊卡里亚岛。

由于信仰基督教，由于笃信基督教的福音主义，有的基督教徒把穷苦阶级的贫困看作是“重大的和基本的问题”（拉梅内语）。拉梅内（1782—1854年）在《一个信徒的话》（1834年）中，诅咒这个不公正的社会百般折磨无产阶级，并曲解耶稣基督为卑贱者们制定的真谛。他衷心地呼吁在仁爱、公正与平等的基础上建立一个真正的上帝城，并由上帝城来实行统治。后来，拉梅内逐步脱离教会，甚至脱离天主教义，转而鼓吹在民主国家的资助和保护下成立工人的信贷和生产合作社协会。

皈依天主教的老圣西门主义者比谢大夫，从1831年起就鼓吹上述工人协会的方式。1834年，他支持“镀金首饰工人基督教协会”。这些技术高超、生活豪华的工匠成功地开办了合作社，并创办了第一家工人报纸《工场》（1840—1850年）。

康斯坦丁·佩格尔（1801—1887年）起先从师于圣西门和傅立叶，从这两位大师那里获得批判资本主义的启示。后来，他在拉梅内的影响下，打算在资本主义废墟上建设上帝共和国，即集体主义的基督教社会。

路易·勃朗（1811—1882年）

路易·勃朗重申其前辈们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强调自由竞争是个“通病”，是资产阶级遭到破产的缘由，是“毁灭人民的制度”，是战争的根源。作为医治这个通病的药方，他建议建立生产合作社协会，由国家向这些“社会工场”提供开工所必不可少的首批资金；工人们工资平等，并参预企业的管理。假如社会工场马到成功，那它就会通过此后变得“神圣不可侵犯”的竞争手段，迫使资本家把生产资料卖给工人阶级。这样，资本主义就会在大资产阶级不采用暴力反抗的情况下，逐步地、和平地让位于社会主义。

路易·勃朗的这个建议毫无创新之处。他远不是一个革新者，而是表现为一个才华出众的普及工作者。作为一位杰出的作家，勃朗的文风同傅立叶和勒鲁那种晦涩的文笔形成了对照。他语言简洁，他的学说汇集在一本名为《组织劳动》（1839年）的小册子里，这位民主派记者因这本小册子而一举成名：6000册书几天内就销售一空，并在10年内再版10次。《组织劳动》的出版，标志着工业方面的无政府状态及其造成的贫困的终结，在第二共和国初期将成为工人斗争的强大呐喊。

皮埃尔·约瑟夫·蒲鲁东（1809—1865年）

蒲鲁东如同傅立叶和康西德朗一样，是弗朗什-孔泰人。

有朝一日，历史学家无疑将研究弗朗什-孔泰为什么能够和如何能够以其经济和社会结构，以其传统，（象庇卡底对巴贝夫和圣西门那样）对社会主义思想的诞生产生影响。

在1848年以前的社会主义理论家中，唯独蒲鲁东表现了工人理论家的特点。他在1838年写道：我“生在工人阶级中间，长在工人阶级中间”。事实并非如此！蒲鲁东的母亲曾当过厨娘和女仆，他父亲出身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家庭，当过箍桶师傅的学徒，后来便自己开业，先后当过酿啤酒工人和箍桶匠。但是，蒲鲁东的家境困难，他小时候干过粗活，一直干到12岁，其中放了5年牛。然后，他靠助学金上了贝藏松中学，一边读书，一边在父亲开的小铺里做小工。到了19岁那年，在可以参加中学会考之前，他到贝藏松的一家大印刷厂里当学徒，并且当上了校对员。校对这个行当激发了蒲鲁东的好奇心和对知识的爱好。1838年，由于贝藏松学校的建立，他便定居巴黎，揭开了政治经济学的奥秘，并且发表了前几部著作。1840年出版了《什么是财产？》，书中有一句名言：“财产就是盗窃。”1842年，《对财产所有者的警告》一书遭到了查禁，虽然蒲鲁东受到了起诉，但贝藏松重罪法庭却宣告他无罪。1846年，他发表了代表作《贫困的哲学》，马克思曾在《哲学的贫困》中对这本书进行过尖锐的驳斥。蒲鲁东处心积虑地躲避开1848年2月革命，斥责过6月起义的工人，并作为拿破仑三世的良师益友，在《从政变中得到证明的社会革命》（1852年）中指望过由拿破仑来领导社会变革。

蒲鲁东的思想方法使人感到有点困惑不解。他是一个用公理和三段论来进行推理的逻辑学家，是一个认为观念主宰世界的唯心主义者，但也是一个辩证论者。虽然蒲鲁东没有

读过黑格尔的书（因为黑格尔的著作尚未译介到法国），但他从马克思（1844年，马克思曾逗留巴黎）那里，特别是从卡尔·格律恩那里了解到黑格尔的辩证法，并且受到其诱惑。他歪曲过、甚至讽刺过黑格尔的辩证法。“蒲鲁东的本质使他本人达到了辩证法的高度。但他从未懂得过辩证法，所以他只是到达诡辩论的地步。其实，这是他小资产阶级观点的反映。小资产阶级总是说：‘一方面，另一方面’”（马克思语）。在蒲鲁东看来，具体的现实作为永恒观念的物质体现，总是包括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因此，财产既可以是最好的方面，又可以是最坏的方面。这位《论经济矛盾》的作者沉溺在他的思想矛盾之中，而这些矛盾，他无法解决，甚至总也不设法去解决。

蒲鲁东作为唯心主义者，首先表现为一位伦理学家。他以公正的名义谴责财产，更确切地说，谴责财产是产生非劳动收入（地租、房租、年金和利润）的源泉。因此，他不是要摧毁资本主义，而是要清除资本主义“坏的方面”。他决不是将其理想寄托到社会主义身上，而是通过其前辈的话激烈地批判社会主义。如同18世纪末的伦理主义者一样，蒲鲁东梦想建立一个小私有者的共和国，也许他把这种共和国看成是对其故乡汝拉的美好回忆，看成是不管怎样都要阻止独立的生产者沦为无产者的希望。

那么，怎样使生产者获得解放呢？通过互助会、无息贷款和贷款权来使生产者获得解放。这在资本主义的鼎盛时期是可以做到的：生产者靠国家银行提供的无息贷款，就能开设一个简陋的工场，并且获得其全部劳动果实。

如同互助主义解放生产者并保证其享有平等一样，联邦制则在政治上解放公民，并保证其享有自由。尽管蒲鲁东有

过新的矛盾，即在一定程度上对“专制”的第一帝国献过殷勤，但这位“反专制主义者”却理所当然地被极端的自由主义者尊为“无政府主义之父”（J·梅特隆语）。

起初，蒲鲁东的拥护者人数有限，但他在19世纪最后三分之一的时间里，对工人运动产生了深刻而持久的影响。他给工人运动留下的是不参与政治的意愿，反雅各宾派的联邦主义、极端自由主义精神、互助主义、工运中心主义、反女权主义和对体力劳动的自豪感。

共 产 主 义

从词的诞生年代来看，“共产主义者”早于“社会主义者”。它最初的涵义，是指对某份不可分割的财产的共同所有者、共同拥有者。它原来只是法律词汇，后来在卡贝发表《卡里亚岛游记》时才登上了政治舞台。

19世纪的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是很难分开的两大思潮，是同20世纪的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迥然不同的两个概念。

共产主义者与许多社会主义者不同，主张对生产资料共同所有，共同开发。此外，还必须看到这种不同的细小差别，即他们主张的共产主义，例如巴贝夫的共产主义，与其说是生产的共产主义，倒不如说是分配的、消费的共产主义。

支持者的不同是区分概念的第二个标准。“在1847年，社会主义一词是指资产阶级运动，共产主义一词则是指工人运动。社会主义虽已诞生，至少降生到了大陆，但共产主义的情况却恰恰相反。”（弗·恩格斯语）无疑，这种不同太明显。共产主义比社会主义具有更多的工人特点，这是否说明共产主义的理论家赋予工人阶级的历史作用，并且由这种历史作用来进行自我说明呢？是的。但在七月王朝末期，基督

教社会主义和路易·勃朗的理论也已经深入到工人群众之中。

最后，同社会主义相比，共产主义表现出三个明显的政治特征：

1. 共产主义者自诩继承了法国大革命的遗产，极力表明自己是共和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诚然，他们以此反对过圣西门、傅立叶、蒲鲁东，反对过民主，不问政治，并准备通过乞求统治者的资助来建立乌托邦。但是，他们在这个方面同勃朗和拉梅内一类的社会主义者是否隔着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呢？

2. 社会主义者一致主张拒绝使用暴力，鼓吹使用改良主义的、和平的手段来改造社会。共产主义者则忠于雅各宾派和巴贝夫主义的传统，主张使用革命的武器；不过，在他们中间，唯独卡贝象社会主义者那样，拒绝用暴力来为新社会分娩。

3. 社会主义的理论家倾向于舒舒服服地呆在办公室里闭门造车，建造他们未来的城市。共产主义者则表明自己是投身于日常斗争的活动分子和领导人，是秘密结社的组织者。

因此，共产主义者不是铁板一块，不过，他们不如社会主义者那样成份混杂。可以把他们分为两派：一派以卡贝为首，是民主派、改良派和自然神论派；另一派以德扎米和布朗基为首，既是民主派，也是革命派和唯物主义派。

埃蒂耶纳·卡贝（1788—1856年）和 伊卡里亚人

卡贝出身于一个手工业者家庭，他父亲象蒲鲁东的父亲一样，在巴黎当箍桶匠。在王朝复辟时代，卡贝当过律师；作为自由派，参加过烧炭党，并任烧炭党领导人之一。1830

年革命使他升任巴斯蒂亚法庭的检察长，但由于他持共和派观点，任期很短。1831年，他在家乡当选为众议员，并以此身份创办了一份共和派报纸《民众报》。后因违反新闻法而被判刑，在英国流亡了5年（1834—1839年）。在英国，卡贝受到了托马斯·英吉斯和欧文的共产主义理想的吸引，并在很大程度上接受共产主义理想的影响，写下了著名的《伊卡里亚岛游记》。直至1848年，该书重版了4次。

在伊卡里亚岛上，人们对技术精益求精，达到了高水平；每个人都通过自己的劳动为公益服务；财产为大家共同所有，岛民丰衣足食；他们的座右铭是“按需分配”。

那么，人类怎样才能抵达这种令人神往的彼岸呢？卡贝坚决主张不使用暴力。“如果我手里掌握着革命，那么，即使有一天要死于流亡生活，我也要紧紧地把它抓住。”他认为，用现代社团的实例，以和平的方式进行说服教育，就足以改造世界。而且，卡贝象康西德朗一样，在美国着手建立了第一个蜂房；但是，诺沃奥的伊卡里亚岛却遭到了伊卡洛斯^①的厄运。

革命的共产主义者和奥古斯特·布朗基

（1805—1881年）

革命的共产主义者同巴贝夫的传统直接相关。巴贝夫主义的复兴发端于1828年在布鲁塞尔出版的布奥纳罗蒂的著作《巴贝夫所谓的为平等而密谋》；巴贝夫的理论先深入到公开活动的政治社团（“人民之友社”和“人权社”），直至1834

^① 伊卡洛斯：古希腊神，他用蜡将鸟翼粘于双肩，与父逃亡，因飞近太阳，蜡融翼落，堕海而死——译注。

年，然后深入到秘密活动的政治团体（“家族社”、“四季社”和“民主社”）。从1834年，特别是从1840年以来，这些社团广泛地吸收了工人和民众参加，但社团领导人仍然是一些资产者：巴尔贝斯，布朗基，新闻记者拉波纳雷和德扎米。马丹·贝尔纳有时则被人作为例外来引证。诚然，他起初当过印刷工人，但后来却自学成才，当了一名律师。直至1839年，这些社团才拥有一些内容相当模糊与温和的社会和政治纲领。它们如同昔日的雅各宾派那样，打算捍卫“人民的神圣利益”，“推翻形形色色的贵族统治”，建立革命的人民的专政。人民的利益在于争取平等，争取生活权，而不是为此而求助于社会主义。在1839年爆发工业危机和工业危机引起罢工浪潮之后，秘密社团以“工人”事业的捍卫者自居，提出了一个明确的共产主义纲领。

共产主义的思想还通过报纸来宣传。有非法的报纸：《共和派导报》和《自由人》；也有合法的报纸：它们先后是《智慧》，拉波纳雷的《宣传》，比约的《人民论坛》，德扎米的《平均主义者》，布朗基的朋友所编的《博爱》。

在这些共产主义理论家中，有一个以其个性和影响而崭露头角的，他就是布朗基。

路易-奥古斯特·布朗基出身于纪龙德省一位国民公会老议员的家庭，他父亲曾被波拿巴任命为皮热泰尼埃专区区长，他的长兄阿道夫是一个著名的自由派经济学家。布朗基19岁就参加烧炭党，开始其密谋者的生涯；1827年，他数次参加大学生的示威游行，3次负伤，其中两次刀伤，一次颈部中弹。他参加了1830年7月革命的街垒战；接着，又进行了反对窃取人民胜利果实的国王路易-菲利浦的斗争，参加了由卡芬雅克领导的“人民之友社”，并且开始其常蹲监狱

的铁窗生涯。布朗基的社会观是在同其战友巴贝夫、布奥纳罗蒂的接触中，以及在参加1831年里昂工人起义和1834年巴黎工人起义中，逐步成熟起来的。他同巴尔贝斯一道领导了“家族社”（1835—1836年），然后继续同巴尔贝斯，再加上马丹·贝纳尔一道领导了“四季社”（1837—1839年）。由于认为巴黎的政局（持久的内阁危机）和社会动乱使起义有可能获胜，布朗基于1839年5月12日率领500名武装群众，出其不意地向市政厅发动了猛攻。可是，经过两天发展不平衡的战斗，起义者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最后被镇压下去了。布朗基被判处死刑，但被国王减为终身监禁。1848年革命使他获得了释放，但也使他很快感到失望：他重新开始斗争，但这次斗争的矛头却针对资产阶级的共和派。这样，他领导了争取推迟选举的三月示威游行。布朗基的许多政敌——不仅有政府、警察，而且有巴尔贝斯——试图用指控他过去当过密探^①的办法，来使他名誉扫地；他于5月被捕，一直关在监狱里，直至1859年；1861年又被判处徒刑，但他于1865年越狱成功；1870年8月返回法国后，他积极参加了1870年10月31日和1871年1月22日的“战斗日”活动；3月18日前夕，他遭到了逮捕。梯也尔顽固地拒不释放布朗基，即使用巴黎大主教来交换也被拒绝，因为梯也尔说，“如果把布朗基放回去，就等于给起义军增派一个军团的兵力”。布朗基是一个军团，还是“巴黎公社所缺少的领袖”（马克

^① 有个名叫塔什罗的记者将一份在土伊勒里宫被查封的文件公开发表出来，该文件转载了X……于1839年对内政部长所作的声明。当时，布朗基被指控是这个泄露了四季社秘密，并出卖其主要领导人的X……看来，塔什罗是一份事后伪造、旨在破坏布朗基权威的警方文件，唯一可信的是，布朗基不是第三个证件中的叛徒。

思语)？

布朗基首先是一个战士，一个政治领导人。他因战斗的热情和不屈的忠诚而遭到历届政府——君主立宪政府、共和政府、帝国政府的仇恨。这个被历史取了“囚犯”译名的战士曾四次被判处死刑，在狱中度过了三十四五五个春秋，过了九年半流亡或软禁的生活。然而，无论与世隔绝的铁窗生活（他不断进行越狱的尝试），还是疾病和诽谤，没有任何力量能战胜布朗基的毅力，唯有岁月消磨了他那狂热的革命气质。

理论家不等于活动家。布朗基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是建立在他对道德秩序和合理性的看法之上，而不是建立在深刻的科学分析之上。在他看来，资本主义的剥削不在于对工人劳动的无偿占有（剩余价值），而在于放高利贷（“资本就是高利贷的同义词”）和税收不公。他对社会和政治问题的兴趣，甚于对经济问题的兴趣。他很早就感到社会应划分为阶级。1832年1月，当法庭庭长询问布朗基的社会职业时，他自豪地回答说：“无产者”。但布朗基忠于巴贝夫关于“穷富人之间战争”的公式，把无产阶级看作是“三千万自食其力并被剥夺其政治权力的法国人的职业”。在1834年工人起义之后，他缩小了无产阶级的范围，认为“没有资本的多数人被迫为拥有资本的少数人干活”。统治阶级在“利润和工资的殊死斗争”中，是靠两大支柱来实行其压迫的。首先是国家，国家是“富人统治穷人的警察”；其次是宗教，“基督教和鸦片这两种毒药毒效相同，都有使吸毒者上瘾的奇异性能”，“宗教已变成世界的灾难，它是产生愚昧、剥削和贫困的唯一源泉。唯灵论从来都把刽子手只看作神甫。”布朗基认为，在资本家和无产者之间，“在豺狼和羊羔之间不可能有什么和

解”。但他却不把阶级斗争看作是社会进化的动力，不把无产阶级看作是革命的动力。在他看来，教育、科学在人类进步中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因素：“共产主义必将从普及教育中诞生，而且只能如此。”由于他在平等派密谋的实践中成长，并在七月王朝时期被迫进行非法斗争，布朗基甚至在1839年5月13日惨败之后，也设想革命是一种武装打击的手段，是一次由组织严密和纪律严明的密谋者精心策划并付诸实现的“政变”。因此，他认为，不需要在采取行动的少数派和工人群众之间建立紧密的联系；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应当对行会组织持慎之又慎的态度；再说，既然革命能够，而且只有革命能够一举解决和最终解决社会问题，捍卫工人的日常权利要求，就是一件徒劳无益的事。

怎样捍卫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呢？在1802年模式和巴贝夫主义的启发下，布朗基想要建立一个“革命”的专政，由武装起来的人民担任“穷人统治富人的警察”。还要建立共产主义社会。“唯有革命将扫清障碍，照亮地平线，一点一点地升起风帆，开辟前进的道路，更确切地说，开辟通向新秩序的各种道路。”

布朗基是“老一辈革命家”（恩格斯语），也是“法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大脑和心脏”（马克思语）。

几点结论

19世纪前半叶的社会主义理论家和共产主义理论家对那种“从产品过剩本身中产生贫穷”（傅立叶语）的制度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他们用不同的语言，表示了对工人阶级苦难的悲愤，揭露资本主义那些明显的弊病，并预见到，尽管资本主义自以为永世长存，但它注定要灭亡。他们作为乐观主义

者，相信人类能够和应该在地球上实现其幸福。他们都打算建立一个既更加公正、又更加合理的、消灭人剥削人的社会组织。由此，法国的社会主义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伟大源泉之一。

然而，这种社会主义不是扎根在现实的、具体的、经济和社会的土壤之中，而是在活体内，在这些好心而富有想象力的思想家的头脑中制定的。由此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以前法国社会主义的四大特征：空想、混杂、不完善和封闭。

空想。因为法国的社会主义是观念形态上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前驱们曾经满腔热情地耕耘和播种过。然而，当初的气候还不够热，不足以使庄稼成熟；当初的耕种人还不够多，经验不够丰富，不足以把庄稼收割上来。

混杂，多种多样。有多少播种者，就有多少种子。是暴力，抑或非暴力？是革命，抑或以和平方式进行改良？是联邦主义，抑或雅各宾主义？是无政府主义，抑或革命的专政？是财产共同所有，抑或小私有者联盟共和国？是无神论，抑或神秘论？是法伦斯泰尔，抑或互助主义，社会工场，伊卡里亚岛？

不完善，或者不完整。因为所有这些理论体系只是揭示社会主义诸特征中的一两个特征：

——一个建立在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基础上，为集体服务的制度；

——在某种程度上实现收入均等；

——进行计划生产，旨在满足一切人的需要；

——对经济和政府实行民主管理。

不完善和封闭。社会主义从本质上讲，作为工人运动的意识形态，但它仍然同工人运动格格不入。“运动的贫困”

与“思想的伟大”相对立（E·拉布罗斯语）。但在1848年之前，在工人阶级的精英中间流传着一种对社会主义的混乱而零碎的认识，即把社会主义归结为几个“充满希望的公式”，归结为一些“模糊但又依然火热的希望”（E·泰尔桑语）。托克维尔这位卓有远见的观察家在1848年1月27日就预言“地平线上出现了风暴”。他说：“我承认，今天的工人阶级是平静的，但是，你们不妨看看工人阶级内部的变化吧……难道你们看不到，他们对政治的热情已经变成对社会的热情吗？难道你们看不到，有些不仅要推翻某些法律、某个部、某个政府，而且要推翻社会本身的观点正在一点一点地传播开来吗？难道你们看不到，这些观点正一点一点地宣传，说迄今为止世界上的财产分配不公，财产的基础不公吗？最后，难道你们不认为，这些观点深入群众时，或迟或早都要导致最可怕的革命吗？”

第四章 1848—1871年期间：“思想的低潮，工运的高潮”^①

同第二共和国现实对立的空想社会主义

工人、手工业者、店主和大学生或多或少是在参加秘密结社的活动分子——革命的共产主义者和带有社会主义色彩的共和派的率领下，将“资产阶级国王”拉下马的。

可是，“如果共和国仅仅是用某种施政方式来取代另一种施政方式，那它就会变成一句谎言。因此，改换名称是不够的，必须改变事物。”（奥·布朗基语）工人们没有放下武器，他们继续进行斗争，要夺取胜利果实。

1848年2月24日，社会主义和工人阶级在全世界第一次参加了政府，路易·勃朗和机械工人阿尔贝在临时政府中占有一席之地（阿尔贝任全国奖励委员会主席）。2月25日，20万人民群众在社会主义者拉斯珀尔的带领下举行了游行，迫使第二共和国宣布成立并实行普选制。衣衫褴褛的工人取得了实行某些社会措施的成果。同一天，青年工人马尔什手执武器，率领一个代表团去要求临时政府承认工人的劳动权。为了履行这个诺言，临时政府于2月27日决定大兴土木，开办“国家工场”。2月28日，纺织行业在市政厅广场举行游行，

^① 这是E·拉布鲁斯的用语。所谓“思想的低潮”，应指在此期间，法国没有产生伟大的社会主义理论家；但反过来，社会主义思想却在此时此刻开始对工人群众产生影响。

要求实行10小时工作日制和设立“劳工发展部”，结果只获准在卢森堡宫（过去无双院的旧址）设立一个由路·勃朗任主席，阿尔贝任副主席的研究委员会；3月2日颁布了一项缩短劳动日的法令：在巴黎实行10小时制，在外省则实行11小时制。

经过一周（2月24日至3月2日）的“攀登”，迎来了一个长达一个半月（直至4月16日）的新阶段。在此期间，人民在继续施加压力，但只是取得一些表面的或者微不足道的成功。最后，到了4月，人民的压力开始迅速下降，并在6月份骤然停止。什么原因呢？

因为社会主义是一个小派别。在1848年4月议会选举中，大多数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遭到了失败；少数人当选，只是因为参加联合竞选而当选为议员。这里，甚至用不着评论拉斯珀尔在1848年12月举行的总统选举中所获的36329张选票（仅占投票人数的0.5%）。在六月起义失败后，社会主义已经处在一败涂地之中。

社会主义变成了一个头重脚轻，甚至不能自立的人，一个资产阶级民主的尾巴——一个摆动着的尾巴。那些同意“用3个月的贫困生活来为共和国做贡献”的工人和路易·勃朗式的社会主义者则相信政府，相信“卢森堡委员会”，以使用和平的方式改组社会。他们遭到一出讲博爱的喜剧的愚弄，资产阶级在戏里毫不犹豫地反复说：

向鸭舌帽行脱帽礼，

向工人行下跪礼。

社会主义变成了一个既无指南，又无船舵的运动。社会主义者的领导人布朗基、巴尔贝斯、拉斯珀尔、卡贝等学习大革命的榜样，开办了一些俱乐部、人民政治学习中心、活

动机构，但这些俱乐部互为对手。现在，社会主义已经没有一个统一的领导机构，而原先那个领导机构在1848年5月15日那次笨手笨脚的示威游行遭到失败之后，业已土崩瓦解了。

最后，社会主义有一个最大的弱点，即在资产阶级和农民阶级看来，社会主义是一个可怕的吃人的妖怪。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罢工，卢森堡委员会的讨论，所有这些在他们中间引起了恐惧。此外，在农民、手工业者、雇主这些经济严重衰退的受害者看来，社会主义采取了“国家工场”的形式是一种讽刺。出于叫路·勃朗的劳动日制度名誉扫地的考虑，玛丽开办了一些没有用处但耗资巨大的工场，养活了一支“懒汉大军”，而增加的45%的税收则全都消耗在这个无底洞里了。

巴黎的工人运动由于力量薄弱，群龙无首和孤立无援，在1848年6月遭到了失败，其后果颇为严重。国家工场的突然关闭，引发了一次起义。这是工人的巴黎举行的起义：在首都东半部，尤其是在圣安托瓦纳、圣马丁、圣德尼、圣雅克、圣马塞尔这些手工业者集中的郊区，到处布满了街垒；这同里昂丝绸工人的起义一样，是饥饿者举行的起义。“阿拉戈先生，……您不知道贫困的滋味，您从来也没有饿过肚子。”不仅如此，而且这是工人革命以怯弱的态度进行的第一次尝试，是建立一个“社会共和国”的希望，它预示着巴黎公社的诞生。

起义失败和严酷镇压导致工人运动突然转为低潮。但是，在使这支民主的主力军解除武装、削弱力量和灰心丧气的同时，自由共和国也使自己遭到了致命的打击，并且为波拿巴专政的上台准备了温床。乔治·桑在6月起义失败的第二天

写道：“一个上台伊始就屠杀无产者的共和国，我是不相信的。”

不过，到了1849年，小资产阶级力图重新获得与工人的联盟，重新建立在6月起义的日子里遭到破裂的、“无套裤汉的兄弟情谊”（J·多特里语）。于是，在勒德鲁-罗兰的领导下建立了一个政党，更准确地说，建立了一个具有两个名称的派别，这两个名称看来是涵义丰富的：“新山岳派”表明其愿意继承雅各宾派的遗产；“社会主义民主委员会”则表明其团结的纲领，在这个纲领中，“人们剥夺了无产阶级权利要求中所包含的革命的特点，并赋予其民主的特点。人们剥夺了小资产阶级……权利要求中所包含的单纯民主的特点，并突出其社会主义的特点。”（马克思语）参加这个混合政党的，有倾向于社会主义的雅各宾派（德莱克吕兹），社会主义宗派的领导人（勒鲁，康西德朗），以及个别革命的领导人（马尔坦·贝纳尔）。

社会主义民主派在1849年5月13日的议会选举中，出乎意料地获得了成功：195万5千张选票（占投票者选票的28%，登记者选票的19%），180名议员。各大城市的工人、手工业者、店主和军人投票支持“山岳派”；法国南半部的农村则投票支持“红色革命者”。在“山岳派”选举地图上出现了一个稳固的民主集团。这个民主集团的传统将在包括法国东南部、西南部、中央高原、东部部分地区的、下比利牛斯山脉—阿登山脉对角线的南部地区长期保持下去。

于是，在统治阶级中间刮起了一股仇恨和惊恐之风。比戈元帅于1849年4月7日致函梯也尔，信中写道：“多么粗暴，多么凶残的畜牲啊！上帝怎么会让那些当妈的生下这些畜

牲呢！啊，真正的敌人不是俄国人和奥地利人，而是这些畜牲！”可耻之尤的莫尔尼于5月16日对路易·拿破仑·波拿巴私下说：“社会主义取得了惊人的进展……将来的办法只能是整装待发，发动内战，而且请哥萨克骑兵来援助我们。我写下这句话时，不禁笑了起来，我认为，您的民族自豪感要起来造您的反，但请您相信我，假如您看到有个社会主义者在您身边，那么，您就会毫不犹豫地喜欢哥萨克先生，而不喜欢社会主义者。我的爱国主义仅此而已。”

随着历史的推移，看来这种恐惧感与现实相比不成比例。由于内部分裂，态度暧昧，平庸无奇和陶醉于选举的胜利，“山岳派”的领导人于1849年6月13日组织了一次向议会的和平示威。秩序党便利用这种笨拙的做法，来消灭“山岳派”（其领导人遭到流放），瓦解人民的运动（实行新闻法和俱乐部法）。

人们也害怕“主张财产均分的人”和“红色革命者”。统治阶级精心维护这种恐惧感，使之成为保持城乡许多社会阶层思想稳定的因素。这种恐惧感还被视为常用的宣传工具。比如，罗米厄在《红色幽灵》（1852年）中，扮演了卡桑德拉的角色。“我预言，起义即将爆发！无产者已经做好了起义的准备，他们埋伏起来，直到最后一个村子。仇恨和妒火在他们的胸膛里燃烧。他们即将冲向社会，把那些富人、资产者以及一切有产者杀死，并且到处高举火把，把有产者抢劫一空，把小孩子摔死在石头上，要使世界重新陷入野蛮和混沌状态。”罗米厄的结论是，“只有大炮才能解决当代的问题，而且，即使这些问题将来来自俄国，也只有大炮解决问题。”

在第二帝国时期发生的变化

1854年，学识渊博的伦理和政治科学院院士路易·雷博

指出，“社会主义已经死亡；现在来评说社会主义，那就是宣读社会主义的悼词。”认为评说社会主义是宣读某一种社会主义的悼词，那倒未尝不可，但不能认为是宣读社会主义的悼词。

社会主义已经复苏了，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用第二帝国的经济繁荣和工业的飞跃发展来加以解释。

在“小拿破仑”上台之际，经济形势发生了转变，开始了物价上涨的阶段（1851至1873年）。物价和生产数量同步提高，使工业利润达到翻两番的水平，由此出现了两个后果：

1. “由于赚足了利润，资本主义更加容易对工人的权利要求作出让步。”（E·拉布鲁斯语）罢工运动获得了成功，这些成功又导致新的胜利，促进工人组织的发展和阶级觉悟的提高。

2. 同雇主利润的巨大增长相比较，工人实际工资在1860年以后得到的提高（直至1860年为止，名义工资的提高被物价上涨所抵销）显得微不足道。社会收入之间的差距不仅未缩小，反而进一步扩大。此外，还必须考虑到失业，考虑到劳动条件方面出现的某些恶化。

其次，工业，特别是机械大工业的巨大发展，导致工人阶级在数量上获得重大的发展（据1866年统计，工业和交通运输部门的工人已达470万），尤其是无产者在数量上获得重大的发展。可是，即使现代工业得到迅速的发展，中小工业乃至手工业这种生产方式仍然占主导地位。因此，工人阶级成份的混杂性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尽管有点抽象，仍有可能把两种截然不同的产业工人区分开来。

1. 手工业者和手工业工人。由于他们的劳动条件——

小作坊的劳动范围所限，使得他们在完成从原料到制成品的全部生产流程或大部分生产流程中，产生了某种心理状态：首先是个人主义，渴望自由，敌视任何（劳动或斗争）纪律。这些以怀旧的心情眷恋或多或少理想化的手工业历史的人，被蒲鲁东主义及其“独立生产者自由协会”吸引住了。但是，作为旧行业的劳动者，他们富于（政治和工会）组织的和斗争的传统，因此，他们为幼年时期的工人运动提供了基本的骨干队伍。

2. 无产者。他们人员更加集中，身受的剥削更加沉重，所以更加容易树立起社团声援和阶级声援的责任感。然而，这些产业工人力量分散，技术程度和文化程度较低，平时不堪劳动日的重负，常常带着农民家庭的烙印，缺乏斗争的传统，眼界为工厂大墙所限。因此，他们更难树立社会主义的觉悟。

事实上，工人队伍实际情况存在许多细小的区别。上述的两种产业工人队伍是相互渗透的，例如，在第二帝国时期经过技术革新的传统工业——纺织业和冶金加工业里，大厂与中小企业并存。工业正在发生着重大的变化：中间类型的工人阶级出现了，它不再是手工业者阶级，但还没有沦为无产阶级。

由于1848年6月镇压的创伤，以及对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失望，工人运动除了一两次惊醒之外，已经在专制帝国的统治下变得沉默了，并且在社会的专制政治的压迫下沉睡不起了。

1864年吹响了觉醒的号角。2月17日，在选举之际，《六十人宣言》要求劳动者享有推荐工人候选人的权利。这是工人阶级的第一次觉醒。“那些除了双手之外一无所有的人，

那些天天经受资本剥削的人，那些在侵犯其雇佣劳动者自由的特别法的统治下生活的人……所有那些必然受到资本统治并从属他人利益的人，他们都知道应当如何认识这种认为现在不再有阶级的观点。”1864年9月28日，在伦敦举行的一次集会上，成立了“国际工人协会”，有3名法国工人（其中包括托伦）参加了集会。马克思起草了第一国际的章程和开幕词。

1865年，围绕三个辐射中心——巴黎、里昂和卡恩组建了第一国际的法国支部^①，但法国支部的人数仍然很少（到1867年，除了几个地方支部以外，三个主要地方支部的人数各有500人左右）。法国支部的主导思想一开始就是严格遵循蒲鲁东主义。法国代表在向国际日内瓦代表大会（1866年9月）提交的备忘录中，重申了蒲鲁东的思想原则：不问政治，反对罢工，实现合作社的理想。然而，斗争的迫切需要，工人的斗争实践和日常的生活经验，这些都使蒲鲁东派的活动分子很快同蒲鲁东主义对立起来。1867年，各地支部把主要精力用于支持罢工运动；同年11月，在巴黎的国际会员参加了马南墓前举行的政治游行。虽遭严密监视、但迄今为止仍被当局容忍的第一国际法国支部，现在则受到法律起诉；“目光宽阔”的蒲鲁东主义者（瓦尔兰，马隆）——那些“目光狭窄”的、温和的蒲鲁东主义者（托伦，弗里布）则逐渐让位于他们——组成了一个旨在重新开展斗争的、新的领导委员会，但是立即遭到了镇压。由于领导人被杀和力量太弱，该委员会无法经受考验，就烟消云散了。

然而，播下的种子发了芽。1868年至1869年期间长出了

^① 下面的叙述参考了J·鲁热里在第一国际史国际讨论会（1964年11月在巴黎举行）上所作的报告。

更加生机勃勃的新枝，并于1870年春天长大成材。1869年至1870年期间，声势浩大的罢工运动席卷了工人的法国，滋养了这些新枝。新的法国支部以巴黎、鲁昂、里昂和马赛为四大中心，然后向全国各地辐射开去。国际主要扎根于那些传统工业部门，不管它们在第二帝国时期是否经过技术革新：纺织业（鲁昂地区，里昂地区，兰斯，托伊，里尔-鲁贝-图尔昆），巴黎的冶金业（机械工人，青铜器工人），玻璃工业（吉沃尔），陶器业（利摩日），建筑业，建材业，印刷工业等等，但它却无法扎根于真正现代的工业地区：诺尔省和中央高原的矿山和初级冶金部门。

J·鲁热里摒弃了传统的划分老手工业者和新无产阶级的看法，认为在法国，参加国际的会员是在那些经过第二帝国时期技术革新的传统工业（纺织业、青铜业、制帽业等）部门中劳动的“中间类型”的工人。

第一国际法国支部建立在由工会、合作社和街道支部组成的错综复杂的组织结构之上。它并不具备我们现代区分工会和政党那种明显的界线。有时，法国支部同这里一个早已存在的工人组织进行嫁接，有时则与此相反，在那里建立一个新的工会组织。由于这种交叉关系，国际会员的人数，即使大致人数也不可能算清。鉴于国际会员往往是集体加入，现在无法把个人登记参加作为计算单位。此外，“成功的罢工可能迸发出热情，失败的罢工可能把这种热情一下子毁掉……这样就产生了这种易于看到的、首次工会运动的不稳定性，即地方支部的突然出现及同样突然的消失，支部人数的突然增加和突然下降。”（J·鲁热里语）在法国支部的鼎盛时期，党员人数高达20万至30万（这是警方和国际会员提供的数字，但无疑是个有意夸大的数字），或许只有2万至

4 万呢。不管怎样，法国支部的人数是个低于国际活动所能引起反响的、浮动幅度很大的数字。

法国支部以其思想上的混杂性给人以深刻的印象。马克思主义对法国支部的影响微乎其微，只限于马克思同几个活动分子（弗朗克，瓦尔兰）之间的通讯。里昂支部和马赛支部的组织者 A·里沙尔和巴斯·特利卡被巴枯宁主义吸引住了。主张互助的蒲鲁东派幸存下来了，他们中有鲁昂支部的领导人奥布里，在巴黎的托伦和卡梅利纳。布朗基派开始加入第一国际。由瓦尔兰领导的主流派，是些“反专制的共产主义者”，这些活动分子公开主张生产资料的集体化，生产资料由生产者自己管理；他们从蒲鲁东主义那里保存了对国家和对任何权威的憎恨，但摒弃其不问政治的主张；他们坚定不移地进行了一场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因为“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相互关联，彼此不能够相互割裂开来”（瓦尔兰语）。不过，这些领导层中间存在的思想分歧是否对基层产生过那么重大的影响呢？

1870年春末，罢工运动衰落下来，国际也受其影响；帝国的镇压，即对法国支部领导人提出的第三次起诉，则加剧了国际的衰落。

第一国际留下了什么痕迹呢？国际在工人运动中，增强和传播了阶级意识和斗争精神。在国际的旗帜下，社会主义变成了工运中心主义，工团主义变成了群众性的运动，最后还诞生了工人的国际主义。1870年8月6日，巴黎的国际会员对德国人说：“面对这场刚刚宣布以满足我们共同敌人勃勃野心的、同胞手足自相残杀战争，面对这场业已牺牲我们成千上万名兄弟的、恐怖战争……我们谨以各国人民博爱的名义，向军备和战争表示抗议，并且欢迎全体劳动与

和平之友，以此来保障世界的自由。各国人民万岁！打倒暴君！”

巴黎公社：“冲天的精神”

巴黎公社是一场极其错综复杂的运动，所以它具有许多特点，这些特点千差万别，并且总是相互影响着的。

从其产生根源来看，巴黎公社是国民对领导集团（先后是帝国和所谓“国防”政府）破产所作的一次爱国的反应，是共和派反对君主立宪议会选择凡尔赛为会址和梯也尔为执行委员会首脑的突发事件。巴黎公社是受伤而怒不可遏的爱国主义，是火热而惶惑不安的共和主义。它们组成了一种炸弹，其导火索是政府下令将巴黎国民自卫军拥有的大炮缴械，这是政府有意无意所进行的一种挑衅。3月18日爆发了一场自发的人民起义。

这场自发起义变成了一次工人革命，世界上第一次工人革命。起义的战士和死难烈士中，有五分之四是产业工人^①。然而，工人不仅是巴黎公社的“普通一兵”。他们通过那些多少是专门的工人组织——工会、俱乐部和国际支部——的渠道，多次提出倡议，公开发表其批评意见、权利要求和其他要求。在总参谋部里，在实际上参加巴黎公社委员会的65名成员中，有25名（将近40%）是工人，其中有铸工

① 经统计，在被捕的34722名公社社员中，产业工人占78.4%；在被流放的3023名公社社员中，产业工人占81.4%，其中在第二帝国时期实行技术现代化的工业（冶金业，建筑业）部门的工人明显地占主要地位；反之，传统的行业（建材业，印刷业）则为起义提供了较多的军事干部。（见·J·鲁热里所著的《巴黎公社社员审讯录》，巴黎1964年版，第126—129页。）

(卡梅利埃, 泰兹), 机械工人(阿西, 朗热万), 装订工人(瓦尔兰), 首饰工人(弗朗克尔)。这场“由工人阶级进行”的革命(弗朗克尔语)想要为工人阶级的事业服务。但是, 由于时间所限和武装斗争的紧迫性, 巴黎公社只能实现一项微不足道的社会事业, 即禁止面包房做夜班, 取缔罚款和扣发工资的做法。

巴黎公社是一次社会主义革命吗? 诚然, 巴黎公社在4月中旬具有一个带有蒲鲁东主义色彩的社会主义纲领(《致法国人民的声明》), 而且显得不乏社会主义的言论。但在公社总委员会里, 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属少数派, 并处在四分五裂之中, 有布朗基派、蒲鲁东派、革命的国际主义者。而且作为真正的社会主义措施, 巴黎公社只通过4月16日法令, 该法令规定凡是雇主逃离的作坊, 由结社的作坊工人清理财产, 并重新开工。这项措施说到底是相当温和的。它仅仅触及到那些“逃离”作坊的雇主, 假如他们回来, 还可以领取一笔赎买金; 而这些由工人管理的合作社, 与其是真正实现生产资料的社会化, 不如象是路易·勃朗开办的社会工场。最后一点, 也是主要的一点: 巴黎公社在动乱中, 迫于形势, 打碎了旧国家机器; 新的国家则建立在人民享有充分的主权之上: 政府经过选举直接产生; 对议员与公务员不断实行监督, 并且可以罢免他们; 由武装起来的人民保障军人的安全和公民的秩序。巴黎公社最重要的社会主义行动, 归根结底, 难道不在于“公社的存在本身和公社的运转”(马克思语)吗?

巴黎公社作为“19世纪最后一次革命, 19世纪法国革命伟业的顶点, 是黄昏, 而不是黎明”(J·鲁热里语)吗?

我认为不是黄昏^①。巴黎公社既是夕阳，又是朝阳。

巴黎公社是一次回首过去的革命吗？是的。当时工人阶级的组织结构，同1848年6月时的情况还很相仿。有些革命者的头脑中还萦绕着雅各宾派的传统：国民对1792年的回忆，1792年至1794年巴黎的革命公社，公安委员会的专政，“迪谢斯纳老爹”的语言。仿佛社会主义穿着一身旧衣裳，衣裳太小，不合身，后来被巴黎公社撕成了碎片。

巴黎公社是一次展示未来的革命吗？是的。巴黎公社是工业时代爆发的第一次革命，但它具有姗姗来迟的经济和社会进化的重要意义。公社社员们象“冲天”的巨人那样（卡尔·马克思语）腾空而起，遭到了雷击，却赢得了殉难者的光轮。他们怀着建立一个不再是人吃人世界的希望。公社不仅是一部传奇般的和受人崇拜的史诗，而且是一个出色的试验场。马克思和列宁正是在巴黎公社的晨曦中，先后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概念。

^① 对于这个最初的论断，J·鲁热里以其知识分子的正直态度作了修正。（见他所著的《自由的巴黎》，巴黎1971年版，第245页。）

第二卷

从对立的宗派到统一的政党

第五章 四分五裂的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的复苏

在巴黎公社的岁月里，逐渐形成了一个新的、庞大的、恐惧和仇恨社会主义的社会阶层。巴黎公社失败后，公社社员遭到无情的镇压。“夏朗东的监狱和动物展览被安排在一起，让那些野蛮人鼻子串着一个耳环，全身都涂上红色的花纹，在冒着浓烟的社会废墟上跳着斯卡尔普舞”（泰奥菲尔·戈蒂埃语）。“出于对妇女的尊重，我们将不对这些野蛮人的女人评头品足，因为这些女人死的时候，同其他妇女没有什么两样”（小仲马语）。“这种疯子人多势众，串通一气，所以对我们这个社会来说，真是一个极其可怕的危险，以致除了彻底消灭以外，别无他法。”（1871年5月31日《高卢人报》）

保守派的《高卢人报》提出了“彻底消灭”的要求。《标准晚报》则写道：“囚犯们被成批成批地枪杀，然后被胡乱地扔进了为此专挖的墓坑。在此情况下，要想有一天搞清这场持久屠杀的受害者的准确数字，是一件办不到的事。即使对于刽子手来说，也完全不可能说清楚他们杀了多少

人。我们所知道的，就是巴黎继续进行着一场屠杀，这是从圣巴托罗缪节杀戮以来从未见过的。” 2万至3万人被杀，38500人被捕。无疑，被杀、被关和逃亡的总共超过10万人，约占巴黎男性工人的四分之一。

法国的工人运动从1872年开始重新组织起来，但它象失败以后的英国宪章派那样，走上了工联主义的道路。1876年10月，在激进派的主持下，在巴黎召开了带有蒲鲁东主义色彩的第一届工人代表大会。

革命的社会主义看来象“流血周”里最后一批被枪杀的公社社员一样断气了，但它却在某些地方分散潜伏起来了。布朗基派在伦敦，无政府主义派在瑞士，各自建立了流亡者核心组织。甚至在巴黎市中心的圣米歇尔大街上，也闪烁着斗争的火焰；在几个青年知识分子的推动下，建立了一个社会研究俱乐部。

在这些青年知识分子中，最杰出的是儒尔·盖德，他在马赛工人代表大会（1879年10月）上，成功地使工人运动和革命的社会主义两支力量汇合起来了。从马赛代表大会上流出来的还是一股虽把蒲鲁东派、马克思主义派、巴枯宁派汇合在一起，但对如何选择前进的航道犹豫不决的涓涓细流。在越过险滩之后，水流的方向明朗起来了，即初步形成了一些社会主义的政党，准确地说，初步形成了一些始终对立的宗派：工人党（盖德派），社会主义工人联合会（可能派或布鲁斯派），中央革命委员会（布朗基派），无政府主义派或极端自由派。因此，法国的社会主义一开始就以其政治思想上的四分五裂而引人注目，这就是它的软弱性产生的根源。

法国社会主义分裂的原因

社会主义在多数国家里，往往产生一个政党。诚然，这个政党分成不同的派别，并且因个人之间的争吵而发生分裂，但它毕竟是统一的党。那么，为什么在法国是个例外呢？我们可以找到三个原因：

一、社会心理方面的原因。在第三共和国初期，尽管（1873—1895年）物价形势不利于经济发展，但法国工业却继续发展和实现了技术的现代化。然而，工业的增长速度比较慢（1876年和1901年的工人人数均为315万，1911年则为472.6万人），旧的工业结构严重地阻碍着工业的集中。

工业结构具有极端的多样性，因而导致工人阶级的社会成份和思想状态非常混杂，对此有许多划分标准。

1. 企业大小和劳资关系的标准。据此，可以划分四类工人：

——家庭工人，如服装工人，他们遭到超重的剥削，但远离其贫穷的伙伴。

——国家工场或小企业（印刷业，建材业，建筑业，小冶金业）的工人，他们在老板身旁干活，经常用“你”来称呼老板。

——在纺织业的“重劳动场所”干活的无产者。

——在矿山干活的无产者。矿山的老板作为拥有雄厚的财政实力的集体和股份有限公司的老板，实行有效的家长制统治，因为他们向雇佣劳动者提供住房、公园、消费合作社、互助会、娱乐活动等。

由于社会地位不同，看问题的方法不同，上述各种不同类型的工人对资本主义剥削方式的感受也不同，因此，他们的

阶级觉悟水平也不尽相同。

2. 工人的技术程度和工资的标准。这里举两个极端的情况。首先是技术熟练程度高的工人，如冶金工人，印刷工人。他们常常为其高超的技术感到自豪，热爱自己的职业；由于文化程度较高，报酬较丰，他们在精神和物质方面拥有较好的斗争武器；但另一方面，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很容易迁就资本主义；于是，他们不是寻求集体的、社会的解决办法，而是谋求个人境况的改善，陷入狭隘的行会主义。与此相反，纺织工人技术程度低，报酬少，心里害怕明天的生活没有着落，对老板的专制逆来顺受。上述状况造成工人的反应，因人而异，有时也因地而异：有不堪命运重负、卑躬屈膝的工人所持的屈从和消极的态度；有奋起造反，朴素的憎恨社会的态度；还有对即将爆发解放革命的希望，以及真正的革命的“救世主降临说”。

3. 工业部门新老的标准。由于组织和斗争的传统，在有传统组织扎根的工业部门，如在纺织业和冶金加工业部门，便于执行为斗争所必要的纪律。这些工业部门中往往是工人世家：从童年时代就目睹苦难生活和斗争的情景，从小就经历贫穷的生活，从而促使阶级觉悟迅速早熟。反之，事实证明，新建的工业地区（如默尔特-莫泽尔）和新兴工业部门（化学工业）对社会主义和工团主义来说是不毛之地；尤其是因为，这些工业地区和部门的工人大多出身于农民和手工业者家庭，他们梦寐以求的是通过获得财产，重新获得做人的独立和尊严。

4. 城市化的标准。大城市工人的感受和反应与小城镇的工人不同，因为后者的社交更加有限，眼界更加狭窄，那种专门经营单一工业的小镇的工人更是如此。

所有这些社会学的因素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有时则矛盾地交织在一起。此外，它们施加的影响从来也不是无意识的，可以说，从来也不是必然的。人们至多可以说，有的工人组织已被证明比其他工人组织更易于接受社会主义，更易于接受社会主义的派别。

二、历史方面的重要影响。法兰西作为革命之乡，具有雅各宾派和巴黎公社社员的传统，以及由马克思主义以前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残存下来的遗产。

三、第三共和国时期法国政治生活的状况。代议制的第三共和国及其实行的自由，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扩散；而镇压制度（如俾斯麦德国实行的镇压制度）自然导致社会主义者统一起来，具有坚强有力的组织和纪律。再有，工人阶级对其亲自建立、培育和保护的第三共和国表示由衷的热爱，这就抹煞了（或者可能抹煞）其阶级觉悟。“捍卫共和国”作为一种神圣的义务，使得工人阶级难于同“资产阶级共和国”决裂，甚至觉得这种决裂痛苦不堪。

法国工人党（盖德派）

在经历动荡不安、以激烈争吵为特点的共处时期以后，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各个成员重新获得了自由。盖德派在1882年秋天举行的罗昂代表大会上自称是一个要成为工人阶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革命政党的独立组织：工人党。工人党由两位才华横溢、彼此个性不同、但又相辅相成的人物来领导，他们是盖德主义的鼻祖、工人党的创始人、政治领袖、伟大的演说家儒尔·盖德和马克思的女婿、工人党唯一真正的理论家保尔·拉法格。

直至1890年，盖德派还是一个前后才汇集几十名、几百

名传道者的小派别。虽然这大批人缺少各种物质手段，但他们却以其移山一般的信念和热情，做普及马克思主义的工作，同对立的思想意识进行论战，向当时对巴黎公社失败感到气馁的工人运动显示了社会革命即将来到的幻景。但这种革命的“救世主降临说”是同某种教条主义相连的，所以，它促使盖德派——当然，盖德派也意识到自己的软弱——忽视共和法制所提供的武器，蔑视改良，依然置身于布朗基派的伟大斗争之外。

盖德派是在1890至1893年期间脱胎换骨的。派别变成了政党，变成法国第一个拥有地方和地区组织、全国领导机构和全国性纲领的现代型的政党，变成一个不再将党的活动局限于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教育工作，而且努力参加重大政治讨论的政党。在其发起的1890年和1891年的“五·一”活动日里，工人党显示其领导大规模群众运动的才能。这样，盖德派党员人数增加了（1889年2000人，1893年1万人），并且大大地增加了选民人数（在1889年议会选举中得票2.5万张，1893年得票16万张）。从此，盖德派成为法国最强大的社会主义派别。

工人党的鼎盛时期是在1893至1899年。当时，党的选民人数达到了最高点（1898年为29.5万人，占社会主义选民票数的40%，占登记选民总数的2.7%），党员人数也达到了最高点（1.6万至1.7万人，将近法国社会主义组织力量的一半，但仅占法国总人口的0.04%）。工人党发展和完善其党内组织，但党的这种发展本身和党对政治生活的参预却导致党的社会成份和党的理论发生重大的变化。法国工人党倾向于放弃革命的前景，以使用议会斗争的合法方式去夺取政权。

工人党的最后一个阶段（1899至1905年），是盖德派试图重新掌握法国工人和社会主义运动革命的领导权，但这种尝试遭到挫折的历史。德雷福斯事件及其诱发的政治动乱，尤其是米勒朗入阁和左翼集团成立，向革命的社会主义直截了当地提出了一些棘手的和基本的问题：应当在何种程度上支持激进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应当在何种基础上建立必不可少和不可避免的社会主义的统一？盖德派在回答这些问题时，从理论上和政治上进行了纠正，并鼓吹对入阁派实行阶级政策。在此基础上，盖德派同瓦扬派一起，建立了一个统一的革命党：法国社会党^①。可是，这种突如其来的纠正，很难被工人和同情社会主义的群众所理解，他们把盖德派看成是不可救药的宗派主义者，认为盖德派支持“要么拥有一切，要么没有一切”的政策。因此，盖德派丧失了元气和影响，他们也就无法成为最终于1905年实现统一的社会党的中坚力量。

在迄今为止深受经验主义影响的法国工人运动中，盖德派注意和重视思考问题，特别是注意和重视理论宣传，这是盖德派同其对立的社会主义派别之间存在的显著区别。

第二个特点则更为重要，即盖德派把马克思主义^②引进了法国工人阶级。他们翻译并转载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重要文章，如《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保尔·拉法格摘译自《反杜林论》）和《共产党宣言》。盖德和拉法格则主要通过他们自己所写的小册子、文章和他们多次召开会

① 原文为Le Parti socialiste de France——译注。

② 马克思的著作当时在法国几乎无人知晓。《哲学的贫困》这部著作于1847年在巴黎出版，似乎没有留下任何痕迹；而《资本论》第一卷在1872至1875年期间发表，只接触到一小部分知识分子。

议，来普及马克思主义的某些主要论断。他们向工人揭示了资本主义剥削的各种齿轮和机器；他们有力地强调指出，生产的社会性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存在着基本矛盾，而这种基本矛盾不可避免地要导致破坏资本主义，因此只能通过生产资料的集体化来加以解决。那么，怎样为这种社会主义社会开辟前进道路呢？要通过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人类历史的动力，只有阶级斗争才能摧毁有产阶级为维护其特权而建造起来的那些坚固的堡垒，尤其是要摧毁国家这个“资本家阶级的巴士底狱”。最后，盖德派在富有雅各宾派爱国传统的法国工人阶级中，传播了《共产党宣言》全文的最后一句话：“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普及宣传马克思主义如同一切基础教育那样，要求简明扼要，要求用图解形式，尤其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崭新的和极其复杂的理论^①。盖德派固然是卓越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家，但除了拉法格以外，他们都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甚至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记住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重要结论，远甚于记住其思想方法；他们运用马克思主义，好象使用一部杰出的革命药典，有的甚至好象使用一部灵丹妙药集，而不是用马克思主义作为分析19世纪末法国经济、社会和政治特点的方法。但按照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意愿，只有同实践紧密联系，马克思主义才会有确定的形式，才能行之有效。盖德派不是把这个观点当作认识的源泉和标准，而是把一些甚至同法国现实脱离的万能的公式硬贴到法国的现实上去。

这种教条主义的做法阻碍着盖德派去解决那些由于时局

^① 应当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好几部主要著作当时均未翻译过来，因此鲜为人知，甚至连工人党的领导人也是如此。

发展和党的力量增长本身而产生的复杂问题。对于那些用矛盾的语言——改良和革命，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等提出来的重大问题，盖德派提不出用辩证的、综合的方式解决问题的答案，而是在不同的时期脱离或忽视问题的这个方面或那个方面。

当盖德派只是一个封闭的派别时，他们只是把革命的不妥协和急性病当作信条来看待，他们蔑视改良、普选制和共和政体的自由；他们摒弃爱国主义。1890年以后，工人党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社会主义登上了政治舞台，这些都表明了他们这种宗派态度徒劳无益。他们便逐渐地走上了议会制、改良主义和民族主义的道路。但是，到了1899年，米勒朗主义突然显示了走这种机会主义道路的危险。于是，盖德派转过头来汲取革命的源泉。

由于同现实世界接触很少，盖德派制定不出一种战略，制定不出一条联贯一致和有连续性的政治路线：在同工会的关系中，在同其他社会主义派别的关系中，或者在同第三共和国发生重大危机（布朗热主义，德雷福斯事件）时，他们往往表现得笨头笨脑，采取宗派主义和徒劳无益的粗暴态度。

法国工人党鼎盛时期的组织情况究竟怎样呢？

产业工人占党员人数的60%。但是，随着有些党员在党内等级的上升，这种工人的特点逐渐削弱。纺织工人，特别是织布工人，占了盖德派争取到的产业工人的1/4。这是因为，纺织工人往往是工人世家，他们注定一辈子作工，住在墙壁斑驳杂色的、条件简陋的工人住宅区（诺尔省有名的“死胡同”区）；他们遭到好斗老板的超重剥削，富有悠久而坚强

的斗争传统，比较容易具备革命的阶级觉悟，并且受到盖德派的“救世主降临说”的吸引。冶金工人的党员人数占第二位（占盖德派中产业工人的1/7），高于那些或多或少带有手工业劳动者色彩的行业——建筑业、制鞋业和建材业工人的党员人数。

小商人仅次于产业工人，在党内占第二位（占党员人数的17%）。他们主要是商品零售商、小酒店老板、商贩，由于职业的缘故，同市民和工人选民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工人党在那些更加独立自主的小农业经营者中间，也拥有农民的基础（占党员人数的7%），他们主要是一些劳动条件同手工业比较接近，在交通条件很早就打破农村与世隔绝状态的地区——普罗旺斯、朗格多克、香槟等地种植葡萄和观赏植物这些经济作物的农民。

在盖德派的组织分布地图上，呈现出三个大集团：

1. 法国的北方工业区和纺织工业区（尤其是后者）：里尔的城市联合体，生产罗纱的加莱，生产针织品的奥布。力量雄厚的北方省委（包括诺尔和加莱海峡两省）占党员人数的一半。

2. 法国中部地区（罗纳河口省，加尔省，埃罗省，奥德省，吉龙特省）。工人党在这里继承了雅各宾派和民主派那种悠久而坚强的斗争传统（1849年的山岳派，抵制12月2日政变，共产主义者在外省举行的起义）。但是，由于在理论上和组织工作上的模糊立场，盖德派在这个1898年曾为法国工人党提供其12名议员中的7名的老的民主集团里，只构成激进社会主义的一个先进派别而已。这个派别不大巩固，在米勒朗主义危机时脱离了党。

3. 法国中东部地区（阿利埃省，罗纳省，卢亚尔省，伊泽尔省）。建立党组织的经济—社会因素（蒙吕松的冶金业，罗昂和罗纳的纺织业，伊泽尔的皮革业）和历史因素，在这个中间地区得到了集中的反映，并且达到了平衡。但盖德派在这里，充其量是中间势力，介于北方工业地区负有社会主义“使命”的“马克思主义工人党”和南方各省的“激进社会主义工人党”两者之间。

在法国工人和社会主义运动史上，盖德派谱写了伟大的篇章。作为促使因凡尔赛分子镇压而负伤流血的工人运动复兴的伟大创始人，盖德派将马克思主义引进了法国，进行了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并且创建了第一个独立的工人阶级政党，一个有组织、有纪律的阶级政党。这是走向建立现代法国社会主义的一个决定性的阶段。如果说在图尔代表大会上分裂出来的两个社会主义分支^①至今还自称是盖德派的继承人，那是毫不奇怪的。

中央革命委员会（布朗基派）

尽管巴黎公社被扼杀了，但是，有两个火炉仍然燃烧着布朗基主义的火焰。

首先是布朗基本人。当然，这是一个业已老态龙钟，精疲力竭，头脑迟钝的布朗基。这个外号“囚犯”的幽灵于1879年被释放出狱后，便放弃了革命，倾向于激进主义。1881年1月1日，布朗基与世长辞，享年76岁。

^① 指1920年图尔代表大会上分裂出来的多数派和少数派。以加香和弗罗萨尔为首的多数派同情布尔什维克革命，创建了法国共产党。少数派则跟随莱昂·勃鲁姆，仍用法国社会党的名称——译注。

其次是“革命的公社”。巴黎公社流放者中的布朗基派在伦敦重新集合，组成了一个秘密会社，其会员“保证服从那种曾使布朗基派组织在帝国时期取得成功的绝对的纪律”（C·达·科斯塔语）。这个由欧特、格朗热和瓦扬领导的团体发表了一份《致公社社员的宣言》（1874年），阐明了布朗基派的无神论、共产主义和革命的观点。

这些在成分混杂的工人党内经过1880至1881年短暂实习期的布朗基主义者，于1881年6、7月间成立了“中央革命委员会”。这个团体虽然不是秘密社团，但也相当封闭，以致不用“政党”的名称和放弃召开代表大会。

然而，作为一种明显的反常现象，这些旧日密谋者的弟子对其同大众的联系有一种极其敏锐的感觉。他们继承了长期革命实践的传统，善于改变其活动方式，并且临时装扮成普通群众。为了阻止朱尔·费里入主爱丽舍宫，他们组织了“捍卫共和国同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1887年12月）。他们不仅组织了“同盟”和“人民活动日”，而且高度重视各种各样的工人斗争，积极支持工人罢工，支持失业者运动，并且愿意促进在社会党外建立一个独立的、单一的和强大的工会联合会。瓦扬的传记作家M·多芒热写道，爱德华·瓦扬是“法国总工会的鼻祖”。

在中央革命委员会内部，逐渐产生了两种相互对立的派别。一方面，正统的布朗基派（欧特，格朗热）忠于布朗基的传统，但是，此时的布朗基已经年迈力衰，墨守成规；另一方面，由爱·瓦扬率领的“少壮派”注意对布朗基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进行综合，并制定一项同当时新的合法条件相适应的战略。布朗热主义已经完成了布朗基派的分裂（1889年8月）。尽管爱国的布朗基派否认自己是布朗热主义者，但

他们在格朗热的带领下被招兵买马，加入了勒旺什将军的军队。然而，这支军队遭到了惨败，从而导致了格朗热营队的覆灭。

此后，瓦扬作为中央革命委员会无可争辩的领袖，把这个封闭的派别逐渐改造成为一个广泛开放的政党。经过这个演变过程，于1898年7月1日创建了“革命的社会党”。1902年，瓦扬派同盖德派接近，并对德雷福斯事件和米勒朗入阁事件危机作出与盖德派相同的反应，从而实现了在法国社会党内部同盖德派的联合。

与法国工人党不同，中央革命委员会看来很少空谈理论；瓦扬本人从未努力地深化其理论，也从未完整地阐述其思想。在瓦扬派的宣传工作中，理论普及工作只占一个无足轻重的地位。究其原因，是否同情法国工人运动中那种漠视理论的态度呢？是否忠于布朗基这位马克思主义以前最不喜欢空谈的社会主义理论家呢？毫无疑问，是因为瓦扬派同那些反对分裂法国社会主义的派别和理论、捍卫社会主义统一的人背道而驰。

瓦扬派的思想，与其说是一种创新的思想，倒不如说是一种传统的思想。在奠定其行动的理论基础的1892年“声明”中，中央革命委员会保证说，它“历来打算沿着法兰西人民革命传统的道路前进”。它永远坚持雅各宾派革命的爱国主义和对直接民主的向往；作为巴贝夫派和布朗基的继承者，它大声宣布自己是“无神论者、共产主义者和革命者”。它继承布朗基派和巴黎公社社员的传统，指出“军国主义和专制政治”是其“最直接的敌人”。与此同时，“在现代社会主义的光辉照耀下”，中央革命委员会多次借助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它“承认工人阶级反对资本家阶级的斗

争是现今社会主义的特点，是其行动的指导原则”；它还表明自己是国际主义者。瓦扬派还同盖德派一道，共同组织了巴黎国际代表大会（1889年7月），从而产生了第二国际。

由于缺少党员人数的统计数字，现在只能用中央革命委员会在竞选中取得的胜利成果来衡量党的发展情况。1889年有2名众议员，1893年增至5名，1898年增至8名，1902年仍保持8名（尽管当时革命的社会党同法国工人党一样，处于低潮阶段）。

瓦扬派的主要堡垒是塞纳省^①。巴黎作为街垒斗争和革命的首都，空想社会主义的摇篮，却回避盖德派，盖德派的组织基础几乎只在外省。中央革命委员会则继承法兰西的一切革命传统，同阿勒马派一道，在巴黎充当革命的社会主义的化身。它依靠那些100年来参加一切重大革命运动的老行会，其中有小规模的金工业、精密仪器工业、建筑业、建材业和皮革手工业的行会。从地理上看，中央革命委员会的主要基地在巴黎的北部工人住宅区（第十八区，第十九区，第二十区），第十五区，北郊（圣德尼）和南郊。

瓦扬派的第二个大根据地，处于中央高地的北部边区。瓦扬从1880年起，开发其故乡谢尔省；然后，瓦扬派扩大到附近各省：安特尔，尼埃弗尔，阿利埃（科芒特里地区）。从这整个地区来看，主要是在冶金工人和矿工中间发展党的选民，在农村则在樵夫中间加以发展。

瓦扬派在法国其他地区还拥有几个孤立的强大堡垒：德拉吉涅昂区，中央高原的西部地区 and 西南地区，卢亚尔河的

^① 塞纳省当选的议员，1893年在中央革命委员会的5名议员中占3名，1898年和1902年在8名中各占5名和6名。

下游地区，以及某些大城市（里昂，图卢兹）。

中央革命委员会作为共产主义和革命的派别，由于深受马克思主义的熏陶，早就是最接近法国工人党的派别。但瓦扬比盖德“更善于观察工人阶级自发的反应”（布拉克语），因而更深刻地理解权利、斗争和改良既对改善工人条件，又对准备走革命道路具有极其重要意义。由于关注劳动者要求统一的深切愿望，瓦扬派成为在行会和政治方面捍卫工人统一的战士。瓦扬派来源的多样性，同其他各派的接触，使它变成了法国社会主义的中心。

社会主义工人联合会（布鲁斯派）

社会主义工人联合会同盖德的工人党是在马赛工人代表大会（1879年）上诞生的一对孪生兄弟；但这对兄弟很快就变成了政敌，它们之间存在着以下几个基本分歧：

1. 布鲁斯派反对盖德要建立一个集中领导的政党的意愿，公开主张在小组自治的基础上建立一种权力分散的组织结构。此外，这种自治派别汲取法国革命的工人运动（包括巴黎公社）的传统经验，并且满足成份混杂、组织分散、阶级觉悟尚低的工人阶级的愿望。

2. 由此，布鲁斯派声明反对单一的、无视地方状况特点的纲领；何况这个纲领是马克思和盖德1880年5月在泰晤士河的浓雾中制定的。在布鲁斯派看来，它很难适合法国工人运动及其传统和要求。布鲁斯派强烈谴责那些“马克思主义的狂热信徒”，说那些社会主义的“绝对权力主义者”从伦敦接受指令。

3. 在这些意见分歧后面，掩盖着革命者和改良主义者之间的基本对立。“要么拥有一切，要么没有一切”的年代似

乎已经过去了……旧政治，就是分成小派别，就是理论——幻想——愿望——无所事事。新的政治，……则是一贯坚持其党纲中的共产主义完整性、将科学所能预见到的全部理想正式写到党旗上去的伟大的工人党；但工人党“是在可能性的阵地上，坚持日常的斗争，从而一步一步地实现其理想。”（保·布鲁斯语）由此，盖德派用“可能派”的绰号来嘲弄布鲁斯。

4. 在这些意见分歧之上，还存在着个人的对立，尤其是布鲁斯和盖德之间的对立。

在圣艾蒂安代表大会（1882年9月）上做了分离的“外科手术”。盖德派作为少数派，单独到鲁昂去召开代表大会。

可能派在圣艾蒂安代表大会上，通过了一项比较温和的纲领。其动机同借鉴马克思起草的第一国际开幕词密切相关，马克思当时不得不与法国的蒲鲁东派共同起草了这个文件。

社会主义工人联合会的纲领和理论建立在布鲁斯提出的“公共服务”的理论上面。布鲁斯认为，资本主义通过竞争和集中的手段，最后自然进化到垄断；反过来，垄断通过其权威受到威胁的资产阶级国家的干预，倾向于成为国家对公共事务的管理，或者倾向于成为公用服务。社会主义者的任务在于加速这种自然导致社会主义，导致集体所有制的演变过程。在第一阶段，由社会主义通过选举掌权的市镇将大公司（水、照明、运输）的垄断改造成为由工人行会进行管理的市镇公用服务事业，并且创建用于吸收失业工人的市政工业部门。如果这一设想取得成就，就会发生象墨迹扩散一般的反应，从而使社会主义在不经过暴力革命的情况下，逐步地取代资本主义；这种取代是轻而易举的，尤其是因为工人们通过对市政机构和公用服务事业的管理，来获取必不可少

的行政管理能力。从这个理论中产生了布鲁斯派两个显著的特点：

1. 布鲁斯派非常关注市政方面的成就。“市政问题占了社会问题的一多半”（布鲁斯语）。

2. 布鲁斯派强烈希望，只靠和平手段、普选制和改良，就足以使社会共和国获胜。

改良主义、选举主义、高度“联邦化”的政党组织以及对工会运动的重视，所有这些方面，社会主义工人联合会同英国工党显得何其相似。

在政治斗争中，社会主义工人联合会象激进主义者的先进派别一样进行战斗，即在一个基本相似的政治纲领基础上，建立大致上有系统的竞选联盟，在“卡代委员会”中成为反布朗热主义的辅助力量。

然而，在社会主义工人联合会内部，发展了一个由阿勒马组织的革命派别。1890年10月，阿勒马实行分裂，组建了一个独立的政党。这样，丧失活力的社会主义工人联合会受到了致命的打击，变得奄奄一息，直至19世纪末为止。

布鲁斯派如同瓦扬派一样，是一个基本上以巴黎为基地的政党。布鲁斯派的选民和党员主要来自巴黎市中心（第十一区）和巴黎郊区（第十二区，第十三区，第十五区，第十七区，第十八区，第十九区，第二十区）的职员、手工业者和手工业工人。除了巴黎地区以外，社会主义工人联合会拥有一些分散的基地：由巴黎公社诗人J·B·克莱蒙开发的阿登省；几个地处中央高原的孤立的工业中心：勒-克勒佐，圣艾蒂安；法国中西部地区：卢亚尔-谢尔，安德尔-卢亚尔，维恩。在1890年流血斗争以后，社会主义工人联合会仅

仅在塞纳省和中西部地区保留几个据点。

革命的社会主义工人党（阿勒马派）

阿勒马派象瓦扬派一样，处在革命的传统同一些多种多样的、有时相互对立的社会主义派别的汇合之处。

革命的社会主义工人党的纲领受到了《平等者宣言》（1796年）、《共产党宣言》（1847年）和《国际工人协会宣言》（1864年）的三重影响，特别是受到后者的影响。然而，党从其领导人巴贝夫和马克思那里借用的只是几个革命的用语而已。从根本上说，阿勒马派长期发扬了两大传统——埃贝尔派的传统和巴黎公社社员的传统，并且汲取了以改良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这双重变种面貌出现的蒲鲁东主义的思想源泉。最后，作为其引以自豪的“工人党”，阿勒马派反映和加强了现代工人运动中的某些倾向：以神圣的方式，崇拜无产阶级的自发性，崇拜无产阶级的实行革命和社会主义的本能，强烈地蔑视“思想意识”。总之是一座混杂而易倒的理论大厦。

阿勒马派从其布鲁斯派的历史中，完整无缺地保留了对市政社会主义、“公用服务”理论的信心，并且几乎原封不动地搬用了社会主义工人联合会（参加议会选举、市政选举的）竞选纲领。然而，他们给这种改良主义披上了革命的外衣，他们申明自己是一个以“区分阶级”为基础，以建立共产主义为最终目标的“革命行动党”。

阿勒马派从巴黎公社社员的遗产和巴枯宁派的烙印中得到了启示，在学说、宣传和活动三方面确立了几个基本观点。

1. 战斗的反军国主义。这种反军国主义是靠对凡尔赛镇压公社的历史回忆滋长起来，并说明了阿勒马派何以在德雷

福斯阵营中进行坚决而为时过早的干预。

2. 激烈的反议会主义。人民应当通过直接的立法权，来充分行使其全部主权^①。

3. 在革命取得胜利的第二天，无产阶级不是要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而是要建立一个由“唯一的行政管理机构”取代国家的、自由的市镇联合会。

简言之，在真诚而深切的革命愿望同自愿的改良主义实践之间，存在着一种惊人的和不可克服的矛盾。

较之其他社会主义派别，革命的社会主义工人党表现出两个明显的特点：工运中心主义和对工人运动的态度。

埃贝尔派的平民传统，对第二帝国英雄时代的回忆（工人的候选人资格），使厌恶“政客”、不相信“领袖”、怀疑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理论博士”的背叛这种自发的工运中心主义滋长起来了。党的鼓动者们以体力劳动者为荣。难道阿勒马不是唯一从事工人职业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领袖吗？党组织的权力非常分散，但它却对党的议员和领导人实行严格的监督，甚至有些吹毛求疵。

阿勒马派相信经济斗争高于政治斗争，因而赋予工会头等重要的作用，认为工会是无产阶级进行防御和进攻的最好武器。

1. 只要资本主义继续存在，工会就能使工人捍卫其根本利益。

2. 为了打倒资本主义，阿勒马派高举放下工具，举行总罢工的旗帜，认为这是“争取经济改革，造福于全人类的唯

^① 反军国主义和直接立法权，这是阿勒马派和瓦扬派作为巴黎公社共同继承人的两个共同点。在反议会主义这点上，阿勒马派同无政府主义者很相似。但它与无政府主义者相反，以宣传的名义参加竞选运动。

一手段”。

3. 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工厂的管理者不是国家，而是工会，因此从现在起，工会的使命在于“使工人适应于将来在集产主义制度下应起的作用”。

阿勒马派同以官僚主义方式使工会紧紧地从属于党的盖德派相反，使党几乎专一地为一团主义服务，这在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是个例外。

阿勒马派的这种特点部分来源于党组织发展工作，反过来，又在很大程度上说明党组织扎根地区的群众基础。

革命的社会主义工人党向中央革命委员会争夺塞纳省的革命的工人选民。这些选民大多数是手工业工人，制帽工人，木器工人，箍桶工人，建筑工人，而且还有许多铁路工人（其中阿勒马派的盖拉尔领导全国铁路工会）和冶金工人。巴黎市中心的革命老区（第三区，第十区，特别是第十一区）构成了阿勒马派的高大的主塔，而环城地区（第十四区，第二十区）以及北郊区和东郊区则是位于主塔侧旁的几座重要的塔楼。

革命的社会主义工人党在外省的力量，除了几个孤立的基地以外，都集中在法国的东北部：在J·B·克莱蒙个人影响下的阿登省；由汝拉的巴枯宁派开发的省份：先是汝拉、杜布、埃思各省，后来是萨奥纳—卢瓦尔河、黄金海岸、伊奥纳各省。

可是，革命的社会主义工人党瓦解了。继1896年党的议员造反之后，它在巴黎遭到了一次严重的损失^①，不久后又

^① 这些分裂主义者建立“共产主义联盟”，该组织同瓦扬派结盟。

发生阿登、汝拉和杜布各省党组织的分裂。此后，阿勒马派越来越走向消亡，化为革命的工团主义派，同无政府主义派一道，成为革命工团主义的主要创始人。

无政府主义派^①

尽管有形形色色的无政府主义派，但他们都自诩是蒲鲁东的门徒。他们所指的那个蒲鲁东——因为有好几个蒲鲁东——想要摧毁任何（政治、经济和道义的）权威，并依靠联邦主义和互助主义来建立自由和福利的统治地位。

战斗的无政府主义是在第一国际内部，在“反权威主义者”或巴枯宁派反对马克思的斗争中形成的。工人国际里昂支部于1870年9月28日进行的起义尝试是无政府主义在法国的第一次斗争，但起义未遂。经过“浴血的一周”，流亡瑞士的巴黎公社社员走在“反权威主义者”反对马克思和第一国际总委员会的斗争前列，并投身到巴枯宁派汝拉省委的麾下。

无政府主义派起先属于巴枯宁派这个尚未定型，杂七杂八，于1879年在马赛代表大会上决定宣布成立的党。1881年5月，他们脱离了巴枯宁派，并将早在1871年以前曾遭到巴枯宁派侵蚀的南方省委（马赛）和东部省委（里昂）随身带走。但与盖德派、布朗基派、可能派相反，无政府主义派仍然是一个由地方小组和个人组成的、甚至没有统一理论的、不合法定的集体。

一位最杰出的无政府主义传道者塞巴斯蒂安·富尔写

^① 这里，我们广泛利用了专门研究法国无政府主义运动的历史学家J·梅特隆的成果。

道：“现在既没有，也不可能有极端自由派的信条和教义……有好几种无政府主义者，但他们都有一个区别于其他各派的共同点。这个共同点，就是否定社会组织中的权威原则和憎恨一切来自以此原则为基础的组织机构的束缚。因此，谁否定权威和斗争，谁就是无政府主义者。”

所以，从消极意义上讲，无政府主义的定义，首先就是拒绝任何权威。这种权威包括政治（国家）、经济（资本）和道德（宗教）三个基本方面，以及祖国、家庭等次要方面。无政府主义派绝对优先考虑反对国家的斗争，他们打算将国家彻底消灭。他们要在权威的废墟上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呢？要建立一个极端自由的、联邦主义的社会。“未来的社会组织只应自下而上，通过自由的工人联合会和联邦来建立，首先建立联合会，其次建立市镇、地区、民族，并且最后建立一个国际的和全世界的大联邦。”（巴枯宁语）要建立一个高举“按需分配”旗帜的共产主义社会。这个共产主义和极端自由的、实现无政府主义两大目标——福利和自由的社会，将建立在声援和互助的伟大道德原则之上。

无政府主义派的行动手段是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的，而且在同一个时期里也因人而异，或因派别而异。不过，这些行动手段服从某些共同的原则，即使在许多“义勇军”那里也是如此。

1. 认为只有行动的少数派才能创造历史。“大多数人不堪贫困的重负，由于迷信而变得愚钝，死于卑贱的生活。在现今这样的社会状态里，人类的命运取决于极少数个人的行动。”（马拉泰斯堪语）例如，在反对军国主义的斗争中，无政府主义派只能在临阵脱逃和个人反抗之间作出选择。

2. 敌视任何常设组织，但工会除外。

3. 拒绝使用合法的斗争武器。无政府主义派用弃权主义反对普选制和代议制的大骗局。

4. 相信任何改良都是幻想，相信只要雇佣制存在一天，任何改善工人条件的许诺都无法实现。因此，部分罢工仅仅是一种为革命的总罢工做准备，即为革命做准备的极好的演习。

无政府主义派在其前10年中，探索前进的道路，并强调宣传工作。Z·米歇尔、格拉夫、布热、S·富尔、克鲁泡特金的讲话、报纸、小册子提倡“用事实来进行宣传”，提倡直接的行动。但无政府主义派的行动依然很少，只是搞几次个人的谋杀，在失业者的群众运动（1883年）中发挥领导作用，歌颂集体的和自发的暴动（如在1886年德卡兹维尔罢工中谋杀工程师瓦特兰）。

1892至1894年期间，无政府主义派在俄国虚无主义者榜样的鼓舞下，加倍地进行谋杀活动。拉瓦肖尔发出了信号：奥古斯特·瓦扬在众议院里，把一颗炸弹扔到了“饕餮之徒”身上；E·亨利把炸弹扔进了圣拉扎尔车站的“终点站”咖啡馆；卡兹里奥用匕首行刺了拒不赦免A·瓦扬的共和国总统萨迪·卡尔诺。

在这种个人恐怖主义失败引起失望情绪之后，无政府主义派采用了新的策略，取得了累累硕果。他们通过工会的渠道去争取工人群众。这种行动依然是“无政府主义派特有的行动”，因为“在群众中间，行动的少数派进行的活动比群众自己更多”（梅特隆语）。由于同阿勒马派结盟，由于高举开展剥夺财产和争取解放的经济总罢工的旗帜，无政府

主义派从工会运动的领导机构中，成功地把盖德派排挤出去，并且在信奉盖德主义的全国工会联合会的废墟上，于1895年成立了“法国总工会”。象贝鲁蒂埃这样的无政府主义的活动分子，以其忠诚和才华，赢得了工人群众的信任，并逐渐占据了工会的领导岗位。革命的工团主义成为法国总工会的主导思想。然而，法国总工会在被无政府主义派（和阿勒马派）征服以后，反过来征服了这两派的活动分子。经过这次起落，无政府主义派没有重新站立起来。它蜕化为一个“违法”的派别（有名的“波诺帮”），把偷窃和谋杀当作革命行动。

无政府主义派始终只有极少数活动分子（几百人），但他们却赢得了周围群众广泛的同情。之所以产生这种辐射作用，可以用下述两点来加以解释：蒲鲁东主义长期作为法国工人运动的主导思想，在群众中打下了深刻的烙印；革命的社会主义向议会斗争的演变、组织上的分裂和软弱无能，在群众中造成了失望的情绪。

看来有三类社会阶层更加受到无政府主义派担负的“使命”的吸引：

1. 纺织工人（鲁贝，兰斯，鲁昂，里昂，维恩）和粗工接受反抗这种暴力的初级形式；作为受到超重剥削的无产阶级，他们很自然地沉沦于宿命论的麻木状态，转变为具有微弱的革命愿望，反之亦然。

2. 手工业者、小店主（鞋匠，裁缝，木匠，理发匠），刚刚沦为无产者的工人义愤填膺，把语言上的、有时行动上的极端革命主义作为摆脱困境的办法。

3. 某些知识分子和大学生受到那种被当作行为准则的、不循规蹈矩的做法的吸引，受到极端自由派的革命的浪漫主

义的吸引；有些作家——里什本、米尔博，韦尔哈伦，戴斯卡弗，马拉美和瓦莱里为无政府主义派的报刊撰稿；有些艺术家——毕加索，吕斯，西涅亚克，瓦洛东和斯泰朗则表达了对无政府主义派的同情。

多亏J·梅特隆的著作驱散了四分之三世纪以来极左翼把无政府主义派同捣乱分子相提并论这种根深蒂固的无稽之谈。诚然，警方在无政府主义派团体中安插了许多告密者和特务，政府还利用、有时甚至还煽动无政府主义派的谋杀活动。但是，无政府主义派在社会主义大家庭里占有一席之地，并且成为法国工人运动中一个显赫一时的派别。无政府主义，用专门的术语来说，“无政府—工团主义”，在某些工人行业和某些地区已留下了，并且至今还留下深刻的痕迹：对组织、教育和宣传工作急于求成；相信工人的自发性；敌视一切政党，并加以全盘否定和谴责；反对议会制；相信经济斗争是主要的阶级斗争，因而认为有了工会就有了一切；认为罢工是革命的演习；有点陶醉于革命的、反宗教的、反军国主义的漂亮话。

独立社会主义派和饶勒斯

独立社会主义派是这样一些人的混杂的联盟：他们拒绝屈服于一个“派别”，象新闻记者、议员一样，愤怒地反抗任何纪律和任何“极端专制主义”；他们在学说方面热衷于折中主义，并且经常有意或无意地关注社会主义统一的问题。这个混合体倾向于逐步恢复社会主义的老组织机构；它的温度和成份因派别而异，因人而异；它同革命的社会主义、改良的社会主义和激进的社会主义三者的界线则显得很不明确。

直至1893年选举为止，有几个小组、几个人在独立社会主义派的主持下，人为地联合起来了。一方面，是两位才华出众的记者、真正革命的老巴黎公社社员：“起义者”儒尔·瓦莱斯及其日报《人民之声报》，利萨加雷及其机关报《战斗报》；另一方面是贝努瓦·马隆及其《社会主义杂志》。

贝努瓦·马隆7岁时当过牧童，目不识丁，23岁时当上染布工人，自学过希腊文、拉丁文、英文、德文，酷爱哲学和政治经济学。这位杰出的自修者无疑是一个平凡的理论家，但他业已成为一个来自工人阶级的新型的知识分子。马隆在《完整的社会主义》中阐述的学说，是要把法国的观念形态的社会主义同马克思主义这两者综合起来。但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成份明显占少数的两者并列。马隆作为同瓦尔兰一道负责过工人国际法国支部的前领导人和巴黎公社社员，曾先后同盖德和布鲁斯决裂，投身于独立社会主义派。他创办了《社会主义杂志》，根据他的思想，这份杂志旨在成为向一切派别开放的“共同场所”，“向当今一切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人们——不管是温和派，还是过激派；是自治主义者，还是专制者；是爱好和平者，还是革命者；是互助主义者，还是共产主义者；是实证主义者，还是集产主义者——全都开放的“共同场所”。事实上，这份杂志是独立的社会主义派（鲁阿内，傅尔尼埃尔）的一个论坛。

死神夺走了第一代独立社会主义派：瓦莱斯死于1885年，马隆则死于1893年。

1893年又吹来了顺风。在第三共和国成立以来举行的首届议会选举中，不是捍卫共和国制度的问题，而是社会问题占主导地位；此外，布鲁斯派的衰落留下了一个空位。大多

数属于激进派的侨民如潮水一般涌来，壮大了独立社会主义者的力量。大选前夕，他们创建了“独立社会主义者联合会”。可是，这个联合会的组织联系松散，界线多变，以致于它只是名义上的“联合会”，甚至是名义上的“社会主义者”。

这些独立社会主义派倾向于在法国社会主义内部获得主导地位，这是因为有下述几个因素在起作用：

1. 其领导人米勒朗、饶勒斯、维亚尼，以及不久后的布里昂，都是有较强个性的人。

2. 他们垄断了社会主义（或激进社会主义）那些印数很大的日报：《小共和国报》（米勒朗），《红灯报》（布里昂），《图卢兹电讯报》（饶勒斯）。

3. 他们在众议院社会主义党团中，拥有绝对多数。

4. 革命的社会主义普遍滑向改良主义和选票主义。

独立社会主义派的影响如同他们的理论一样，是以折中主义引人注目的。他们在知识分子中间，在城市中间阶级中间，拥有较大的影响；不过，他们也有强大的工人基础：加莱海峡的矿工，卡尔莫的矿工和玻璃工人，圣艾蒂安矿山的矿工和冶金工人，里昂的丝绸工人等等。

在这些如保尔·拉法格以轻蔑的语气称为“多情善感的社会主义的、五光十色的独立人士”中间，出现了一位伟大的人物：让·饶勒斯。

这位杰出的大学教员（22岁当哲学教师，32岁获文学博士学位），是沿着一条异乎寻常的政治轨道运行的。正当各政党及其领导人走上一条从左翼向右翼运行的轨道时，处于“中左状态”的饶勒斯“使社会主义百花盛开”（1895年1

月16日《费加罗报》)。尽管饶勒斯于1885年任费里派的众议员，但他于1892年皈依了社会主义。这是他那种深刻的共和主义、民主主义信念所导致的必然结果？是两次持久的夜谈——一次同吕西安·埃尔的讨论，另一次同儒尔·盖德讨论的结果？不管怎样，是卡尔莫的工人使饶勒斯完成了这种转变，成为一名活动分子，一名彻底的社会主义者。

饶勒斯是个凡人。仙女们欠身来到他的摇篮旁，把礼物慷慨地赠送给他。他品质高尚，性格豁达，“神圣——我想以此说明他毫不利己……有一颗纯洁的灵魂，透明晶莹的心灵有时几乎象童心一样”（莱·勃鲁姆语）。其次，他聪慧过人，富有好奇心，知识非常渊博。他有特殊的演说天才和一支生动而敏锐的文笔。

饶勒斯处于“三个方面的交点上：以代表大会为轴心的社会主义者；关注多数派问题的议员；关心文化和道德革新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G·勒弗朗克语）。此外还可以加上第四个方面：工人，首先是卡尔莫的工人，其次是法国总工会的革命的工团主义者。在饶勒斯身上汇集了好几种思潮：激进的自由主义，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以及他那种犹如催化剂一般的对党的联合和统一的渴望。饶勒斯的思维方式是综合，还是折中？无疑，既是综合，又是折中。

从饶勒斯的身上体现了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这两种不可调和的思想调和在一起的意图。饶勒斯整个一生都忠于他在博士论文《论感性世界的现实》中阐述过的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的世界观。1900年，他还在众议院的论坛上声明说：“我不在那些对神这个词感到恐惧的人之列。20年前，我曾就自然和神以及两者关系的问题，就世界和生活的

宗教意义的问题写过一本书，这本书里的每一行字，至今我都不加以否认，它仍然是我思想的精华。”他也坚持其唯心主义的社会观，把那些有关正义和博爱的永恒的天赋观念看作是历史发展的伟大动力。然而，当饶勒斯于1900年坚决实行米勒朗入阁主义时，他在法国为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者”伯恩斯坦进行辩护；他反对伯恩斯坦，捍卫马克思的价值观和“经济唯物主义”。他指出，“人类历史的总运动决定于经济制度是缓慢地改变其形式，还是突然地改变其形式……是的，经济制度就是本质。”他在《法国大革命的社会主义历史》中，表示自己既愿意“同马克思站在一起，做一个唯物主义者”；又愿意“同米什莱站在一起，做一个神秘主义者”。

是进化，还是革命？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并不取决于无产阶级。饶勒斯并不排除在统治阶级拒绝无产阶级剥夺其财产的情况下使用暴力的可能性。但是，他用资产阶级民主的善举和教育的万能，来反对布朗基派进行的较量和盖德派信奉的革命的“救世主降临说”，反对工人阶级“愤怒而徒劳的反抗”（1848年6月起义，巴黎公社）。他怀着最热烈的愿望，呼吁资产阶级在8月4日的新夜将其特权奉献出来。作为坚定的改良主义者，饶勒斯看到社会主义社会“在现存社会的土地上”生长，“如同新叶在枯枝上发芽一样”。

集产主义和自由；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这些词不是互相矛盾的，而是相辅相成的！“从现在起，国际和祖国连在一起。民族独立的最大保证在于国际；国际最强大和最崇高的器官在于独立的民族。几乎可以说：国际主义少了，就能远离祖国；国际主义多了，就能回归祖国。”

看来饶勒斯的战略和政策是由三大火炬指引的。

首先，是其民主观的火炬。

1. 认为民主与共和国是无价之宝，所以必须不惜任何代价捍卫民主与共和国，防止反动派卷土重来。

2. 认为“社会主义是从共和运动脱胎而来”，而社会主义革命将是法国大革命的圆满成功。“故社会主义将来的胜利不是同法国大革命决裂，而是法国大革命在新的经济条件下的完成。”因此，饶勒斯倾向于模糊这种“资产阶级”议会民主的阶级性（其模糊程度由其政治生涯的各阶段情况而定），并且由此同盖德派相对立。

3. 认为工人阶级是民主的基本动力。饶勒斯说：“假如120年以来没有工人阶级把勇敢、力量和无私奉献给一切解放运动，那么，本国的政治民主又会变成什么呢？……自由，是工人阶级斗争的成果。”

当民主政治在德雷福斯事件的阴影下，受到“一切旧势力”进攻威胁时，应当怎么办呢？饶勒斯指责盖德派搞宗派主义，胡说什么无产者“在这场并非无产阶级斗争的战役中，是毫无作为的……他们只会袖手旁观。”在饶勒斯看来，社会主义者的义务应当是要“同某个不愿意倒退的资产阶级派别一道前进”。然而，在同自由派资产阶级进行的这种合作（首先在德雷福斯阵营内部，其次在瓦尔德克-卢梭内阁，最后在左翼集团）中，饶勒斯所接受的只是让社会主义扮演一个小伙计和下级而已。

指引饶勒斯前进步伐的第二个火炬，是对统一的需要。他写道，统一是“人类精神最深刻和最崇高的需要”。这位创始人不断地致力于社会主义的联合，并在1905年，同意将其自尊心和信念奉献给“统一”的祭坛。

1905年以后，是憎恨战争和民族主义的第三个火炬照亮

了饶勒斯的前进道路。

作为“美好时代”法国伟大的社会主义领导人，饶勒斯“在法国内外使社会主义人格化”（勃鲁姆语）长达15年之久。

走向“社会主义统一的金色太阳”（饶勒斯语）

随着时间的推移，看来社会主义各派的分歧得到了解决。实际上，当时的社会主义者和同情者，大多数在理论方面一窍不通，所以看不清是哪些政治思想分歧使社会主义同胞手足之间相互为敌。因此，他们利用“团结就是力量”这句古老谚语所表达的深得民心的道理，用富有成果的社会主义统一，来反对那种导致社会主义软弱无力的内战。

长期以来，社会主义各党对这些深刻的愿望只做到略有满足，即在众议院里拥有一个统一的议会党团^①（1893年至1899年期间），制定一个共同纲领（1896年5月的“圣芒得纲领”），建立竞选联盟，进行短期合作。不过，当反对德雷福斯的民族主义浪潮泛滥时，社会主义者在1898年秋天成立了“警戒委员会”，并在此后把它变为“社会主义谅解委员会”。所谓谅解，是指那些保持其完全独立，并拥有否决权的组织之间的高层“谅解”，是指那种遭到内耗破坏的谅解。

这种脆弱的统一，在米勒朗于1899年6月同意进入“资产阶级”内阁时便四分五裂了，因为在这个内阁成员中，有因当年镇压巴黎公社而臭名昭著的侯爵加里费将军。尽管作了最后一次统一的尝试（1899年12月，在巴黎雅皮大厅举行

^① 但当时只有阿勒马派参加。

了社会主义总代表大会)，但社会主义却日趋形成了两派，形成了两大政党^①，即由革命的社会主义者（盖德派和瓦扬派）经过漫长的订婚期以后，于1902年合并成“法国社会党”；^②由主张入阁和改良的社会主义者则联合成立“法兰西社会党”。^③

然而，1905年，统一已成为燃眉之急，势在必行了。战争的风云即将到来，工人斗争突然高涨，使统一的潮流变得势不可挡。于是，1905年4月，在国际的召唤下，在巴黎的环球大厅成立了“统一社会党”^④——工人国际法国支部。

① 事实上，有好几个组织（革命的社会主义工人党，几个自治联合会）独立于这两个政党之外。

② 原文为“le Parti socialiste de France”——译注。

③ 原文为“le Parti socialiste français”——译注。

④ 原文为“le Parti socialiste unifié”——译注。

第六章 统一的社会主义

1905年至1914年期间的 工人国际法国支部

革命的社会主义表面上取胜

革命的社会主义获得国际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决议的支持，并在统一代表大会^①上拥有微弱的多数，因此看起来已使其主张占了上风。

统一社会党的宪章宣布其“建立一个阶级斗争的政党的愿望，该党即使在为工人的利益而利用有产者的一般冲突时，或者在为捍卫无产阶级的权益而同某个政党偶然联合行动时，也永远是一个从根本上坚强不屈地反对资产阶级及其国家工具的政党……虽然社会党继续实现工人阶级所提出的现时改革的要求，但从其目标、理想和斗争手段来看，它不是一个改良党，而是一个进行阶级斗争的革命党。”

从表面上看，饶勒斯吃了败仗，但最终是他摘取了胜利的桂冠，因为他拥有最大的王牌。

首先是盖德派变得僵化起来，现在已完全无法分析法国

^① 在统一代表大会上，法国社会党大概有1.7万多党员；法兰西社会党，革命的社会主义工人党和自治联合会总共有1.6万党员。

经济社会和政治形势发生的剧变。因此，它只好重复过去那几个一成不变的公式，而这些公式是绝对回答不了工人阶级现时面临的重大问题：如何夺取政权？如何预防战争？此外，盖德派经常以其机会主义的实践，来否定其以教条主义方式捍卫原则的做法。反之，饶勒斯本人则以其一贯敏锐的思想，对现实的认识和综合事物的天才，对上述新问题提出了具体的解决办法，并且以其特有的吸引力和说服力来提出这些解决办法。瓦扬和瓦扬派总是同饶勒斯共同战斗，反对其旧盟友盖德派。而盖德派的新党员没有经历过以往的斗争，所以对徒劳无益的派别争吵感到气愤，并把饶勒斯看作党的统一的化身。最后，在国际上，饶勒斯的地位因社会主义（布尔什维克除外）滑向改良主义和议会道路而有所加强。

工人国际法国支部的组织结构

一个政党的有效性，特别是一个进行“阶级斗争的革命党”的有效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党组织的质量。

党作为一个由志愿者组成、因斗争的迫切需要而必须遵守某些纪律规定的战斗的先锋队，应当将活动分子、小组和省委发挥的主动性和享有的自由同他们对集体利益的服从两者协调起来，并且使民主与集中制达成平衡。在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内部，党明显地倾向于民主和联邦主义。

党有了一部民主的宪章^①。党员通过出席全国代表大会和省委代表大会代表的声音，来行使其最高的权力；由党员制定党的战略和策略，解决理论上有所争执的问题，选举并监

^① 工人国际法国支部的这部党章保持到1945年8月。

督领导机构。在全国代表大会闭幕期间，党由一个全国性的总委员会来主持日常工作：总委员会由三方组成：按党员比例选举产生的省委代表，议会党团派出的代表团，由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行政管理常务委员会。党的工作局和书记处是精干的行政管理机构。

党建立在盖德派旧有的组织结构上面：小组、（城市）支部、省委和全国领导机构。工人国际法国支部不设企业小组，只设同竞选运动相适应的地方基层组织。党章所规定的省委的自治地位，在斗争实践中得到了加强。在理论上受到严格监督的议会党团，实际上表现出某种独立性，并冒犯领导机构的政治权威。

党的统一，党的集中制遭到了离心力量的破坏。党内存在着“派别”——党中之党，与此同时存在着一个带有胚胎形式的机构、一些机关刊物和宗派意识。1907年，当行政管理常务委员会决定实行派别比例代表制时，派别便正式存在了。强大的盖德派对其先锋作用感到自豪，对其少数派的地位感到痛心，并且经历了一场由年老僵化的盖德同年富力强的饶勒斯斗争的悲剧。其他派别（革命的工团主义者，埃尔韦派，“布洛卡尔特”派）虽不如盖德派那样组织机构严密和力量影响强大，但也表明，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并非是各不相同的思想和政治派别的合并，而是这些派别的并存。

社会主义力量的增长

即使党的统一是一种混合体，它对社会主义的发展党员和扩大影响也产生了良好的效果。如同类似的情况，统一往往不是昨天那些分散力量的简单相加。对于那些迄今为止厌恶社会主义者打内战的人来说，党的统一是富有吸引力的。这

种吸引力被证明是强大的，尤其是因为时局的因素有利于社会主义力量的增长。

1. 革命的工人运动如潮水一般，突然高涨起来了。工会的统一对工人的权利斗争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这种权利斗争爆发的次数和声势，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如1906年矿工大罢工，1908年建筑工人罢工，1910年铁路工人罢工，1907年朗格多克葡萄园工人的骚动。对此，激进党和独立社会主义者，克雷孟梭和布里昂之流，均采取了激烈的镇压态度，因而失去了一部分工人选民。但是，法国总工会所处的“光荣孤立”和对社会党所持的敌对态度，使工人国际法国支部不能充分利用这种有利形势。

2. 战争竞赛使社会主义表现出争取和平的最大希望和最后希望。1913至1914年期间，社会党人进行大规模的反对“三年法”的宣传运动，激起了一股入党和同情党的热潮。

短短的9年中，看来工人国际法国支部的党员人数增长了两倍，从1905年的34700人增至1914年7月的91000人^①；党的选票增加了60%，从1906年的88万张增至1914年的140万张，即表态的选票增加了将近17%。

诺尔省作为盖德派的老根据地，是最大的省委（在塞纳省之前），在党员占人口的比例方面也名列前茅（占6.5%），高于那些工业化程度较低的省份：加尔省（占5.7%），上维恩省（占5.3%），奥布省（占4.9%），瓦尔省和沃克吕兹省

^① 1905年的数字，很可能是党组织为了增加其出席统一代表大会的名额而人为夸大的数字。工人国际法国支部的党员人数，在1914年1月亚眠全国代表大会上统计为72765人，同年5月则为77000人；而发展党员运动在战争前夕加速进行。因此，7月的统计数字：91000名党员也许符合实际。

(占4.5%)，阿登省(占4.1%)。1914年，在工人国际法国支部的选举地图上，有三个省——上维恩省、阿利埃省和阿登省向党提供了30%以上的选票。但是，从1906年以来，倒是在一些农业产值高于工业产值的省份取得了可观的进展。它们是上维恩省，阿利埃省，伊泽尔省，洛特省，塞纳和马恩省，尼埃尔省。

这样，非无产阶级分子的比重有了增加，其原因主要用最富战斗性的工人参加革命的工团主义派来加以解释。这种增加有助于引导党走向改良主义道路。

“革命主义者”派

除了工人国际法国支部以外，还有两个运动深深扎根在工人群众之中。首先是无政府主义派，在20世纪一十年代初重新焕发了青春；其次，主要是革命的工团主义派及其宣言《亚眠宪章》(1906年10月)。唯有独立于政党之外的工团主义派担负起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和日常罢工斗争的重任，不仅如此，而且担负起通过在“伟大之夜”发动的总罢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最后斗争”的重任。当20世纪初工人斗争变得激进起来时，工团主义思潮是通过一种相互依存的自然现象来显示其进展的；而这种思潮的衰落作为其实践失败的反映，是伴随着1906年以后罢工运动的低潮而出现的。可是，此时发生了重大的变革。由莫纳特推动的《工人生活》小组放弃了那种令人陶醉的词藻，对当时动荡不定的法国和国际的实际生活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思考，以探求走向社会主义的新前景。

在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内部，无政府主义和工团主义发生了变化，各自变成了“起义的社会主义”(G·埃尔韦语)

和“工人的社会主义”（拉加戴尔所著的《社会主义运动》）。

改良和革命

工人国际法国支部的活动是围绕着三大政治问题进行的，即关于改良和革命的关系问题，关于党和工会的关系问题，关于对战争竞赛应采取何种态度的问题。

关于第一个问题，在图卢兹全国代表大会（1908年）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最后，在饶勒斯的努力下，图卢兹大会制定了一个对统一宪章加以补充和明确肯定的、进行了综合和妥协的文件（仅以一票之差获通过）。大会决议一开始就重申了由盖德派所启示的理论：“社会党作为工人阶级和社会革命的政党，要通过摧毁资本主义制度和消灭阶级来进行夺取政权，争取无产阶级解放的斗争。党进行宣传工作，不断地提醒无产阶级：只有在集产主义或者共产主义的制度下，才能获得拯救和彻底的解放。”

那么，怎样才能达到这种遥远的理想境界呢？党并不排除使用总罢工（盖德派的主张）这种武器的可能性，而且主张无产阶级拥有“最后使用起义暴力的权利”。饶勒斯向盖德派、革命的工团主义派和起义派（埃尔韦派和瓦扬派）致了三次“举帽礼”，然后使其关于现阶段纲领的观点取得了胜利。“正因为党是一个革命的党，正因为党在其不断进行的争取权利要求的斗争中，没有被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所有权（在党看来，这种所有权已经过时）阻挡住，所以，它是最彻底的、最积极的改良党；唯有它才能充分满足工人的每一项权利要求，唯有它才能永远使每一次改良、每一项成果都变成争取更加广泛的权利要求和进行更加大胆的战斗的出发点和支撑点。”社会的变革是通过“生产力运动本身”，

由通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演变”来做准备的；但“与此同时……也必须进行巨大的努力，来教育和组织无产阶级”：开展工会斗争，组织合作社，进行竞选斗争，在议会和市镇议会中开展活动。

然而，图卢兹代表大会上这种“拉穆雷特之吻”^①，丝毫也阻止不了统一的社会主义者在从总方针走向实践的过程中争吵不已。如在尼姆全国代表大会（1910年）上，饶勒斯派和瓦扬派支持维维亚尼关于工人退休的方案，而盖德派和埃韦尔派则加以反对；在圣冈坦代表大会（1911年）上，盖德派和饶勒斯派在铁路国有化的方案问题上则发生了对立。

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和工会组织

工人国际法国支部面临一个严重的问题：是否甘心情愿同工团主义派分道扬镳？

这次分裂的错误部分应归咎于工人国际法国支部。盖德派要工会紧紧服从党的领导的试图，社会主义各派同胞手足之间自相残杀的景象，主张入阁的社会主义所作的妥协，所有这些都促使无政府主义派轻取工会运动，并促使工团主义派同党决裂。

在法国总工会亚眠代表大会（1906年10月）上，盖德派通过全国纺织工会书记维克托·雷纳尔之口，主张在统一社会党和法国总工会之间建立一种经常性的或非经常性的关系。可是，盖德派的动议只获得34票，代表大会则以830票赞成、8票反对，通过了革命的工团主义宪章——著名的

^① 阿德里安·拉穆雷特（1742—1794），法国高级教士和政治家。他作为议员，要求全体议员在外来威胁面前团结起来。1792年7月9日，全体议员在他的带领下相互拥抱。这一场面以“拉穆雷特之吻”而著称。

《亚眠宪章》。工团主义不必关心“那些在工会组织之外，或者在工会组织一旁，能够完全自由地进行社会变革的政党和派别”。

面对这种由法国总工会单方面决定的组织分裂，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应当采取什么态度呢？在1906年和1907年先后召开的利摩日代表大会和南特代表大会上，盖德派试图使其观点取胜。“无产阶级必须开展工会行动和政治行动，这两种行动不管是否已由无产阶级完成，或者应由无产阶级来完成，都是不能分割的，因为无产阶级如不想自杀，就不能分裂成两个部分。”但是，参加联合的其他各派都拒绝强迫法国总工会这样做。利摩日代表大会将亚眠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记录在案，并且“要求所有的活动分子竭尽全力，去消除总工会和社会党之间的各种误会”，以便今后“在没有思想混乱，没有上下级关系，也没有不信任的情况下，在两个组织之间建立一种自由合作的关系”。

这种社会主义和工团主义的绝对分离作为法国的特点，起到了削弱这两支大军的作用。“从工会方面来看，采取抽象的立场，奉行工运中心主义的宗派主义，已使工会会员处在贫民区一般的孤立状况之中”（G·迪普语），脱离社会党和作为工人阶级潜在盟友的各个社会阶层，甚至因行动少数派的理论和实践而脱离工人群众。在大战爆发前夕，法国的100名雇佣劳动者中，工会会员将近9名，而当时的英国和德国，由于工会的群众性，工人入会率分别高达25%和28%。其次，从工人国际法国支部方面来看，由于最有战斗性的工人党员已被革命的工团主义派拉走，党被迫从其他社会阶层，从农民阶级和城市中等阶级中去寻找党员和选民。因此，党倾向于从红色变为玫瑰色。

反对战争

1905至1914年期间，在军事、外交和思想备战的形势下，和平与战争问题变成了政治舞台上的中心问题。

面对这一问题，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大致上分为三派。

首先是盖德派。从前，盖德派在瓦扬派的帮助下，向迄今为止深受1792年革命和巴黎公社爱国传统熏陶的工人阶级和极左翼灌输过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而今，正当这种国际主义可能成为最重要的反战手段的时刻，盖德派却采取了消极的和教条主义的态度，自我孤立起来。他们揭露说，任何反对战争的十字军行动都是徒劳无用的和危险的做法。说其徒劳无用，是因为唯一的灵丹妙药是铲除战争的深刻根源——资本主义；说其危险，是因为反对战争的斗争会导致劳动者偏离其反对主要敌人——资本主义的斗争方向。

第二个派别埃尔韦派是从革命的工团主义和无政府主义那里汲取力量的。埃尔韦派建立在民族虚无主义之上。“对穷人来说，祖国不是生身母亲，而是后娘……我们憎恨自己的祖国，我们是反爱国者。”埃尔韦派也依靠工人中那种相当明显的反军国主义，这种反军国主义因军队对罢工进行的干预和反德雷福斯的高级参谋部对共和国的干预而变得激烈起来。埃尔韦本人曾建议用预备役军人的罢战，用起义来反对战争。“尽管埃尔韦派的‘起义主义’主要靠激烈的言词，尽管埃尔韦派将在一段时间里确实对善良的工人活动分子产生影响，但它只能从表面上挑起一些短暂的动荡……不仅挑起蛊惑人心的宣传，而且挑动冒险主义”（A·罗斯美语）。埃尔韦过去曾建议把联队的战旗插到粪堆上去，但从宣

战以来则高唱最爱国的歌曲和圣歌。

饶勒斯与盖德派一样，是从同一条起跑线上投身于反战的。“资本主义本身携带着战争，如同乌云携带着雷电一般。”但他很快就同盖德派分道扬镳了。诚然，在饶勒斯看来，“资本主义的本质就是制造战争……社会主义却能制止战争。无产阶级应尽的义务在于挫败那些进行抢劫和冲突的力量。这点变得明白易懂，尤其是因为资本主义的战争动机变得更加明显。”无产阶级能够而且必须制止战争，因为战争孕育着“一切暴行，一切侮辱，一切身心的堕落，包括从强奸到霍乱的一切丑恶。”如同盖德派断言的那样，革命无疑是从这种反人类的罪行中爆发出来的。但战争也会毁灭民主，削弱乃至破坏社会主义和文明。社会主义者没有权利“让无产阶级逐步获得解放的信念遭到这种血腥的打击”。“假如我们不是拼死拼活地努力阻止战争爆发，那我们就会名誉扫地。”

无产阶级拥有国际这个最好的反战武器。在1907年斯图加特国际代表大会上，饶勒斯建议达成“一个反对好战的资产阶级的共同协议”。斯图加特大会一致通过了一项实际上内容不大明确的动议，动议要求社会主义者履行“用他们认为最合适各种手段来制止战争爆发”的义务；不过，万一战争爆发，社会主义者就应当“进行干预，争取战争迅速停止下来，并且全力以赴，利用战争引起的经济和政治危机，来发动最广泛的人民阶层，加速资本主义统治的垮台”。饶勒斯本人在巴黎的一次群众大会上，是这样汇报斯图加特大会的决定的。“国际对你们说，无产者的权利，无产者的义务，就是不要糟蹋自己的精力去为一个罪恶的政府卖命，就是要把各国冒险政府将要武装人民的枪支扣留下来，并且拿起这

些枪支，不是去枪杀边界另一边的工人、无产者，而是用革命的方式推翻罪恶的政府。”1914年7月25日，饶勒斯在法国韦兹发表的最后一次讲话中，还发出了最后的警告：“假如爆发一场风暴，那我们全体社会主义者都要忧国忧民，使我们尽快从政府领导人犯下的罪行中得到解救。”

震撼世界的战争和革命

神圣团结

1914年7月14日，工人国际法国支部代表大会在饶勒斯和瓦扬的召唤下，投票通过了一项动议，呼吁“在国际上，在有关国家同时组织一次工人总罢工”，以便防止战争爆发。

7月31日，饶勒斯作为战争的第一个受害者，倒在了地上。维兰被民族主义报刊进行的仇恨的宣传运动冲昏了头脑，竟然开枪射击，使饶勒斯的伟大声音永远沉默了^①。

8月4日，工人国际法国支部的议会党团一致投票赞成有关战争拨款、紧急状态、限制自由的法案；同月底，当战争威胁到巴黎城下时，盖德和桑巴参加了“神圣团结”政府。

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政党都同样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

① 任何死者都没有受到象饶勒斯那样的关注。有人强调区分进攻性战争和防御性战争，因而堂而皇之地断言说，如饶勒斯活着，他就会热情地支持苏联。有人则援引其深刻的国际主义，提醒人们注意他在韦兹的最后一次讲话，因而倾向于把饶勒斯说成是一个潜在的齐美尔瓦尔得派。但他们无权叫死人开口，历史学家更是如此。

它们起来进行自卫，反抗侵略者，并认为它们的胜利就是全世界和平与社会主义的胜利。这样，那些曾经以巴塞尔钟声的名义“对战争宣战”的人们也改变了自己的看法。60多年以来，关于产生这样一种失败——只有布尔什维克党和塞尔维亚党幸免于难——的原因问题，象冰雪一样消融了。对此，有两种过于简单的解释，有两种指控，一种是对领导人的指控，另一种是对群众的指控：认为社会主义领导人因受到机会主义的毒害而进行背叛；各国人民掀起的民族主义浪潮，促使那些软弱无能的社会主义领导人发生动摇，并将他们席卷而去。

历史学家不应当充当法官。这里谈几种意见和几个问题。首先，领导人的作用是否只限于反映和接受那些受其影响的群众的思想状态呢？这些领导人远未阻挡民族主义的浪潮^①，远未反潮流，而是推波助澜。其次，怎样衡量那种在小学里树立起来、在巴黎公社时期保留下来、雅各宾派“革命的爱国主义”感情对群众和领导人产生的影响呢？布朗基派的老巴黎公社社员瓦扬的呐喊：“面对侵略，社会党人将履行其对祖国、对共和国、对革命的全部义务”，又获得什么反响呢？难道法兰西没有崇高的使命要去捍卫？年青时的盖德喜欢唠叨说，全世界的革命将在高卢雄鸡的啼声中进行。

别的因素也起作用。与俄国不同，在法国同时发生了工人阶级同民族、社会和政治制度实行的有限而渐进的一体化，以及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和法国总工会的向“右”滑，难

^① 人们夸大了民族主义浪潮的力量。对潮流采取进来顺受的态度似乎压倒
了爱国的黠武主义。

道这不是事实吗？学习马克思主义只学皮毛和持僵化态度，缺乏理论分析，对帝国主义的现象几乎一无所知，其后果之一就是避免大战的可能性，对一旦战争爆发避免歪曲战争真相的可能性，均持盲目的乐观态度。

支持战争，还是反对战争（1914—1916年）

为了保卫祖国和自由，工人国际法国支部扛着“带鲜花的枪”奔赴战场。然而，现实取代了对“短暂而愉快的战争”所抱的幻想。这是一场残酷的堑壕战，一场杀人的进攻战，是巴比塞在《火线》中描绘的那个地狱。尽管当时实行新闻检查，但也透露了一些消息：杜马^①的布尔什维克议员拒绝投票赞成战争拨款；卡尔-李卜克内西于1914年12月效法他们的做法；那些中立国家的社会党人致力于恢复和平。

在法国国内，由于实行战时经济的必要性，雇主们得到了加紧剥削工人的有利时机：增加劳动强度，延长工作日，降低工资；与此同时，“生活昂贵”。工厂里怨声载道，对“利用战争大发横财的人”日益不满。

此后，先后有一小部分人和越来越多的俱乐部就发动战争的责任和目的问题，就结束战争的方法问题，提出了疑问。有三个历史性的日子，三个历史性的事件，标志着反对“神圣团结”的开端。

1914年秋天。在强大的金属工业联合会（梅兰）的支持下，以《工人生活》编辑部（莫马特，罗斯美）为核心，组成了工团主义的反对派。

^① 杜马，俄文 дума 的音译，沙皇俄国中央和地方咨议机关的名称——译注。

1915年5月。工人国际法国支部的上维恩省委要求党放弃其扮演的“那种极其好战、自吹自擂，以致同沙文主义相差无几的角色；要求党倾听一切有关和平尝试的意见，而不管这种意见来自哪一方”。

1915年9月。在意大利社会党的倡议下，在瑞士齐美尔瓦尔得举行了一次代表会议，以便开展和协调国际的反战行动。法国总工会的两名少数派——美兰和布尔德隆代表法国，参加了齐美尔瓦尔得代表会议。

面对战争，法国的工人和社会主义运动大体上分为三派。

1. 支持“神圣团结”的多数派。他们认为，一切民族的有生力量都必须动员起来，直至对德国军国主义取得全部胜利，任何“软弱都必须加以肃清”。他们象社会主义者或者象工团主义者那样，全力支持国防事业，社会党议员投票赞成战争拨款，社会党人部长出席政府会议。大家都努力安抚工人的不满情绪，驱散那些会消融民族精神的阴影。“社会主义应尽的义务，那些真正想要使人类摆脱战争恶梦的人们应尽的义务，就是要继续斗争到底，对那些怨言充耳不闻。”
(盖德语)

2. 工人国际法国支部的少数派。他们团结在让·龙格的周围，在三个基本问题上反对多数派：

(1) 认为发动战争的责任不应只归咎于“中央帝国”^①。

(2) 认为社会主义者应当恢复“国际的元气和活力”，同兄弟党恢复关系，特别是同德国社民党的和平主义少数派恢复关系。

^① 指德意志帝国和奥匈帝国——译注。

(3)认为应当探求和平——一种没有并吞的和平——的各种可能性。

但龙格派也继续同多数派一道，投票赞成战争拨款。此外，他们想要不惜任何代价，来维护法国社会主义者的统一，而且毫无例外地想要“重建”第二国际。

龙格派依靠党的四大省委：作为运动的创始人的上维恩省委（P·富尔，普雷斯马纳），伊泽尔省委（拉凡一迪根斯），罗纳省委和塞纳省委。只是到了1916年春天，龙格派才表明其反对多数派的态度，而且这种态度起初非常温和。他们只是在同年4月的全国委员会里，提出一项与多数派不同的动议；5月1日创办机关报《人民报》。从此，他们不断地扩大地盘。

3. 齐美尔瓦尔得派。齐美尔瓦尔得派的思想是从工团主义派核心（金属工业联合会和教育联合会）开始，深入到工人国际法国支部的。3名众议员勃朗、布里宗和拉凡一迪根斯参加了在吉昂塔尔召开的齐美尔瓦尔得派第二次代表会议（1916年4月），此后就一贯地投票反对战争拨款。

齐美尔瓦尔得派在谴责战争是一场“帝国主义战争”方面，比龙格派大胆得多。与此同时，他们有力地指责多数派奉行的“阶级合作”，并开展一场争取和平——由国际工人的行动建立的和平——的宣传运动。不过，法国的齐美尔瓦尔得派并未象俄国布尔什维克那样，一直走到鼓吹革命的失败主义的地步；他们与齐美尔瓦尔得派的左翼背道而驰，象龙格派那样拒不同列宁所说的“社会沙文主义者”实行彻底的决裂。

这样，战争打乱了法国工人运动的格局。

首先，社会主义和工团主义的分离变得缓和了。法国总

工会的领导人和工人国际法国支部的领导人在“神圣团结”中进行合作。齐美尔瓦尔得派“恢复国际关系委员会”使法国总工会的少数派和工人国际法国支部的少数派联合起来，不过，联合在两个不同的委员会里。

其次，在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内部，多数派和少数派之间的分界线同过去旧派别之间的分界线毫不相符。甚至旧派别中清一色的盖德派也发生了分裂，其多数派追随盖德参加了“神圣团结”；上维恩省委和伊泽尔省委则加入了龙格派。

1917年的危机

1917年爆发的革命运动的烈火，将“神圣团结”的神话烧为灰烬。

俄国的二月革命点燃了熊熊燃烧的火炬。多数派分子马赛尔·加香参加法国议会代表团访俄归来，公开声明说：“我刚刚目睹了俄国革命，而且我同俄国革命站在一起。”彼得堡作出的反应和持久而残酷的战争所带来的苦难（尼韦尔的“大进攻”受挫），引发了1917年春天点燃的一场大火。前方军队的反戈，后方工人的罢工，这些基本上自发的反抗表明了制止战争屠杀的意愿。在统治阶级中间，甚至在政府机关内部，也发展了一个主张妥协和平的派别（卡约，马尔维）。

接着点燃了十月革命的火炬。这是第一次赢得胜利的工人革命。

这些革命的熊熊烈火使法国的社会主义和工团主义力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和新的组合。

在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内部，在龙格派周围实行了中间派

的大联合，这同法国总工会内部出现类似的运动一样，党的多数派向左翼倾斜。他们放弃了三年来所奉行的“神圣团结”，并表现为和平主义者。齐美尔瓦尔得派的右翼则表示同意龙格派摒弃布尔什维克“模式”，认为这种模式在法国无法实现，并将德国于1918年春季进行的最后一次进攻的胜利归功于单方面签订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中间派则主张建立一支以社会主义为骨干的国际和平与仲裁部队，以此作为代替政策，来反对老的多数派的“拼到底主义”和布尔什维克的“革命的失败主义”。因此，他们对维尔松提出的著名的“十四点方案”表示热烈欢迎。

在右翼方面，有个小派别继续一丝不苟地忠于“神圣团结”的精神^①。与此相对应，在齐美尔瓦尔得派左翼方面，有个小派别在俄国十月革命影响下，变得更加激进起来，鼓吹布尔什维克的榜样。该派别以巴黎的小学教员洛里奥为首。在齐美尔瓦尔得派左翼和中间派之间，有布里宗及其印数很大（30万份）的日报《浪潮》，他们表达了对和平的渴望，对社会发生动乱的那种隐约可见的意愿，并以感情代替理智的方式赞同苏联的革命。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十月革命造成了法国社会主义的第二次大分化。

支持参加第三国际，还是反对参加第三国际

1914年，列宁从第二国际的“破产”中得出了需要建立一个崭新的、革命的共产国际的结论，到了1919年年中，创

^① 该派别的一部分党员后来在1920年被开除出党，他们同那些反对党在1905年实行统一的人一道，建立了一个独立的社会党。

建共产国际的条件，在他看来已见成熟。

这是因为，十月革命孕育了1918至1919年期间的革命高潮。德国斯巴达克派的起义，巴伐利亚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成立，布达佩斯公社，欧亚两洲的革命运动。布尔什维克党希望，这是世界革命的曙光。为了协调斗争行动，建立一个战斗的参谋部看来是必不可少的。于是，1919年3月在莫斯科成立了第三国际。“最后的和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斗争时刻到来了，虽然比社会革命的导师们预计和预期的晚了一些，但这一时刻毕竟到来了……我们的任务在于普及工人阶级的革命经验，将机会主义和社会—爱国主义这种肮脏的混合物从运动中清除出去，联合世界上一切真正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力量，进而便于和加快共产主义革命在全世界的胜利。”

但是，毋庸置疑，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中蕴藏着革命者适应变化和抵制变化的能力。力量对比很快就显得不利于革命运动。革命运动远不如俄国革命那样力量强大，那样组织牢固，而且在各国内部和在欧洲范围内遇到了反革命的大联合。德国社民党指挥了对斯巴达克派的镇压；罗马尼亚军队配合了对匈牙利公社的镇压。1920年，革命的浪潮退落了。但有一个重要的例外，即俄国革命取得了反对外国干涉和白匪军队的胜利。在占地球六分之一的土地上飘扬着镰刀和锤子做标志的红旗。

法国和世界各国的工人运动面临着一个尖锐的问题，对苏联的革命应当采取什么态度？此外，还有一个由此派生出来的问题：法国的社会主义应该参加第二国际的重建，还是加入共产国际？

法国的社会主义内部存在着三大派别。当然，这三大派

别还可以再分下去。

1. 右派组成了“社会主义抵制委员会”。一方面，它联合了那些现已落伍的“神圣团结”的支持者，其中包括一个多少由技术治国论者和计划工作者组成的、以前军备部长A·托马斯为首的小组，以及由雷诺代尔推动的旧多数派的残余；另一方面，它联合了象莱昂·勃鲁姆^①这样在右翼和龙格派之间进行联络的人。工人国际法国支部的右翼以法国社会主义丰富传统的名义，反对党的“布尔什维克化”，并想要重建第二国际。它强调，沙皇统治下的、封建的、农业的俄国不同于共和制的、民主的、经济发达的法国，因此，布尔什维克党的解决办法——“鞑靼人的布朗基主义”不能适用于法国。

2. 中间派：龙格派（龙格，P·富尔）。虽然龙格派在战时是少数派，但由于齐美尔瓦尔得派的支持，他们在1918年10月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上获取了党的领导权。龙格派坚决捍卫俄国革命，但他们却同右翼一样，摒弃布尔什维克党的模式，认为它违背法国社会主义的利益和传统，他们以法国和世界社会主义统一的调停者和捍卫者自居。他们想要用第二国际那些还可以使用的建筑材料和第三国际那些崭新的脚手架，来重建唯一的国际。由此，他们被称为“重建派”。在斯特拉斯堡全国代表大会（1920年2月）上，龙格派仍然是多数派，所以使其主张取得了胜利，即同第二国际决裂，同第三国际开始谈判。

3. 左派支持参加第三国际，但它并非铁板一块。

^① 1914至1916年期间，莱昂·勃鲁姆任桑巴的办公室主任，曾在“神圣团结”的多数派和龙格的少数派之间数次进行调停。

(1)第三国际委员会。战时的和平主义—国际主义派的左翼于1918年瓦解了。其中一部分人沦为无政府主义派；另一部分人，主要是工团主义派（以及梅兰和迪穆兰），则加入并壮大了多数派的队伍。1919年5月，这个齐美尔瓦尔得派左翼的残余组成了“加入第三国际委员会”，其目标是引导法国总工会和工人国际法国支部走向共产国际。该委员会包括一个社会主义者的分支（洛里奥，R·勒费弗尔，保·瓦扬—古久里）和一个革命的工团主义的分支（莫纳特，蒙穆索）^①。在从组织成立直至1920年5月的第一年里，委员会得到迅速的发展。但1920年5月铁路工人大罢工受挫，使委员会遭到沉重的打击；而且，由于政府的镇压，由于参加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3名代表（R·勒费弗尔，勒珀蒂，韦尔扎）在归国途中淹死于北冰洋，委员会的领导机构遭到了致命的打击。

(2)重建派的左翼。1920年6、7月间，工人国际法国支部总书记弗罗萨尔和《人道报》社长加香根据斯特拉斯堡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到俄国去同共产国际进行谈判。他们对俄国革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以公开表示主张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加入第三国际；加香的表态比较热情，弗罗萨尔则比较谨慎。但他们俩都不是“布尔什维克”，而且面对共产国际对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加入国际所提出的条件，不大掩饰其保留态度。

^① 不过，应当指出，这些工团主义者赞同布尔什维克的态度是模棱两可的。他们认为，苏维埃同工会是一回事。所以，他们忠于革命的工团主义传统，把布尔什维克的口号：“一切权力归苏维埃！”改为“一切权力归工会！”莫纳特本人自诩为“共产主义的工团主义者”。

只要共产国际对世界革命即将爆发的前景寄予希望，它就期望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和法国总工会的最革命分子实行分裂，并且联合起来组建共产党。

可是，由于革命的退潮，迫切需要制订一项更加长期的战略，不应再局限于建立一个只让那些坚决要求参加第三国际的人加入的封闭的俱乐部。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1920年7、8月间）上，尽管遇到激烈的反对，但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人毕竟实现了将加香和弗罗萨尔率领的社会主义者主力引向共产主义的愿望。不过，共产国际也采取了一些预防措施，以便将最不革命的派别清除出去，并在会后使法国的共产主义“布尔什维克化”。工人国际法国支部要使第三国际接受其加入的要求，就必须赞同“二十一个条件”。

二十一个条件中的主要条件是：这个新型的党必须采用“共产主义”的标记，以便同那些“业已背叛工人阶级事业”的“老”社会党划清界线。共产党以无产阶级革命为基本目标，因此，必须揭露“社会—爱国主义”和“社会—和平主义的虚伪性”，同“中间派（龙格派）的改良主义和政策”实行决裂。党履行的首要义务是领导无产阶级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特别是反对本国资产阶级的革命斗争；“不仅在言语上，而且在行动上”依靠“殖民地的解放运动”；动员劳动者起来捍卫苏维埃共和国。为了完成这些任务，党必须将合法斗争同非法斗争结合起来：在工会、合作社和“其他工人群众组织”中开展“共产主义的活动”，在农村开展“有步骤的、有方法的风潮”，“在军队中开展强大的和经常性的宣传工作”。在“内战激烈进行的现时”，党应“以尽量集中的方式”，用“铁的纪律”组织起来；应领导其议员和记者，而不

是象第二国际的政党那样，让他们牵着党的鼻子走；应定期将“小资产阶级分子”清除出党。共产国际的这些决定对党来说，具有法律的效力。

围绕着二十一个条件，展开了一场支持参加第三国际和反对参加第三国际的斗争。

支持参加共产国际的少数派为什么在20年代的后5年中，能迅速壮大起来，成为多数派呢？“战后的革命少数派是在一种独特的时局中得到发展的。时局不仅向工人群众提供了一种取之不尽的革命的力量源泉，即对战争屠杀的可怖记忆，而且也提供了一种产生革命力量的希望，即对爆发俄国式的社会革命的希望”。依据列宁的说法，在战争时期，国际主义者是反潮流的，但在战后，革命者却在潮流之中。”（A·克里热尔语）

在那些从堑壕战的地狱中逃生的人看来，社会党领导人和工会领导人因其战时的“阶级合作”、神圣团结的政策而声名狼藉。“我们对战争的社会主义、吞并的社会主义、双手沾满鲜血的社会主义完全厌倦了。我们不要这样的社会主义。”（托尔托涅省的代表在图尔代表大会上的发言）此外，1919年议会选举结果^①造成的失望情绪，1919和1920年期间大罢工的失败，使人们的目光转向那个取得革命成功的国家。这场革命不仅应当加以捍卫，而且它已经成为一个模式。“工人群众心向着莫斯科，仿佛心向着社会主义的圣城……各国社会主义者过去期望过、向往过、准备过、但又白

^① 工人国际法国支部获173万张选票，比1914年净增了33万张，但它只获68个议席，所以，合法上台的希望变成了泡影。

白等待过的事业，俄国的社会主义者正在以一种坚韧不拔的毅力实现着……千千万万个受苦受难、但又不愿白白受苦受难的人们的希望，遭到战争无情的摧残，但他们的希望同圣城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是圣城的熠熠光辉温暖着他们的心。”

（Z·O·弗罗萨尔语）

因此，即使在图尔全国代表大会开幕（1920年12月）之前，大会的结局看来也是确定无疑的。大会将投票参加第三国际。第二个确定无疑的事实是，右翼少数派“社会主义抵制委员会”将拒不服从投票结果，并制造分裂。唯一“悬而未决”的问题在于界线，即中间派龙格派将站在哪一边？重建派的左翼，尤其是弗罗萨尔，只想把右翼分子开除出党。但龙格拒绝同勃鲁姆及其朋友分离。另一方面，共产国际发来了一封由季诺维也夫签发的电报，向图尔代表大会揭发“龙格和龙格集团”，说他们“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深受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影响的政治掮客”。

图尔代表大会以4763张选票中的3252张，投票通过了党参加共产国际的决定。大会以相同的票数（3247张），摒弃了一个要求维护社会主义统一（包括右翼在内）的文件。于是，龙格派和抵制派离开了论坛，完成了分裂。

第三卷

旧大厦和新大厦

第七章 走向一个新型的党

法国共产党诞生的特殊条件

法国共产党与别的共产党不同，是作为社会主义分裂的产物——多数派而诞生的。它保留了宝贵的宣传工具（《人道报》）和众多的党员（约10万名），因而摆脱了某些为派别所特有的精神状态，但也背着“右倾机会主义”这份沉重的遗产，直至1930年，共产国际还认为右倾机会主义是法国的主要危险。

工人国际法国支部作为哺育幼年共产党的第一源泉，包括各个社会主义老派别：盖德派（加香），阿勒马派（阿勒马），饶勒斯派（雷努），瓦扬派和埃尔韦派（塞马尔）。大多数领导人属于前重建派左翼，对于参加共产国际的二十一个条件并未加以重视。因为他们深受议会制的熏陶，并在只起协调作用并保证各个民族党享有充分自治权利的第二国际的怀抱里长大，所以，当第三国际打算承担世界革命大军总参谋部的重担时，他们便表示激烈反对。

革命的工团主义者（罗斯美，米托尔，弗拉松，蒙姆索和莫纳特）对这种改良主义的涌现深感不安，但他们却象浪

潮一样相继加入了共产国际，是法国共产党的第二个源泉。最后，少壮派（瓦扬-古久里和杜克洛）成为法国共产党的第三个源泉，他们因憎恨战争和热情支持俄国十月革命而参加了共产国际。

当然，这些老社会主义者、革命的工团主义派和无政府主义派的社会出身和政治状况是那样不同，以致他们并不因为加入第三国际而被改造成为布尔什维克。他们不大懂列宁主义，甚至不懂马克思主义，所以，他们决不相信彻底改造其思想的必要性，只是希望把布尔什维克主义同他们从前的观念和实践轻而易举地调和起来。

法国共产党诞生的第二个重要的特殊条件，是其发展党组织的社会环境。法国的社会经济结构——其本身是很典型的——从未被一场堪与俄国革命相媲美、甚至堪与德国革命和意大利革命相媲美的革命危机动摇过。由于日臻完善的公民社会，由于固若金汤的国家机器，资产阶级仍然不费吹灰之力，主宰着法国社会的政治思想阵地。各行业的工人斗争（罢工，保卫苏联）并未危及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因为“法国社会结构没有遇到任何会使工人斗争集中到国家机器这个关键问题的危机”，所以，共产党干部“只能同居一室，和平共处，而不会合并成一个领导集团”^①。

牙牙学语的童年时代

“把一个老牌的、正在奉行改良主义和略有革命色彩的欧洲议会党改造成为一个新型的、真正的共产主义政党，是

^① 这里，我们使用了D·塔尔塔科斯基的杰出论著：《1921—1933年的共产党学校和出版社。论法国共产党的干部培训》（1977年版）。

一件极为困难的事情。无疑，这种困难在法国表现得最为明显。”（列宁语）

法国共产党基本上保留了其母体——工人国际法国支部的思想结构、组织结构和行动方式。但由于党内不和，由于派别斗争造成部分瘫痪状态，由于激烈的争论，除其左翼之外，共产党仍然不顺从共产国际的警告和指示。共产国际在第四次代表大会（1922年底）上不无遗憾地说，“法国党从代议制的社会主义演变到革命的共产主义的过程是极其缓慢的”，因为在党的领导机构中的某些人进行了“特别顽强”的抵制。共产国际要求法国共产党清除那些“沙龙革命家”，尤其要强迫那些参加共济会的共产党员退会。于是，党内右翼和一部分中间派（总书记弗罗萨尔）相互排挤，或者被开除出党。“脓包破裂了，被挤一空，党清除了一大批共济会员、野心家、小资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他们不是要为党服务，而是要利用党。”（1923年1月8日《人道报》）

这次外科小手术后，便对法国共产党实行了输血。1922年11月，季诺维也夫就已断言说：“我们必须在党外，在工团主义者队伍中，寻找为共产党所需要的分子……并把这些真正无产阶级的、真正共产主义的分子引导到我们身边来。”同年12月，列宁对蒙姆索——他作为这些真正无产阶级的、真正共产主义的分子之一，曾拒不参加由“野心家”领导的政党——说：“我们在这里，是无法改变外国党的面貌的……如果象您这样的革命工人加入共产党，那么，你们就能改变党的面貌，党就会变成无产阶级政党，就不再被政客们一手操纵。只有您能办到此事。”1923年，蒙姆索和莫纳特作为革命的工团主义派领导人，参加了法国共产党。

与此同时，法国共产党结束了内部讨论，开展了第一次

大规模的斗争行动，反对法国对鲁尔地区进行军事干涉的斗争。年青的新干部（贝里，多里奥）在这场斗争中崭露头角。

但法国共产党的混杂性总是给人以深刻的印象。1924年11月出版的《布尔什维克主义手册》以开玩笑的方式，对这个混合体列了个公式：“20%的饶勒斯派，10%的马克思主义派，20%的列宁主义派，20%的托洛茨基派和30%的思想混乱派”。

艰难的学徒期：“布尔什维克化”^①

1924年，共产国际发动了一次旨在彻底改造共产党，使之布尔什维克化的大运动，其目的是要使国际无产阶级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任务。在这个革命力量退守的阶段里，要准备下一次胜利的反攻，就必须建立一个同社会民主党根本不同的新型政党这个战斗指挥部。

首先是要实行党的组织机构的布尔什维克化。社会党根据其党员的居住地点来组织党员，因而是建立在地区即选区基础上的。共产党要履行工人阶级先锋队的职责，就必须扎根于资本家剥削工人的场所，扎根于工厂，扎根于工人的劳动地点。这项重建“企业支部”的工作遇到了重重障碍（老板的压制，分班劳动，深受革命的工团主义影响的积极分子所开展的敌对活动，把政党与工会混为一谈的危险）。这些障碍难于克服，尤其是人们用唯意志论的、机械的方法来执行重建的决定。这里仅举一个带有讽刺性的事例：大生物学家普雷南住在巴黎第五区，但他却被安排到圣德尼的煤气厂

^① 这里仍援引D·塔尔塔科斯基的论著。

支部！重建工作的总结是，只是在某些地区（巴黎地区，诺尔省）和某些行业持久地向大工厂转移党的工作重心。不过，党的布尔什维克化看来主要是在干部布尔什维克化方面取得成功。党内涌现出一批新型的工人干部，其中有些人后来成为共产党领导集团的核心。1924年8月，一个名叫塞马尔的工人首次登上了党的总书记的高位；另一个名叫多列士的工人，则于1925年晋升为党的组织书记。在消极方面，除了自然死亡和开除出党的以外，由于党同群众组织、统一总工会或共青团相互渗透和相互影响，出现了某种失去党的个性、党的本色的倾向。

尽管这个奉行工运中心主义的共产党变成一个小小的革命行动主义者的先锋队（1926年仅有5.5万名党员），但它在党内生活和国际生活中却拥有“铁的纪律”；党组织建立在“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基础之上；各级领导机构通过选举产生，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机关必须严格执行上级机关所作的决定，党的报刊和议员必须严格服从党。但这往往是一种缺乏其民主实质内容的集中制。

其次是要实行党的思想的布尔什维克化。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单一的理论体系，正在取代或者倾向于取代第二国际在理论上的折中主义。事实上，正如斯大林在《列宁主义原则》^①中制定的那样，正统的理论早已存在。与此同时，党的教育大厦破土动工，1924年11月成立博比涅中央党校是为教育大厦举行的奠基礼。

最后是要打几次战役来实行党的政治实践的布尔什维克

① 这是斯大林在1924年4、5月间，即在列宁逝世后三个月时所作的一篇讲演。

化。第一个考验是在里夫^①进行的殖民战争。从1924年秋季起，共青团就在军队中发动了一些小规模 的抗议和亲善活动。从1925年5月开始，共产党力图通过把反对殖民的斗争同揭露法国政府的财政政策联系起来，动员工人群众起来斗争。以多列士为首的“反对里夫战争和卡约税行动中央委员会”发出了在1925年10月12日举行总罢工的号召，发动了几十万劳动者（组织者提出的90万人的数字，无疑是个乐观的估计）。鉴于当时沙文主义占统治地位，对工人阶级影响很深，这次总罢工取得的成果是不容忽视的。

还有一个难学的课题：“阶级对抗阶级”的策略。根据共产国际——它刚刚完成了宗派主义的转变——的指示，共产党决定同过去“共和派纪律”的旧原则进行彻底的决裂，以便使工人阶级觉悟到其利益同资产阶级的利益截然不同，使党表现为一个摒弃任何机会主义和选票主义的革命政党。党用“阶级对抗阶级”的无产阶级公式，来代替左翼对抗右翼、红军对抗白匪这种传统的区分办法。但与此同时，除了议会和选举阵地之外，共产党还必须通过群众的广泛实践，在其真正的阵地上，即在阶级斗争的阵地上展开政治斗争（这个基本方面后来被完全忽视了，主要原因是党组织在企业中扎根不深）。共产党敦促工人国际法国支部脱离激进联盟，转而同它一道，以工农联盟的名义建立劳动者的“统一阵线”。社会党人对此采取拒绝态度，是可以预见，并且已经预见到了的。共产党作为一个处于潜在危机之中的小党，只是部分地和以宗派主义的态度实行“阶级对抗阶级”的策

① 里夫，东摩洛哥的山脉名。1921至1926年期间当地居民曾进行过反对法国和西班牙军队侵略的抵抗斗争。

略：共产党的选民对那种提倡“投有益票”的看法感到反感。尽管如此，共产党仍获得了106 3943张选票，比1924年净增了将近20万张。凡是第一轮未果的地方，共产党候选人在第二轮选举中都维持了原状。在共产党候选人仅次于社会党人或激进党人的选区里，2/3左右的共产党选民依然忠于“阶级的纪律”，而不遵守“共和派纪律”。

这样，布尔什维克和苏联的经验变成了模式，变成了楷模。共产国际对刚刚发育成熟的法国共产党实行严格的托管。因此，苏联共产党的内部斗争波及到了法国共产党，使它感到痛苦不堪。

最后，我们不要忘记，法国共产党的布尔什维克化作为一次本身就非常棘手的手术，是在一种十分不利的形势下进行的。革命浪潮的普遍低落，资本主义直至1930年的稳定发展和高涨，这些都使得许多劳动者走了回头路。他们曾经一度对革命即将到来的前景感到眼花缭乱，后来又回到了那种看来更加符合法国政治格局，更加轻车熟路的改良主义上去。

幼稚病

法国共产党诞生和发展的困难条件，党的混杂性，说明了那种以不同的方式并在不同程度上侵袭第三国际各党的幼稚病何以在法国共产党身上表现得特别严重。

第一种病，即领导人的专断，曾使党遭到两次沉重的打击。1923至1924年期间，特兰取代弗罗萨尔，继任党的总书记。这个“笨得出奇的蠢人……专横而无权威，没有任何当领袖的才能。他同谁也合不来，而且在他打算对党实行极端的集中领导时，自己却毫无组织观念”。（J·福韦语）。此

后，虽经P·塞马尔和莫·多列士大力纠正，但党在1929至1931年期间旧病复发。由于党的主要领导人被捕入狱或进行地下活动，由共青团前领导人——巴尔贝、塞洛尔和洛兹雷组成的三驾马车（“领导集团”）掌握了党的领导权，并且象从前特兰所做的那样，多次作出专横的决定，要求“基层”消极地服从，并压制任何讨论。他们完全取消了民主集中制中的民主。

专断病导致了第二种病：宗派主义。“领导集团”的专断决定显然无法执行，并且无法贯彻下去。“领导集团对日常的实际工作表示最大的轻蔑，忘记‘政治是一门可能的艺术’这个基本的道理，老是喜欢空洞的词句而不喜欢具体分析，因而使工人的行动注定要徒劳无效和软弱无力。领导集团还践踏了群众提出的细小的权利要求，说什么‘争取牛排的斗争已经过时！’他们蔑视工会工作；他们辱骂信仰社会主义的工人；他们把最小的罢工也政治化了。”（莫·多列士语）罢工因缺乏准备而流产；游行示威则以散漫而杂乱的特点引人注目。

由此，力量遭到削弱的党组织，遭到了第三种病即党内斗争的破坏。有些斗争是布尔什维克党内斗争的反映，如1924年苏伐利纳、莫纳特和罗斯梅由于托派问题被开除出党。有些斗争则来自党的战略、实行“统一阵线”、“阶级对抗阶级”策略等问题上的党内意见分歧。共产党曾数次将“左倾”分子和“右倾”分子清除出党。

上述各种弊病妨碍了对活动分子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党无法培训一批为党的正常运转必需地区干部、地方干部。党员的发展工作非常薄弱，因而未能弥补因许多党员的自然死亡所造成的损失。党员人数迅速下降：1921年10月下发给省

委的党员证^① 109391个；1923年下发55598个；尽管1924年有过短期的回升，但党员人数继续下降，直至1931年下跌到最低水平（29415个）^②。党的选民也大量流失：1932年大选中获784883张选票，比1928年议会选举时减少28万张，即使同1924年相比，也是一个倒退。

这样，在举行奠基礼后的10年，“新大厦”看上去仍然是一个布满孔洞和脚手架的工地。但后来的事件将会表明，法国共产党的基础打得很坚实。在经历一个艰难而痛苦的学徒期后，党开始成长为一个（革命的、国际主义的、扎根于企业的）“新型的党”，并且培养出一支富有斗争经验、即将担负起领导任务的干部队伍。

① 显而易见，发放的党员证比登记的党员证多。

② 关于共产党的人数，请参阅A·克里埃热尔所著的《第三共和国时期的法国共产党人数》，载《法国政治科学杂志》1966年2月号。

第八章 忠于“旧大厦”

首先是要重建

莱昂·勃鲁姆作为图尔代表大会上决定实行分裂的少数派的发言人，是这样描述其使命的：“当你们即将出门去冒风险的时候，总得有人留下来看守旧大厦。”

可是，这个“旧大厦”现在剩下些什么呢？从表面上看，只剩下一片废墟：3万名党员，还由于昨天战争的缘故，分成“抵制派”和“重建派”。从近处看，旧大厦的屋架被证明是牢固的：大多数的议员（68名议员中的55名）、地方市长和议员、省委领导人依然留在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内。抵制派和重建派之间的分歧，与其说是理论问题，倒不如说是策略问题；与其说是现实和未来问题，倒不如说是历史问题。难道抵制派和重建派没有继承同样的传统吗？“我们作为社会党，如同党在1905年由饶勒斯、盖德和瓦扬等人统一时那样……我们用社会主义及其理论和原则，来反对共产国际的论纲、章程和二十一个条件，反对共产国际领导人的辱骂。老社会党曾经领导无产阶级进行过那么多光荣的战斗。”^①

人们始终不渝地遵循“旧大厦”的建筑结构：同样的基地（根据居住地点建立党组织），同样的层次（支部、省委、

^① 见G·勒弗朗援引的在图尔代表大会结束后第二天共同起草的《致法国工人的宣言》，《第三共和国时期的社会主义运动》第249页。

全国领导机构），同样的顶楼（行使最高权力的全国代表大会；全国委员会；行政管理常务委员会）。

重建的条件是非常有利的，例如，总建筑师莱·勃鲁姆富有才华，革命处于低潮，共产党患有严重的幼稚病和“浪子回头”，强大的法国总工会是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发展工人党员的肥沃土壤，工人国际法国支部长期反对“国民联盟”政府。

1924至1925年期间，工人国际法国支部重新变成了一支强大的政治力量。它在1925年要求达到11.1万名党员。它在1924年大选中，在“左翼联盟”中同激进党结盟，获得了101个议席^①。

工人国际法国支部的学说(同共产党的学说相对照)

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自称同宗（马克思），同母（法国工人和社会主义运动），所以在学说方面具有共同的特征：

1. 继承卡尔·马克思从本质上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即资本主义的剥削建立在资产阶级占有无产阶级创造的剩余价值的基础之上。这种资本主义私人占有的特点同生产的社会化是完全矛盾的。从这个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中派生出了其他各种矛盾（阶级的对抗，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生产过剩的危机），而这些矛盾的加剧导致资本主义社会的灭亡。但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却用马克思主义的词句掩盖着形形色色背离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意识。勃鲁姆在图尔代表大会之前，不懂并

^① 清一色的社会党候选人名单获得了75万张选票，左翼联盟候选人的各单则获得264.5万张选票。《人民报》估计社会党的选票总数为170万张，这个估计未免有些乐观。

摒弃马克思主义，后来却利用马克思主义来反对布尔什维克（把列宁主义说成是鞑鞑人式的布朗基主义）和党的右翼。他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参考或者咒语。

2. 目标相似，认为社会主义（生产资料的社会化）能够，而且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恢复现已被打破的这种和谐、平衡，消灭人剥削人的现象。

3. 在道路和方法方面有某种类似。社会党人如同共产党人一样，认为只有工人阶级作为唯一的革命到底的阶级，才具备领导生产资料集体化斗争的才能：“从现今的社会到未来的社会，是不能经过持续的过渡阶段的”（莱·勃鲁姆语），而是要经过一次革命^①，而且在爆发革命的第二天，“法制空缺”和短时期的无产阶级专政被证明是必不可少的。

社会党和共产党这对同母异父兄弟的相似之处，也仅止于此。

以列宁主义为父的法国共产党肯定了十月革命的国际意义，并向布尔什维克学习。苏联作为唯一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变成了模式。长期以来，共产党只按一种道路，即苏联的道路，对法国社会进行社会主义的改造。出于同老的统一社会党奉行的机会主义、议会主义和民族主义决裂的意愿，共产党不无极端地挥舞起革命和国际主义的旗帜。共产党放弃议会制的传统，不把它当作建立法国社会主义的武器来使用。

^① 社会党“将不用等到这样一天，再开始以革命的方式变革社会制度：即现存的社会是那样接近新社会，以致不经过震动，不离开车厢与铁轨，就能滑向新社会。社会党知道，这一天是永远不会到来的，在两个社会天地之间将永远有一条鸿沟，跨越这条鸿沟将永远是某种冒险。”
（莱·勃鲁姆语）

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则不愿意“向法国的劳动者介绍新的纲领和新的学说”；只愿意忠于自己的历史。社会党人事先并不排除关于爆发革命的假设，而是强调使用合法斗争的武器。

“对社会党来说，暴力或武力都是党力求避免，或者使用时加以限制的最后手段。”（莱·勃鲁姆语）不经过“思想上和物质上的准备”，不进行改良这种精细的“逼近坑道作业”，社会党是不能取得胜利的。当将来经济、社会和政治条件相当成熟时，当无产阶级感到准备就绪，并切实准备好担负其解放使命时，社会党将以合法斗争或非法斗争的方式，夺取全部权力。

可是，莱·勃鲁姆把这种“夺取权力”同“行使权力”明确区分开来。“社会党人已在议会阵地上开展其阶级行动，所以，实际上只好通过现存机构的活动本身来掌权，即在这些机构的范围内，因而在其政治上所代表的资本主义制度的范围内掌权。这是我们的朋友，如英国、瑞典、丹麦朋友已经做到的事情。他们此后的作用，是要以最符合工人阶级利益的方式，来管理资产阶级社会的事务^①，如有可能，则要加快从现今社会向未来社会的过渡。然而，他们甚至不能想要在其活动的整个范围内，开始变革社会的事业。他们行使过权力；但他们并没有夺取权力。”（莱·勃鲁姆语）社会党人因左翼竞选的胜利而上升到参政的地位，但他们仍然尊重“资本主义制度的范围”，并不进行把“行使权力”变为“夺取权力”的尝试。莱·勃鲁姆下的结论是“在夺取权力方面，我不是遵纪守法者；但我坚决声明，在行使权力方面，

^① 由此，共产党人常在莱·勃鲁姆的名字上贴有“忠实的资本主义管理者”的标签。

我倒是遵纪守法者。”

把行使权力和夺取权力区分开来的这种做法，决不是随机应变，讲究策略。难道它本身不是改良主义的实质内容吗？

因此，共产党和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在学说和战略方面的对立看来非常尖锐，双方的意见分歧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基本问题上：

1. 关于国家问题。共产党想要揭露和不断攻击“阶级的国家”，直至将它彻底摧毁。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则忽视国家的阶级本质，并希望利用国家为其服务。

2. 关于理论和实践的关系问题。共产党让其政策和策略紧紧地、有时机械地服从其学说，以致达到经常堕入宗派主义的地步。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则已经习惯于使其依然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同其温和的改良主义实践相分离。它在许多基本问题（复兴，国际问题，殖民主义，新资本主义，反共主义）上奉行的政策，丝毫也不损害统治阶级的利益。

由于得到一些有利因素的支持，“修正主义”的著作在工人国际法国支部的门前，象鲜花一样盛开。首先是正统的学说在某种程度上停滞不前，党只限于重版盖德、拉法格、饶勒斯的旧作，以及勃鲁姆的一两本罕见的小册子。显而易见，重复已经失去实质内容的马克思主义公式，是丝毫左右不了变化多端的世界，左右不了1924至1929年期间充满生机和繁荣的资本主义的。“在出现资本主义的这种新形式的情况下，不再存在群众不断贫困化的问题（统计数字证明这点），不再存在日益加剧的阶级对抗的问题（事实证明这点），也不再存在由于消费不足而爆发工业危机的问题（经验证明这点）。”

（J·莫克语）无疑，修正主义的滋长，也可以从党的社会

成份发生变化，从那些没有经过盖德主义或饶勒斯主义熏陶的青年知识分子大量涌入党内得到解释。

这种“修正”是一次包括哲学、经济和政治在内的全面修正。

在比利时社会党人亨利·德芒发表一本以《超越马克思主义》为醒目书名的著作影响下，安德烈·菲利普和马赛尔·德阿发现了“社会主义的唯灵论”。在勃鲁姆的周围出现了一个深受美国诱惑的技术治国论者集团（奥里奥尔，斯皮纳斯，莫什）。在由莱·勃鲁姆作序^①的《社会主义和合理化》一书（1927年）中，J·莫什赞扬合理化对工人阶级十分有利（对增加工资不加明确限制，减轻劳累，丰富人的劳动，加强工会潜力，因工人入股而逐步实现生产资料的社会化！），是消灭阶级对抗的先兆。美国的新资本主义及其组织机构、劳动合理化、群体生产方式，对沙尔·斯皮纳斯这样的社会主义的技术治国论者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其“目光转向美国，仿佛是转向一个能作为我们学习楷模的国家”。德阿居然对社会主义前景表示怀疑，说：“明天谁将主宰欧洲？是美国的新资本主义方式，还是欧洲的新资本主义方式？”

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及其行会组织和独裁性使几个自称社会主义者的人着了迷。“法西斯主义的诞生，法西斯主义的力量，来自一种看来到处都显而易见的，建立一个强大国家、一个强盛国家、一个秩序国家的必要性。”（B·索塔涅昂语）在1933年7月的社会党代表大会上，波尔多市长阿德里昂·马尔盖重新采用了法西斯的三位一体理论：“秩序、权威和国家”。说工人阶级“感到这样的时刻已经到来：要

^① 实际上，勃鲁姆在序言中对该书的结论表明了重大的保留。

将迄今用来对付工人阶级的政府军队用来支持工人阶级。工人阶级自愿将权力的概念纳入其希望变得合乎逻辑、前后连贯和强大的社会主义行动之中”^①。

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进行自相残杀的战斗

在这场长达12年之久的战争中，交战双方都是在工人统一的名义下进行战斗的。然而，在工人统一的问题上存在着截然不同的观点。

1922年1月1日，共产国际发表了《致各国无产者的呼吁书》。“要建立单一的阵线。要使整个工人阶级都反对剥削阶级！要扫清那些设置在你们中间的障碍！”这种“单一阵线”的策略包括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对社会党及其领导人，我们必须转入一次更加猛烈、更加顽强、特别是更加连贯的攻势；与此同时，必须施展单一阵线的另一个策略，把社会党的工人争取过来。打击领导人和争取工人，这实际上并不矛盾。务必把社会党及其领导机构和干部同那些追随社会党或者至今还留在社会党内的工人区分开来。”（多列士语）

直至1934年，尽管共产党内存在着多多少少是明确表态的、多种多样的反对派，但共产党人仍然忠于单一阵线的策略。“右”的反对派倾向于共产党和工人国际法国支部举行两党最高级谈判，并且同工人国际法国支部缔造竞选联盟。

“左倾”分子则时而把单一阵线当作旨在“给社会党拔毛”的手段（特兰语），时而摒弃单一阵线的政策，并以同样极端轻蔑的态度看待社会党的工人和领导人，把两者混为一谈。

^① 引自D·利古所著的《法国社会主义史》第391-392页。当时，莱昂·勃鲁姆曾用“我感到恐怖”的话来打断马尔盖，接着又回答说：“马尔盖，我正在想，你讲的是不是一个独裁的国社党纲领。”

工人国际法国支部追随其领导人莱·勃鲁姆，认为走向工人统一只有一条单行道：共产党必须改邪归正，重返“旧大厦”。

两党之间发生了过激的争吵和辱骂。共产党往往揭露“社会法西斯主义”、“社会沙文主义和社会一警探。”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则谈论“莫斯科的走狗”，勃鲁姆大喊大叫：“今后，工人统一本身的必要条件，就是要摧毁共产党的干部队伍。我们一致认为要起来造反。大家都感到进行斗争、实行惩罚和杀一儆百的必要性。”据《人民报》的看法，共产党越过社会党领导人致社会党工人的公开信（1937年9月），表达了“那些业已上当受骗，并散布其荒谬口号的莫斯科领导人的不安情绪。”社会党总书记P·富尔认为，假如相信社会党工人对共产党公开信的复信会超过5封，那就是对他们的侮辱^①。

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党内的派别斗争

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党内存在着大小各不相同的几个派别，其意见分歧主要在政策和策略方面。

1. 小小的极左派（机关报是《火星报》）。它愿意建立共产党倡议的单一阵线。

2. 左派（布拉克，齐隆斯基）。它作为盖德派的继承人，讨厌勃鲁姆的“行使权力”论，讨厌“入阁主义”，并拒绝同激进派结盟。它希望重建工人阶级的统一，反对资产阶级。它认为，这个愿望在不久的将来是可以实现的，因为工人国际法国支部与共产党“在学说上目标相同”。

^① 这段话引用于G·伐尔泰所著的《法国共产党史》，第193、233页。

3. 占绝大多数的中间派(莱·勃鲁姆, P·富尔)。它在选举中, 既想捍卫党实行自治的鲜明特点, 又想同激进派达成谅解。1924年, 由于实行省级名单一轮投票制, 工人国际法国支部被迫部分地放弃党的自治性。它同激进派结盟(建立左翼联盟), 而这种联盟原则上以“一分钟”为限, 即局限于选民把选票投入票箱的一分钟。在1928年实行选区单名投票制的选举中, 中间派实行在第二轮投票中相互退出选举, 让名列前茅的那个候选人当选的策略, 取得了成功。它反对社会党参加左翼联盟政府, 更加反对社会党参加民族团结政府, 从而表明其准备到一个由社会党占主导地位的政府里去“行使权力”。

4. 右派(雷诺戴尔, 奥里奥尔, 蓬古尔)。它主张在大选中和在政府内部, 同激进派进行长期紧密的合作。

5. 极右派(德阿, 马尔盖)。它深受法西斯主义的诱惑。

第九章 美好而短暂的春天： 人民阵线

历史背景的变化

1929年的世界性经济危机作为一场规模和持续时间都特别严重的危机，引起了一连串并发的(社会、政治和思想的)危机，使统治阶级的领导权发生了一场真正的危机。“愤怒的葡萄”熟了。无数的完全失业者和部分失业者经受了苦难和屈辱，中间阶层陷入一片惊慌(职员失业，中小工商业企业遭到破产，或者面临破产的威胁，公务员的薪水减少，农民的烦恼加剧(1934至1935年期间，农业收入下降了一半以上)。这个不协调和不公正的世界在贫穷和贫困出现时，却在破坏社会财富，难道这不足以表明，经济制度和所有的统治集团——经济集团、政治集团和知识集团的破产吗？

在危机的阴影下，在德国，国社党获胜；在法国，则增加了法西斯主义的危险。德国共产党和社会党的悲剧性的经验对其法国的兄弟党来说，是一个教训：在共同的敌人准备把共产党和社会党一举消灭时，两党继续相互厮杀就意味着自杀，尤其是这个共同的敌人从希特勒合法地、比较轻松地上台中获得了鼓舞。中间阶级的不满情绪产生于危机，并因内阁不稳定和斯塔维斯基财政丑闻而加剧，从而掀起了一股反对议会的大浪潮，被极右翼用来反对共和国。1934年2月6日，联盟向波旁宫发动了进攻。这次进攻被打退了，但紧接

着却促使右翼在“民族团结”的幌子下卷土重来。至此，人民阵线作为一种反应，应运而生了。

国际上的气氛终于变得沉重起来了。1935至1936年期间，法西斯的意大利进攻了阿比西尼亚，纳粹的德国恢复了义务兵役制，并且使莱茵河沿岸地区重新变成了军事区。面对国际联盟表现的软弱无能，人们尖锐地提出了一个集体安全组织的问题。1935年5月，法国和苏联签署的互助条约为此树立了一个里程碑^①。

改变了角色

在这种新的历史背景下，演员们改换了脸谱和服装，排练了一出新戏。总有一天，历史学家将会搞清楚，这些演员通过改变角色，对“人民阵线”这出新戏会产生多大的影响；反过来，这出上演的新戏对演员们的形象又会产生多大的影响。

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发生了部分蜕变。首先，由于“新社会主义派”的分裂，极右派（马尔盖，德阿）和一部分右派（雷诺戴尔）被清除出党；然后，自从1934年2月左翼联盟被埋葬和民族团结政府复活以来，它变成了内阁的反对派。

法国共产党则在好几个因素——对此，我们尚未很好地研究过——的交叉影响下，完成了一次真正的转变。在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发生危机的气候下，以莫·多列士为中心，建立了一个能够协调并领导所有危机受害者的斗争的、名符其

^① 在法苏会谈结束后发表的公报中，苏联政府声称“充分”赞同“法国：为了维持其武装力量达到国家安全水平而制定的国防政策。”共产党则通过一张题为“斯大林有理”的轰动一时的宣传画，来表示赞成苏联政府的这一声明。

实的党的“领导集团”。同时也不要忘记共产国际的作用。是共产国际培养和安排了这些干部，并在多列士身边派驻了一个名叫弗里埃德的代表，弗里埃德后来成为多列士的亲密战友，多列士的影子，以致于无法区别他们个人所作的贡献。由于缺少历史档案，我们还搞不清法国共产党同共产国际之间复杂的辩证关系：法国共产党发挥先锋作用；共产国际的领导机构通过长期激烈的内部辩论制定了新的战略，而且根据难于理解的编年史，当时共产国际时而发挥马达的推进作用，时而发挥刹车装置的作用。过时的分析和口号，旧的东西继续残存一段时间，而新的东西正在含苞待放，甚至已经鲜花盛开，使形势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由于共产党诞生和发展的历史条件，党内滋长了宗派主义，巴尔贝—塞洛尔“集团”则代表并加剧了这种宗派主义。反对狭隘的宗派主义这场必要而艰巨的斗争，是在两个不同的时期里进行的。

第一次战斗于1931年进行，在两条战线上获得了进展，一是反对在激烈的空话下掩盖起来的无所作为，二是反对专断的、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党为“争取牛排的斗争”，为争取工人的权利要求——不管这种要求怎样微不足道——而开展的坚韧不拔的日常行动恢复了名誉；党不再把“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口号当作“芝麻芝麻快开门”的万能钥匙。其次，为了使党内流动新鲜空气，造成一种更加民主的“民主集中制”局面，莫·多列士在《人道报》上发起了一场宣传运动，那些宣传文章的题目发人深省：《不要做木头人》，《要张开嘴说话》，《最后还要进行讨论》。

第二次战斗始于1934年6月召开伊夫里全国代表会议期间。莫·多列士根据德国和法国发生的事变，说明了形势

的特点。不应在“民族团结”政府和苏维埃共和国之间、在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作出抉择，而是要在法西斯主义和民主——革命的民主之间作出抉择。在法西斯主义和民主之间，业已进行了一次具有生死存亡意义的“短跑”。为了赢得这次比赛，共产党必须改变其战略：要“不惜任何代价，同社会党的工人一道，实现反法西斯的统一行动……要·不·惜·任·何·代·价·，在唯一的法国总工会里实现工会统一”。要·不·惜·任·何·代·价·去做，因此，甚至要同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和法国总工会的领导机构举行谈判和达成谅解。这种无产阶级的统一，即使付诸实现了，也还是不够的；统一的工人阶级也要“把中间阶级从蛊惑人心的法西斯宣传中争夺过来，吸引过来。”

实行这种新战略就要求法国共产党的学说进行两处非常重要的修改（并且以此作为基础）。首先是公开宣布重新高举民主自由旗帜的意愿：“对于资产阶级政治制度具有的形式，共产党人从来都不是漠不关心的……他们过去捍卫过，现在捍卫着，将来还要捍卫由人民群众自己赢得的一切民主自由成果，首先是捍卫工人阶级的全部权利。”因此，必须以批判的态度，重新评价“资产阶级的民主”，尽管维护和丰富民主的斗争同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息息相关，但当时尚未导致在理论上对社会主义过渡的特殊道路问题，对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复杂关系问题进行思考。其次，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不是要象从前那样导致某种民族虚无主义的产生，而是要使共产党人变成高尚的爱国主义者。莫·多列士声称，“共产党人热爱自己的国家”，他们想要捍卫本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他们要求继承历史上一切革命斗争的传统，他们把马赛曲和国际歌调和起来，把红旗和三色旗联系起来。

尽管法国共产党长期以来是共产国际的附属党，并宣称自己只是一个支部（共产国际法国支部），但它现在却发展成为一支正在参预国内生活并能改变其进程的、强大的政治力量。其名称缩写变为P. C. F（法国共产党），表明了这种极其重要的变化。新鲜血液大量涌入共产党，1933年仅有3万名党员，1936年底则高达28万多名。

拉开了序幕

与左翼联盟这种普通的竞选协定不同，人民阵线建立在广泛的群众运动之上。可是，要明确这两者的相互关系，就必须紧密地联系人民运动消长的历史，并且把这部历史同最高领导层之间达成谅解的进退情况加以对照。

人民阵线的诞生可以分为几个重要阶段：

1. 1934年2月掀起了统一的反法西斯大潮。

2月6日，各人民阶层，特别是工人阶层，通过突然出现的具有政治色彩的斗争、高昂的战斗精神和对统一的渴望，来回答联盟的企图。

2月12日，在各个工会组织（法国总工会，法国统一总工会）和政治组织（共产党，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各自发出的号召下，举行了一次总罢工。在巴黎，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这两大游行队伍涌入共和国广场，汇合在一起，高呼“统一！统一！”的口号。过去冤家路窄的兄弟，现在肩并着肩，走到一起来了；从前使兄弟分离的那堵偏见和怨恨之墙开始出现了裂缝。在外省，游行的规模更大，“一股史无前例的浪潮席卷着法兰西”（A·普鲁斯特语）。

2. 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签订了统一行动的盟约（1934年7月27日）。

经过14年的争斗，法国共产党和工人国际法国支部缔结了反战、反法西斯和反民族团结政府的防御性联盟，协调委员会的任务在于共同组织示威游行，解决双方争执，并且注意不让那些忠心耿耿，参加联合行动的活动分子遭到任何指责。

3. 多列士提出人民阵线的思想和口号（1934年10月）。

多列士于10月26日，在即将召开激进代表大会的南特，建议“建立自由、劳动与和平的人民阵线，来对付反动派和法西斯阵线”^①。

4. 1935年7月14日为人民阵线举行“洗礼”。

激进党对其在议会和政府里同右翼的结盟感到失望，因而被“青年激进党人”（J·塞）和爱·达拉第埃引向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联盟。“人民阵线诞生了。现在要做的事情是为人民阵线洗礼。参加游行的人山人海使这天变成一个‘历史性的日子’”（J·福韦语）。

7月14日早晨，1万名参加“和平与自由会议”的代表在布法洛自行车训练场宣誓，决心要“继续团结在一起”，“捍卫法兰西人民已经获得的民主自由，给劳动者面包，给青年人工作，给世界人民伟大的和平”。当天下午，数以万计、几十万计的人群^②在迎风飘扬的红旗和三色旗的指引下，高

① 共产国际对此持强烈的保留态度，共产国际驻法国代表埃尔科里（陶里亚蒂）在南特讲话的当天早上，就同多列士作了最后一次交涉，但没有成功。尽管如此，事隔不到一年，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却祝贺法国共产党，并号召所有的共产党学习法国的经验。

② 这次游行“动员了那么多人，以致无疑要回溯到德雷福斯事件，才能看到同样的盛况”（G·迪珀语）。据警方估计，有10万人参加了游行；游行组织者则提出50万人的数字。

唱《马赛曲》和《国际歌》，从巴士底广场列队行进到共和国广场。“我从未见过这样壮观的场面……有个歌德昨晚回家后写道：今天开辟了历史的新纪元，这究竟是哪个歌德呢？”（莱·勃鲁姆语）

5. 通过了人民阵线的章程和纲领（1936年1月）。

关于人民阵线章程的问题，举行了艰难的谈判。共产党要求既在工厂，又在街道和乡村，建立起一个经过选举产生的“基层委员会”的大网络；这种基层委员会可以吸收那些“未参加组织的人”参加，在“群众”进行的参预和监督中行使领导干部的职责。然而，社会党和激进党却认为这种基层委员会是披着共产党外衣的工具，并强制推行它们的观点：“人民阵线既不是政党，也不是超政党”，只是那些充分保持其独立性的组织之间的一个“联络中心”；地方委员会和省级委员会效法全国委员会的榜样，是一些不接受任何个人参加的行动联盟。

关于人民阵线纲领的讨论，是围绕“结构改革”的问题进行的。工人国际法国支部主张对信贷和一部分工业实行国有化，但遇到共产党人^①和激进党人的反对。最后通过了一项旨在满足各界劳动群众目前权利要求的纲领。政治方面的权利要求集中在两个方面：捍卫自由（首先，解散那些捣乱分子的联盟）与保卫和平。经济方面的权利要求包括两大方面：恢复购买力（其办法是同失业作斗争，同农业和商业方面的危机后果作斗争），开展打击抢劫银行和积极组织信贷的斗争。全国委员会主席V·巴斯写道，“所有的左翼政党和团体就某些明确的权利要求问题达到了谅解，这在共和国建立

^① 共产党人过去害怕将国有化和社会化两者混为一谈，现在又多了一个顾虑，怕吓跑中间阶级。

以来还是第一次。”

6. 实现了工会的统一（1936年3月）。

工会运动陷入了四分五裂的状态，已有15年之久了。面对比较团结一致的资方，工会运动的分裂导致产生了工团主义的软弱无能和工人的不满情绪^①。在人民阵线的气候下，工人要求工会运动统一的压力增强了，一些单一的工会自发地组织起来。统一成为“不可避免”的事情（博特罗语）。两大工会在图卢兹代表大会上实行了合并。

由于存在一个统一的、阶级的和群众性的工会运动，阻塞了法国走上英国式工党的道路。

1936年4、5月间举行的大选

人民阵线不是一次自发的奇迹般的爆炸，而是坚定的政治方向的成果，是长期斗争的成果，是“长期进行思想准备的成果”（G·迪珀语）。

业已付诸实现的左翼统一开辟了胜利的前景，因而突然掀起了一股政治热。为议会选举进行的宣传运动以其热情而引人注目。右翼疯狂地摇动着共产党这个稻草人。左翼则既想要安抚舆论，又想要动员舆论。莫·多列士呼吁“法兰西民族团结起来，反对200个家族”，以便建立一个“自由、强大和幸福的法兰西”。“天主教徒、工人、职员、手工业者、农民们，我们作为世俗者，向你们伸出手来，因为你们是我们的兄弟……国民义勇军，参加火十字团的老战士，我

^① 1935年，或多或少同情社会党的法国总工会拥有60万到70万名会员，其基本力量集中在公用事业部门（公务员，邮递员，铁路工人）。深受共产党影响的“全国统一总工会”则拥有20万名会员，主要分布在矿山、铁路、冶金工业和公共服务部门。

们向你们伸出手来，因为你们是法兰西人民的儿子……因为你们象我们一样，希望国家幸免于毁灭和灾难。”①

同1932年大选结果相比较，第一轮选举（4月26日）的结果表明，出现了有利于左翼的、右翼略有下降的情况②，以及左翼内部力量对比的变动情况。尽管新社会党人进行分裂，但工人国际法国支部仍保持其阵地，而激进党人失去了数10万张选票，共产党的选票则增加了87.5%③。

共产党依靠三大城市地区：巴黎及其“红色郊区”（这里的选民占党的选民的1/4，议员占党的议员的一半以上）；诺

① 多列士的这篇广播讲话（各大政党在电台上首次享有发言权）以简短而激动人心的方式，阐述了法国共产党在维勒班全国代表大会（1936年1月）上制定的新的民主、民族政策。

②

	右翼	左翼
1932年	占登记选民的37.35%	占登记选民的44.48%
1936年	占登记选民的35.88%	占登记选民的45.94%

③ 除了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和激进党的正式候选人所获的选票之外，还可以加上“联合竞选人”所获的选票（下列图表上用括号加以标明）。但这种“联合竞选”会引起许多争议。由G·勒弗朗确定的标准看来是最有根据的，这里我们引用他的数字：

	1932年	1936年
社会党(加上“联合竞选者”)	1964000 (2034000)	1887000 (2206000)
激进党(加上“联合竞选者”)	955000 (2315000)	690000 (1745000)
共产党	738000	1469000

尔省和加莱海峡省的煤矿区；东南部的几个城市（马赛，阿累斯，拉谢纳）。共产党还在农村地区拥有两个新兴的强大基地：中央高原的西部边缘地区（洛一加龙，科雷兹，上维恩）和南部的地中海沿岸地区。

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在巴黎地区力量薄弱，但它在几个大纺织工业中心（里尔，特鲁瓦，罗昂）承继了盖德派的组织力量，并同盟友“人民阵线”争夺南部的大城市（马赛，尼姆，塞特，纳尔榜，图卢兹）。它在中央高原的北部（上维恩，阿利埃，克勒兹），在图卢兹地区和南部的地中海沿岸地区，巩固了党的农村组织。

由于左翼候选人和选民高度的纪律性（从过去的斗争和采取坚决的预防措施来看是高度的纪律性），第二轮选举（5月3日）最终“打破了议会的平衡”（G·迪珀语）。人民阵线在议会中比对手多得40席，成为遥遥领先的议会多数派^①。

工人国际法国支部拥有最多的议员，因此要求其领袖莱·勃鲁姆负责组建和领导人民阵线政府。尽管莫·多列士主张党“面临群众运动的推进”，应“表现出无畏的精神来”，但共产党还是婉言谢绝了入阁参政的建议。经过漫长的一月，莱·勃鲁姆才组成了内阁。

工人阶级表现出一种强烈的急躁情绪。它对于被迫接受低工资和遭受老板的专制感到厌烦，还担心斗争的胜利果实被人篡夺。但由于工人（工会和政党的）统一，由于联合左翼的选举胜利，它十分相信自己的力量，从而树立起新的战

^① 人民阵线占378个议席，其对手占220个议席。共产党议会党团从10名议员增加到72名议员；工人国际法国支部议会党团从97名议员增加到146名；激进党则从159名议员减至116名。

斗精神。

1936年5、6月间举行的罢工

一股前所未有的强大而非凡的罢工浪潮席卷了整个法国。象这样被世人研究、曲解或理想化的罢工斗争是为数不多的。

对发动和领导罢工进行所谓“自发”的解释堂而皇之，却视而不见自发性和组织性之间那种历来错综复杂和变幻不定的界线；而那些表面上看来自发产生的罢工，往往是过去长期进行耐心的地下工作的成果^①，或者是学习榜样的力量的成果。诚然，法国总工会对事态的迅速发展感到意外，但它很容易上了车，即使这是一列正在高速前进的火车也罢。

从罢工运动强大而不可抗拒的事实中，是否可以象M·比韦尔那样得出“无畏者事竟成”这个结论（1936年5月27日《人民报》）呢？凡是重大的罢工斗争浪潮，罢工者都组成一个成份非常混杂的集团。罢工运动使那些最不习惯罢工斗争的行会（大商店的职员，咖啡馆的服务员，服装厂的女工）和那些从未开展过工会支部活动的单位卷入了罢工斗争，这个事实不是要证明有关革命形势出现的论断，而是说明罢工者的斗争目标和战斗精神的多样性。那么，怎样来评价从一个地区到另一个地区（巴黎地区似乎站在斗争的前列），从一个工业部门到另一个工业部门，从一个企业到另一个企业所发生的重大变动，以及在同一个企业内部，在某些特殊的历史时期中阶级觉悟的突然提高呢？有些同时代的

^① 参阅L·欧迪埃关于阿佛尔的布雷盖工厂发生第一次占厂罢工的证词（《莫·多列士研究所历史手册》，1972年11-12月第一期）。

人和几个历史学家（盖兰、达诺和吉布兰）把极少数人表示的革命意志同对激进变革（形势的发展使之变得可信）的深刻愿望混为一谈。到处都明显地看到权利斗争——罢工者反对低工资，反对失业，反对老板专制，争取更加公正的生活，要求承认其享有尊严和幸福权利的斗争——所具有的首要意义。

由于工人的首创精神，出现了一种（在法国）前所未见^①和卓有成效的斗争形式：“现场罢工”，罢工者占厂。（选举产生的）罢工委员会精心地注意保养设备、组织罢工者的食物供应和娱乐活动。罢工中洋溢着一种“民间节日和权利要求交织在一起的气氛”（J·洛姆语）。这些斗争活动符合罢工的基本战略目标，即剥夺老板反罢工的两大武器：关厂和利用黄色工会分子。但是，除了几个例外，这些活动与1920年意大利的罢工相反，并不想要用工人的管理来取代老板的管理。当然，在老板看来，罢工已经构成真正的弑君罪，是对老板所有权的严重侵害。

那么，是否因此谈得上革命的激情呢？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不管肯定与否，都必须讲究分寸。不管怎样，此时不存在革命的形势，因为力量对比明显地不利于斗争，如来自纳粹德国外部威胁的、紧迫的国际局势，近半个法国所持的反对人民阵线的态度，中间阶层（甚至那些已经投左翼选票的中间阶层）对财产和秩序的眷恋，“从1871年巴黎公社以来法国从未经历过的”（勃鲁姆语）那种既自发产生、又被精心组织的“集体害怕”运动，有产阶级进行抵制并随机应变的

^① 现场罢工是1920年在意大利使用的斗争方式，也许由于移居法国的意大利劳动力而出名。

能力，镇压机构采取的敌对行动，人民阵线的缺乏团结等。在这个工人斗争赢得胜利的6月中，人民阵线作为工人阶级与中间阶层的联盟，存在着分裂的危险。多列士想要防止这一危险。“目前不存在夺取政权的问题……并非一切都有可能……必须善于结束罢工。”

此外，难道资方在6月7日签署马提翁协定时没有作出让步吗？法国总工会的报纸上登出了这样的标题：《对贫困的胜利。800万雇佣劳动者的要求得到了满足》。

“工人们隐隐约约地感到自己已经跨越了一个阶段，跨出了决定性的一步。他们从工人的伟大功勋中领悟到的经验，将来是忘记不了的：从此，事情将不再一成不变了。”
(普罗斯特语)

胜利的收获季节

人民阵线想要是，而且首先是一个反法西斯主义的和反贫困的防御性联盟。随着法兰西的失败，民主政体的巩固和1936年取得的社会成果，人民阵线至少暂时达到了上述两大目标。

人民阵线只完成几项结构改革，即改变法兰西银行的地位，创建一个混合经济的铁路公司，并实行军火工业的国有化。

反过来，人民阵线使法国拥有一个先进社会的法律。

马提翁协定中规定的劳资协议和设立选举工作人员代表制，使工人们加强了他们的尊严感和声援意识。

40小时工作周和半月带薪假期，使工人的生活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保障了“雇佣劳动者合乎人情的晋级”(G·

勒弗朗克语)。他们享有休假、娱乐和体育运动的权利^①！1936年夏天，当他们第一次看到大海时，究竟有多少天“带薪假期”呢？勃鲁姆在里翁诉讼案中，以怀旧的心情回忆说：“公路上，‘破车’，摩托车，双座自行车，身穿套领线衫的工人夫妇，到处是车水马龙。”1936年出现了野营、青年旅社和民用航空的高潮。

由于工人们取得了斗争成果，开展了新型的娱乐活动，他们终于能够享有文化的权利。在法国总工会的赞助下建立了“人民剧场”；塞纳省工会联合会创建了一所专教绘画、制图和雕塑的学校。“人民音乐协会”得到了近代法国最伟大的作曲家们的支持。

从联盟的胜利中得到好处的不仅是工人一家。由于设立了小麦专卖局，小麦提价使农业收入有了大幅度的增长。农民、手工业者和商人在贷款方面得到了新的便利条件。

人民阵线能够对各个领域施加何种影响，这点是难于判断的。比如，人民阵线在多大程度上，使深受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传统熏陶的工人阶级意识到它的全国性作用，并且由此为抵抗斗争预作准备呢？它给文学艺术的创作带来了什么呢？是否带来新的观众和读者，新的主题？某些伟大的作品，如马尔罗的《希望》，阿拉贡的《高等住宅区》，毕加索的《盖尔尼卡》，J·雷诺瓦尔的《伟大的幻灭》《马赛曲》，特雷内的歌曲等，在人民阵线时期诞生并非偶然。

^① 勃鲁姆实行革新，在其主管的部里设置了一个管理娱乐和体育运动的副国务秘书职务。

人民阵线的瓦解

经历长期的垂危阶段，人民阵线在激烈的内外夹攻下，于1938年秋天消亡了。

人民阵线的政敌从未放下过他们的武器。

尽管极右翼的路线已经消失，但它的组织依然存在。它拥有一个合法的新党——“法国社会党”^①（拉罗克）和法国人民党（多里奥）以及一个当时鲜为人知的、准军事的秘密结社——“革命行动秘密委员会”^②。

尽管统治阶级受到人民阵线的打击，没有很好地从1936年6月“恐惧”状态中摆脱出来，但它却进行了一次强大的反攻。它装备精良，拥有报刊杂志，得到政治机器的坚强支持，并掌握经济和财政的指挥权，因而能够抵制以社会党人为主的政府“行使权力”。“资产阶级掌握着权力：它既不想放弃，也不想让人瓜分”（莱·勃鲁姆语）。资方在1936年6月曾被迫放弃其神圣权利，但从同年夏天起就改组成一个更有战斗性的团体：“法国雇主总联合会”。过去曾使左翼联盟碰得头破血流的“金元之墙”，如今使人民阵线历届政府陷入到财政困难之中。使用其否决权的参议院，以及一个高级行政管理派别使政府的活动处于停顿和瘫痪的状态^③。

人民阵线是用一支日益分裂的军队来对付这些强大的敌人的。一旦人民阵线达到其首批主要目标——巩固共和派的自由和社会成果。其最温和的成员就立即害怕社会革命的前

① 原文为“Le Parti social français——译注。”

② 革命行动秘密委员会似乎已经准备好发动一次军事政变，但工人国际法国支部成员、内政部长马克斯·多尔莫瓦挫败了这次政变。

③ 参议院使两届勃鲁姆政府垮台（1937年6月和1938年4月）。

景；甚至连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及其选民也不免害怕共产主义。共产党则对历届人民阵线政府所持的办事躲闪、迂回和最后退却的态度有一种日益加剧的不信任感。那些促使谅解——这里要强调一下，只是高层谅解而已——发生破裂的分歧涉及到财政、社会、外交领域，尤其是外交领域。

勃鲁姆政府上台时发现，财政局势极为困难，是个“烂摊子”（V·奥里奥尔语），而且因投机倒把和大量黄金外流而变得更加恶化。政府被逼得走投无路，只好在1936年9月采取使法郎首次贬值的做法，从而使同年6月争取到的增加工资的成果部分地丧失。1937年2月，莱·勃鲁姆表示有必要进行一次“休整”。他敦促雇佣劳动者放弃其权利要求，不管这些要求怎样合法，只要影响到物价和货币的稳定，就必须放弃。共产党则提出“必须叫富人付钱”的口号，主张用由这个公式表述的政策，来反对用法郎贬值“叫穷人付钱”，反对那种“阻碍工人阶级前进”的休整^①！

在外交政策方面，面对法西斯强国的侵略，出现了两种界线不大明确并且变幻不定的对立派别：坚定派和调和派。

在佛朗哥将军发动叛乱，反对西班牙合法政府之后，莱·勃鲁姆首先考虑到维护法英协定，所以采取了“不干预”的原则。然而，这种不干预原则并未得到恪守。德国和意大利在物质、技术人员和士兵等方面为佛朗哥政变提供援助，确保其政变得逞。因此，呼声四起，反对这种“骗局”，并

^① 关于人民阵线政府奉行的经济政策、40小时工作周等问题的争论，参阅莱·勃鲁姆著《1936-1937年政府首脑。讨论会文件》（加兰1967年版），及其在克·维拉尔所著《从复兴时期到今日社会主义》（法国大学出版社1971年版，第121-122页）中的文摘。

要求停止围困西班牙共和国，其中有共产党、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左派（齐隆斯基），甚至几名社会党人部长和激进党人部长（奥里奥尔，科特，戴）的呼声。

裂痕在增多，在增大，到了希特勒发动捷克危机时变成了裂缝。共产党强烈谴责慕尼黑协定（1938年9月），认为这是对侵略者的一次新的投降：“不要把它说成是和平协定……你们是在自由的人民被肢解的躯体上签上失败这两个字”（G·贝里语）^①。在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党内，分裂变得越来越严重。保尔·富尔总书记推动了和平派^②。“宁要和解，即使是无足轻重的和解，也不要战争”（G·阿勒马语）；争取“不惜任何代价的和平”（M·古科维斯基语）。齐隆姆斯基采取的立场同共产党非常接近：“和平是不能用牺牲民族独立和民主自由的代价去换取的。国际社会主义作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一支和平力量，从未想到要争取‘不惜任何代价的和平’。”在慕尼黑协定签署的第二天，莱·勃鲁姆就处在“懦夫的宽慰和耻辱”之间，但他很快就赞成坚定的政策：“法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应更加坚定地联合那些决心维护集体安全原则的各国人民，这是国家安全的基本因素之一。”

慕尼黑协定“既充满国外的灾难，也充满国内的剧变的后果。它也是人民阵线不可挽回的终结。”（J·富韦语）

① 共产党议会党团是唯一投票反对慕尼黑协定的党团。此外，还有两名孤立的众议员：民族主义者德·凯里伊斯和社会党人布埃。

② 和平派，即“革命的左翼”（或比韦尔派），早在1938年6月就脱离了工人国际法国支部。该派是埃韦尔派的继承人和托洛茨基派的门徒，极力主张和平主义，反对任何好战的反法西斯主义。

1938年11月颁布了达拉第-雷诺的法令（实际上取消了40小时工作周），以示抗议的总罢工遭到失败和镇压，这样就给奄奄一息的人民阵线带来了最后一击。

第十章 战争的考验

“奇怪的战争”

人民阵线在1936年春天开展那次喜人而成功的行动之后长期退却，最终遭到了失败，从而突然地丧失了斗争的前途，加剧了组织分裂，给人们留下了苦涩的回味。

此外，战争的风暴在地平线上发出隆隆的雷声，不久后就在空中爆发了。这是一场战争，一场“奇怪的战争”，一场在没有信念和没有毅力的情况下指挥进行的战争。“整个前线，一切正常。”接着，闪电战、崩溃、灾难、第三共和国垮台和纳粹侵占等事件突如其来。

在这样一种黯淡无光的历史背景下，共产党和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各自经历着一场悲剧，近乎到了濒于死亡的边缘。

法国共产党和工人国际法国支部的决裂是由苏联的政策造成的。

两党早已对苏德互不侵犯条约（1939年8月23日）作出截然不同的评价。工人国际法国支部认为苏德条约是一次“背叛”，共产党则将责任推到西方国家政府奉行的政策头上，说它们怂恿慕尼黑向东突进，破坏英、法、苏三国谈判（1939年夏天），因而使集体安全的政策受挫。“社会主义国家”通过“打破帝国主义国家阵线”，维护了美好的未来。这种立场在某些共产党员或者同情共产党人那里造成

某种混乱。

尽管法国共产党最先受到攻击，但它却支持了反希特勒战争的努力，直至1939年9月底。甚至在9月2日，共产党议会党团还投票赞成反希特勒战争的拨款。

9月底、10月初，形势发生了转折。此后不久（1939年10月，共产国际执委会），共产国际在制定战争的理论定义时，只看到战争的帝国主义、反动性质一面，从而掩盖了战争的反法西斯性质的另一面。实际上，共产国际的战争定义是片面的，狭窄的，因此是不准确的。但法国政府指挥战争的经验似乎证明了这个定义是正确的，因为它在德国前线按兵不动，对国内工人运动发动进攻（于9月26日取缔法国共产党，审判共产党议员），最后还准备进攻苏联（达拉第政府决定派一个远征军团去芬兰；参谋部制定了进攻高加索油田的行动计划）。“打倒帝国主义战争”和“举行和平谈判”的口号取代了“向希特勒开战”的口号。

然而，共产党人是沿着背离公众舆论的方向逆行的。他们失去了深受群众同情的资本，遇到了不理解，遭到了反对。特别是面对左翼和右翼中同流合污的反共反苏的强大攻势，共产党人能够用来进行反击的行动手段极其有限：党组织不再合法存在；党的报刊被查禁，党的议员被废黜，党员被逮捕或者被追捕，党的工会领导人被开除出法国总工会。

共产党遭到严重的削弱，但它却没有被摧毁。党开始经历了开展地下斗争的艰难历程，党的活动分子经受了这场斗争——它在法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无疑是最艰巨的政治考验——的磨练。在法国溃败之时，共产党仍然是国内唯一能进行“抵抗”斗争的一支有组织的力量。

在苏德条约签订之后，工人国际法国支部走上了反共十

字军远征的道路，其目的是要使工人阶级脱离法国共产党。当然，这种总的做法并不排斥具体做法上有些微小的差别。莱·勃鲁姆表示过保留意见，说共产党解体是一件“自然的、合情合理的”事情，但也是一个“错误”，因为它妨碍了共产党的变质。与此相反，某些社会党人变成了镇压共产党的帮凶。巴尔泰勒米同意充当议会委员会宣布废黜共产党议员决定的报告人。1940年1月16日，沙塞涅在众议院开会时，主张对某些共产党人“颈后打枪”；此后，同年4月，社会党人、司法部长塞洛尔提议要对开展活动的共产党人判处死刑。

战争瓦解了法国共产党，但也认可了工人国际法国支部中“保尔福派”对“勃鲁姆派”的胜利。1940年6月，主张继续斗争的莱·勃鲁姆只获得一个小小的信徒核心的支持。同年7月10日，只有工人国际法国支部的36名议员（众议院议员总数为175名）^①拒绝投票授予贝当元帅全权。社会党的一名活动分子G·雅盖写道：“社会党呈现出一种不体面的崩溃的模样。议会党团中绝大多数议员刚刚授予贝当元帅全权。行政管理常务委员会并不认为有必要开会；人们确实得出了一个印象：在法国，也许在世界上，社会主义即将从政治地图上消失。”

抵抗斗争时期的共产党

对于法国共产党直至苏联参战时所奉行的战略，人们已经花费了许多笔墨。有的用黑墨水：“冷战”的文献把法

^① 此外还有6名议员主动弃权；8名议员在波尔多登上开往北非的“密西两利亚”号邮轮，因而未能参加投票。

国共产党说成是消极的抵抗者，甚至是侵占者的同谋。有的则用红墨水：很久以前，法国共产党就拒不承认明显的事实，把党在前进中的探索和错误^①一笔勾销了。

让我们回忆一下当时的历史背景：法国遭到了失败和占领，处于愤怒、慌乱和绝望之中，准备聆听贝当元帅蛊惑人心的宣传；1940年夏天，共产党的领导机构有四个头头（多列士在莫斯科，弗里埃特在布鲁塞尔，杜克洛在巴黎，弗拉杜在非占领区），彼此联系困难，有时不可能进行联系；共产党经历了数月的地下生活，党的活动分子在溃败和逃难中分散在各地，这种气氛对于党在理论和战略问题上的讨论和思考都很不利。

在1940年进行抵抗斗争，首先就是拒不承认失败的现实，阐明失败的原因，并且克服失败的后果。法国共产党是在本国国土上，以党的身份进行抵抗斗争的政治力量。但共产党的抵抗斗争具有以下复杂性：

1. 共产党仍然坚持共产国际在1939年秋天制定的对战争的片面观点。由此产生了党的和平主义观点，党对反纳粹占领者斗争所持的审慎态度，以及一些不适应形势的口号：“不要同戴高乐一起支持英国士兵！不要同贝当一起支持德国士兵！法兰西民族联盟万岁！不要英国的统治！不要德国的庇护！共产党人想要实现并将实现的自由、独立和幸福的法兰西万岁！”（1940年8月《人道报》）

2. 法国共产党既对失败进行阶级分析（认为那些喜欢希特勒而不喜欢人民阵线的人是卖国贼），又对维希政府进行

^① 特别是1940年6月底，法国共产党曾向占领当局要求合法出版《人道报》，不过，这种要求很快就撤回了

阶级分析（认为它是叛徒和卖身投靠者的政府）。共产党在直接地尖锐地揭露维希政府的同时，把“争取自由和独立的斗争”同“争取民族和社会解放的斗争”联系起来（1940年7月呼吁书）^①，从而开辟了抵抗斗争的新道路。

3. 从1940年夏末起，共产党为了同消极和屈从进行斗争，试图发动一次群众性的抵抗斗争。首先组织了工人阶级的权利斗争；建立群众性的组织雏形（“人民委员会”）；在诺尔省和加莱海峡省的矿工大罢工（1941年5、6月间）中发挥领导作用；联合发起1940年11月11日大学生在明星广场举行的爱国示威游行。1941年5月15日，“出于为民族独立的神圣事业而实现民族统一的唯一考虑，法国共产党以国家利益为重”，呼吁建立一个“争取法兰西独立斗争的全国阵线”。这个由持不同政治和哲学观点的人士组成其领导机构的全国阵线，将成为最重要的抵抗运动组织之一。

苏联的参战（1941年6月22日），给法国共产党人的活动新的推动。共产党呼吁发展群众性的武装斗争，为此创建了“法国义勇军与游击队”^②。

共产党人的爱国主义从烈士的遗言中得到了体现。“我即将为法兰西的生存而献身。”（G·贝里语）“我将向刽子手表明，共产党人能够从容就义，做一名爱国者和革命者。”（P·塞马尔语）

共产党人是一支重要的抵抗力量，但直到1943年还同其他抵抗力量保持距离。有两个事件促进了它们之间的团结：

① 这份呼吁书是由杜克洛起草，由多列士和杜克洛共同签署的。

② 法国义勇军与游击队的首批干部来自“特别组织”，这是法国共产党于1940年秋天为保护党的宣传员和开始收集武器而创立的一个武装集团。

一是1942年11月共产党同“自由法国”建立了联系；二是共产国际解散（1943年6月），因为在完成“其领导组建各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之后，共产国际已经变成了“阻止这些共产党发展成为本国民族共产党的障碍”。1943年5月27日，共产党参加建立了国内抵抗斗争的统一组织“全国抵抗委员会”；而且经过许多争执、周折，有两名共产党人参加了由戴高乐将军领导的政府“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这在党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即使抵抗斗争组织内部的意见分歧“远未超过共同的斗争”，但也继续存在，直至法国解放为止。这里“既有方法上的对立，也有力量影响方面的斗争”（J·福韦语）。针对有人把抵抗斗争看作是精英们积蓄力量，保存实力，以便将来充当盟军帮手的看法，共产党鼓吹有必要在全国进行一次起义，而现时应通过开展多种多样的斗争，示威游行、罢工、破坏、暗害和武装斗争来做准备。这种主张在很大程度上取得成功。

工人国际法国支部的复活

工人国际法国支部象是一片废墟。不少地方领导人和议员继P·富尔之后，向贝当政府提供左翼的支持。但有些领导人（勒巴，泰克西埃，梅耶）却拒不屈膝投降。

社会党的抵抗者们散落在不同的运动组织之中，其中有他们推动的组织（诺尔省解放组织，义勇军组织）。为什么这样分散呢？党的骨干力量遭到了严重破坏，无法实现战略上的统一，那些想要有所作为的活动分子便采取了个人的主动行动；甚至有些人（布罗索莱特，P·布洛什）认为各政党业已破产，就设法在新力量的基础上调整政治步伐。

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在莱·勃鲁姆（1942年2月至4月期间，审判里翁案的前后）的启迪下，在达尼埃尔·梅耶的切实领导下，慢慢地恢复了党的组织结构。经过一个艰难的接触阶段，1941年6月22日（即希特勒侵略苏联的当天），在图卢兹举行了会议，创建了“南方地区社会主义行动委员会”，该委员会于1942年出版了《人民报》。此后，社会党最终重建起来，但它毕竟姗姗来迟了。1943年6月，由达·梅耶领导的9人执委会掌管了两个地区的两个委员会，而每个地区各有一个委员会。社会党复活了，但大多数党员都始终分散在各个抵抗运动组织之中，因而，使党变为一个干部党。这个干部党在政治思想上对抵抗斗争产生了强大的影响，但作为政党来说，它在抵抗斗争中只起到小党的作用。

社会党，尤其是勃鲁姆本人，为法国国内的抵抗斗争参加戴高乐将军领导的临时政府作出了重大的贡献。社会主义行动委员会公开宣布自己是戴派。“我们追随戴高乐将军……我们并不问将军是否社会党人。”该委员会的作用，就是“是组织抵抗斗争和争取斗争的胜利。不管人们愿意与否，抵抗斗争和斗争的胜利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必要条件……既然戴高乐主义如此，我们就是戴派。我们是今日戴派，因为我们永远是社会党人。”

社会党把“日常斗争的军事方面”拱手交给抵抗运动，而“将其主要的思想工作用于制定一整套旨在创立第四共和国并使第四共和国正常运转的计划和纲领”（H·米歇尔语）。

因此，“解放后时期”变成了一个重大的问题。勃鲁姆在致戴高乐将军的信件（1943年3月15日）中，强调了下述事实：“假如不存在政党，那么，民主国家……是无法存在

的，甚至是不堪设想的。”对此，可以有两种绝不矛盾的解释：勃鲁姆是打算告诫一下蔑视政党的戴高乐，还是迎合戴高乐将军的意愿：限制国内的抵抗斗争的发展，限制那些反对抵抗运动的政党，拒绝把政治组织的垄断权拱手送给法国共产党呢？

由R·布尔德隆提出的一个假设很能说明问题：社会党可能是戴高乐派重建国家机器的主要支柱，而这次重建最大限度地把来自抵抗斗争的大量干部，特别是共产党人干部从领导岗位上清除下来。

H·米歇尔在其关于抵抗斗争时期社会党人的论著的最后一节，把1936年和1944年加以比较，得出了下述结论：

“社会党可能从理论上启迪过这些从抵抗斗争中诞生并且被召唤上台的政治力量；但它不再是这些政治力量的动力。难道共产党没有变成这个动力吗？”

第十一章 从第四共和国到 第五共和国

法国解放后出现的高潮（1944—1947年）

统治集团在1940年遭到的破产，一个走出漫长隧道的民族对复兴的强烈愿望，抵抗运动的深得民心，由战争和德国占领造成的在物质和道德方面的灾难，所有这一切都说明了在法国解放的第二天共产党和社会党何以象鲜花一样盛开。另一方面，这种鲜花盛开的局面是由两党相互接近促成的。兄弟般的战斗情谊消除了过去的意见分歧，也消除了已往积累下来的不信任 and 不满情绪。甚至出现了令人眼花缭乱的两党“复婚”的希望。1944年12月，共产党和工人国际法国支部本着“在两党之间建立一种理解和诚挚的气氛”的意愿，成立了一个谅解委员会，其使命之一就是探索两党走向组织统一的道路。

社会党在1944至1945年期间，本来是可以成为“时代的主人翁”的（莱·勃鲁姆语）。这是否意味着当时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已渐成熟？当然不是。由于英美两国在法国驻兵，戴高乐将军拥有深孚众望的巨大资本，中间阶级对社会党持敌视态度这些原因，使任何革命的尝试都是注定要失败的。此外也不应忘记，（从1943年起）过早而迅速地重建了一架戴高乐派的国家机器，而社会党与之积极合作（垄断其内政部，直至1947年）。

法国一解放，共产党和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就立即面临一个适应局势变化的严重问题。出于重建党组织和重新树立党的形象的考虑，工人国际法国支部清除了党内的妥协分子，并十分关注党的学说、纲领和战略的问题。法国共产党则面临恢复党的合法地位和担心力量对比不明朗、不稳定的问题。虽然法国共产党很快就明确制定了党的战略路线（在工人阶级周围建立民族团结，以实现法国的复兴、独立和革新民主），但是，有关可能出现的“双重权力”的幻想却持续了一段时间，在某些地区尤其如此；人们对那些从抵抗斗争中延续下来的组织和斗争形式所能够发挥和必须发挥的作用也认识不清。然而，到了1944年底和1945年初，法国共产党坚决驱散了革命的幻想并选择了民主的道路。党同意解散爱国的民兵组织（民兵曾一度代理过警察），支持新的共和国法制，便是一个证明。而莫·多列士的回国对此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法国共产党和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参加了戴高乐将军领导的政府，直至1946年1月。两党为实施“全国抵抗斗争委员会”在地下斗争中制定的纲领而斗争，该纲领规定主要通过“排除大的经济和金融垄断势力”和“将国有化的大生产资料重新收归国有”，来“建立最广泛的民主”，建立“真正的经济和社会民主”。该纲领比人民阵线的纲领更加全面，更加大胆，但它既不是“社会主义”的纲领，也不是施政纲领。它宣布了几项重大的原则和确定了一些方针，这些原则和方针促使新生的第四共和国在经济和社会方面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对许多部门（采煤，煤气，电力，航天工厂，雷诺汽车厂，民航，储蓄银行，保险公司）实行国有化，开始由工人对企业管理实行监督（建立企业委员会），并实行社会保

险。

由于抵抗斗争业绩赢得的光荣，由于受到统一带来的成效，共产党和工人国际法国支部产生了强大的魅力。在1945年10月举行的议会选举中，这两个自称马克思主义的政党第一次在法国获得了绝对多数的议席。要求加入两党的人们蜂拥而来，即使在人民阵线胜利的那些日子里也从未见过这样的盛况^①。但同战前相比较，左翼内部的力量均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法国共产党在抵抗斗争中发挥的更为重要的作用，苏联在战胜希特勒德国中发挥的重要作用，这些都使共产党成为法国的第一大党。1945年10月，共产党获得了500万张选票，相当于表态选票总数的26%。共产党也首次显示其影响，并在工会运动中占有了优势。力量对比的变动使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内隐藏着的反共成见和恐惧感死灰复燃。为了抵消共产党这种日益增长的重要性，勃鲁姆鼓吹实行法国式的工党主义，使社会党和非共产党的抵抗运动组成了一个广泛的联盟。该计划流产了，但勃鲁姆却成功地使1945年8月召开的社会党全国代表大会摒弃了同法国共产党联姻的意图（是否臆想？）。作为中期计划，勃鲁姆并未放弃其工党的大计划，难道这不是社会党同“人民共和运动”建立特殊联盟的历史背景之一吗？在1945年10月议会选举之后，虽然两党在议会

①

	1937年	1946年
法国共产党	29.1万党员	80.4万党员
工人国际法国支部	28 万党员	35.3万党员
共 计	57.1万党员	115.7万党员

中组成了多数派，但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却拒绝同法国共产党举行支持政府的单独密谈，并强行建立了一个包括人民共和运动在内的三党政府。

这里，我们无法全面考察一个短暂而错综复杂的时期的演变情况，国内国际力量对比的变化，由此而来的策略变化，实践和理论之间的差距，制定方针、口号同理解和实行方针、口号之间的差距等……因此，我们不妨举例，简要谈一下重建法国这个关键问题。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处于执政党的地位，所以在其重建药方中提出了美国的经济和财政援助（即依赖），提高生产效率，反对通货膨胀（勃鲁姆指责工资和物价之间的“恶性循环”）等方法。法国共产党则出于维护民族独立的考虑，倡导打一场“生产战役”（加紧使用现有机器，甚至加紧使用过时的和破旧的机器），并把生产同争取权利联系起来。然而，接踵而来的消极因素（破坏，匮乏，黑市和通货膨胀）是如此严重，以致共产党难于抓住这场斗争锁链上的两个环节，感到越来越难于使人们理解和执行其“一切为了生产”的口号。

战争和战后初期使法国的经济、社会、政治和思想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对于共产党和工人国际法国支部的学说产生了影响。

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党内贯串着两个不同的派别。莱·勃鲁姆在1945年就发动了一次“修正主义”的进攻。他坚决反对唯物辩证法同时作为世界观和认识论。他用抽掉阶级斗争内容的、人道的社会主义来取代历史唯物主义。这个新饶勒斯派遭到新盖德派的抵制。在1946年7月的全国代表大会上，居伊·摩勒使一项动议得到了胜利，该动议谴责“任何修正主义的尝试，特别是谴责那种由虚伪的人道主义——其真

实目的在于掩盖阶级斗争这一基本现实——所启示的尝试。”他还指出了理论学习必须遵循的方向：“要丰富马克思主义，……不要用隐晦的、返回到空想社会主义的做法来淡化马克思主义。”可是，这个社会党的“左翼”被证明是不能“丰富马克思主义”，不能剖析社会和近代世界，因而不能“使党的思考、战略和策略得到更新”的。

在法国解放的翌日，法国共产党在理论上深化了对经济、国家、民主、社会主义过渡道路等基本问题的思考，但这种深化并未同党“进行新的大胆实践”（党第一次参加了“资产阶级”政府，并且给了资本主义的结构改革很大的鼓舞）相适应。不适应的原因是错综复杂的，其中有纳粹（尤其是政治警察）对知识分子干部的屠杀，法国工人运动对理论的长期轻视，在法国宣传的马克思主义被打上的18世纪合理主义那种唯物主义甚于辩证法的烙印，斯大林施加的重大影响等。但是，当共产党作为1946年11月议会选举的胜利者，请求由多列士来担任政府首脑的时候，多列士本人在答《泰晤士报》记者问中，开辟了一个崭新的前景。“民主在世界上取得的进步……使人们考虑到在向社会主义进军的问题上，除了俄国共产党人走过的道路以外，还有别的道路。不管怎样，对于每个国家来说，社会主义的道路是必定不同的。”在富有民主传统的法兰西，民主作为持续不断的创造，使在避免武装冲突的情况下实现社会主义成为可能。然而，这个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的新观念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遭到了非常不利的反应，因为共产主义运动仍然忠于列宁关于国内战争不可避免的教导。因此，法国共产党将多列士的论断塞进抽屉深处长达10年之久，直至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

共产党和工人国际法国支部之间的“蜜月”持续不长。国际气候的恶化加剧了两党之间的不和。首先是印度支那战争，无论是“无知或上当受骗”，以莱·勃鲁姆为首的清一色的社会党政府都让印度支那战争“在1946年底爆发”（T·富韦语）；其次，主要是“冷战”时期的开始，盟友戏剧性地变为敌人，建立了对抗性的集团。

不和、争执与低潮（1947—1962年）

两党的离异——确切地说，两党的离弃——始于1947年5月社会党人、保尔·拉马迪埃总理罢免共产党部长之时。这种决裂甚于公开提出的理由^①，根据J·福韦的说法，是“一次总危机的反映”，因为他把共产党的部长在比利时（3月19日）、在法国（5月5日）、在意大利（5月13日）几乎同时被逐出政府一事同杜鲁门总统1947年3月12日的著名讲话加以对照。杜鲁门说：“美国的政策应当是帮助各国人民抵制那种控制的试图。”

从此，共产党和工人国际法国支部把党的政策建立在各自对国际形势截然不同的分析之上。

法国共产党对国际形势的分析借鉴了日丹诺夫的报告^②，对共产党来说，世界的政治地图出现了两个板块。美帝国主义处心积虑，想要建立其世界霸权，由美帝领导的“帝国主义阵营”正在准备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来消灭社

① 在雷诺工厂爆发一次大罢工之后，共产党的部长拒绝投政府的信任票，公开表示不赞成政府的经济和社会政策。

② 指1947年9月日丹诺夫以苏联共产党的名义，在建立共产党与工人党情报局这个欧洲主要共产党之间的联络机构时所作的报告。在苏共召开二十大之后，共产党与工人党情报局于1956年4月被解散。

会主义和民主。与此相反，由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的民主阵营”，担负着“同新战争和帝国主义扩张的威胁进行斗争”的使命。从这些分析出发，共产党声明自己要承担两项内容一致的基本任务：

1. 维护和平。和平正处于“千钧一发”之际，因此已经成为“决定性的问题”。由于世界力量对比的变化，战争已不再是“不可避免”。和平力量的行动能够制止战争，只有和平力量的行动才能制止战争。

2. 坚定不移地高举民族独立的旗帜。法国共产党进行了一场坚决反对“向美帝屈服的政策”的斗争，激烈地揭露那个由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充当“激进派”的“美国党”。

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则认为，世界的和平与自由正在受到“俄国帝国主义”的威胁。在这场必不可少的反共斗争中，社会党必须到第一线去开展斗争，而且正在第一线进行斗争。正当“共产主义同资本主义的表面冲突继续占据政治舞台中心时，……，真正的国际冲突则是社会主义同共产主义的冲突”（莱·勃鲁姆语）。从这些前提出发，产生了下述几个结果：

1. 工人国际法国支部摒弃了中立主义，无保留地在美国领导的大西洋公约上面签了字。

2. 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希望在美国和苏联两“大国”之间，建立起非中立的、独立的“第三种国际力量”：欧洲合众国^①！

^① “全党都支持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欧洲’，但也知道，建设中的欧洲不可能是社会主义的欧洲，所以大家都闭上了眼睛”（G·拉沃语）。但是，当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必须解决一个根本问题，即德国军队同欧洲军队（欧洲防务体系）一体化问题时，党内发生了分裂。（1954年）选举时，虽然通过了投票的纪律原则，但该党议会党团分裂成几乎势均力敌的两个部分：50名“造反派”投票反对草案，53名投票赞成草案。

3. 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发明了从社会主义者到右翼温和派的“第三力量”这个政府用语。第三力量旨在抵制共产主义和戴高乐主义的双重进攻。

4. 世界的经济和政治局势动荡不安，促使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党内出现一股修正主义的新浪潮，这股新浪潮在哲学、经济和政治等各条战线上都取得可观的进展。

非殖民化成为共产党和社会党之间时而和解，时而斗争的一个阵地。

诚然，工人国际法国支部不是象共产党那样，一直走到要求殖民地人民拥有民族独立的权利，揭露“肮脏”的印度支那战争和阿尔及利亚战争的地步。但它对民族独立运动表现了豁达的态度，主张就印度支那问题和阿尔及利亚问题举行谈判，并起来反对右翼的“拚到底主义”。在孟戴斯-弗朗斯内阁(1954年)和居伊·摩勒内阁初期(1956年)^①，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和共产党的议会党团在投票时，将两党的表决票混合在一起。不过，在殖民地问题上，“除了通过传统的‘代表大会动议’之外”，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并不力图使其观点占上风”(D·利古语)。它让印度支那战争持续下去，直至奠边府战役为止。而居伊·摩勒政府最后在阿尔及利亚侨民的压力下作出了让步。

继1944年至1946年期间出现的高潮之后，迎来了一个漫长的低潮时期。从1946年至1958年期间，工人国际法国支部的党员丧失了三分之二，共产党的党员则丧失了一半以上。

^① 孟戴斯-弗朗斯政府通过日内瓦协议，停止了印度支那战争。在1956年1月进行的竞选运动中，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反对“愚蠢的无出路”的阿尔及利亚战争，主张同阿尔及利亚民族阵线开始谈判。

从1946年11月到1956年1月期间，两党的选举率有了明显的下降^①。

两党力量的同时下降有其共同原因，也有其特殊原因。

展望未来，似乎无路可走。工人的分裂，即在共产党同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实行决裂后不久发生的分裂^②，使工人阶级迷失了方向，丧失了士气，不得不向后撤退。这是一种长期的、无疑是井然有序的后退，但在后退的道路上留下了许许多多掉队者、变节者，尤其是那些当初因胜利冲昏了头脑而入党的人。

共产党在一种非常不利、甚至充满敌对情绪的环境中，生活了长达10年多之久。一方面，反共浪潮大肆泛滥。这股浪潮作为冷战和国际共运严重困难的结果，又被国内外反共势力用来推波助澜。另一方面，在阿尔及利亚战争时期，殖民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浪潮在包括工人阶级在内的人民大众中大肆泛滥。这股浪潮削弱了共产党的抵抗能力，并倾向于把共产党孤立起来。这样，共产党就遭到了削弱，因而对于党的领导机构在1950至1954年期间遭受的不幸应付得不那么卓有成效。多列士患脑溢血，远离党的领导机构将近3年，多列士的代理人杜克洛遭到逮捕，其他两名党的书记A·马尔蒂和A·勒克尔则被开除出党。

工人国际法国支部深受其言词和诺言与其行动脱节之苦。它也深受权力的耗损之苦，尤其是因为1947年至1951年期间，“第三力量”统治着法国，从而迫使它“在历届中右

① 参阅附件一——译注。

② 有个名叫“工人力量联合会”的派别脱离了法国总工会（1947年12月），并组成了联合会（1948年4月）。但与战前相反，这个同情社会党的改良派是工会运动的少数派。

内阁里处于左翼人质的不利地位”（D·利古语）。不管愿意不愿意，它执行“别人的政策”（J·鲁斯语），容忍社会上墨守成规的保守主义，并放弃其宽容非殖民化的观点。由于“第三力量”的重心缓慢而持久地滑向右翼，导致了打破平衡。1951年，左翼（特别是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在选举中遭到失败，此后，右翼从法国解放以来首次承担领导内阁的责任（比内）。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反对新多数派奉行的经济、社会和反世俗的政策，在长达5年的时间里处于对自己十分不利的反对党地位。从1952年起，党员人数稳定；党在1956年选举中取得的成果为1951年失败雪耻。不过，这种青春焕发的美景不长。居伊·摩勒政府奉行的政策（继续阿尔及利亚战争，远征苏伊士运河），导致党内形成并发展了一个“左”的反对派。

第五共和国的上台，在共产党和工人国际法国支部之间造成了新的严重裂痕，并在两党中引起了一场危机。

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向戴高乐将军提供了保证和支持。但工人国际法国支部的左翼却在1958年9月脱党，组成了后来在1960年4月成立的“统一社会党”的核心力量。共产党在1958年是唯一反对戴高乐派的党，所以遭到一部分选民的抛弃。

然而，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很快同戴高乐派拉开了距离。在短期内充当一个“有建设性的反对党”之后，它最后到了普遍不满的地步。此外，虽然有人竭力要孤立和窒息共产党，但共产党却取得了成功，保持了党对许多群众，特别是对工人群众的影响。法国共产党同意大利共产党一样，依然是西方国家中最强大的共产党，并且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

难于驱除的魔鬼（1962—1965年）

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坚持把希望寄托在反戴高乐主义的、反共的、将各种不满情绪汇集拢来并叫共产党蛰居其地盘上的“第三力量”身上。它力图同激进党、基督教民主党和传统右翼的残余建立一个没有纲领和原则的“拒绝阵线”：“阿尔马的晚餐”（1962年1月）和反对1962年10月公民投票的竞选联盟。在1965年总统选举之前举行了一次新的盛大检阅：由X先生——在此情况下，即加斯东·德费尔——出面有组织地参加竞选，充当了新的中间派联盟“社会民主大联盟”的基石，但这项计划变成了一个死婴。于是在其废墟上产生了一个“小联盟”——支持密特朗参加竞选的“社会民主左翼联盟”。人们改变了航向，不管怎样，这种改变是由社会党选民的日益不满和共产党的转变而造成和促成的。

法国共产党走上“非斯大林化”的道路，是迟缓和犹豫之举。历史的包袱，理论上的某种僵化，是不会轻易消失的。在1961年5月的代表大会上，共产党自我肯定了这样一个主导思想：有可能和有必要同其他民主力量一道进行合作，以便打倒戴高乐政权，革新民主政体，沿着法兰西特有的道路——放弃苏联的“模式”，确认多党制——走向社会主义。在1962年公民投票中，针对工人国际法国支部拒绝联合的态度，共产党提出了“让我们肩并肩前进，共同战斗吧！”的口号。从1963年10月起，共产党优先考虑在共同施政纲领的基础上建立左翼联盟^①，作为第一个统一的大步骤，共产党在1965年12月总统选举中，在第一轮选举中支持弗·密特朗当候选

^① 这种思想在1959年（党的二十五大）表达得很含蓄，当时没有引起反响。

人，使得密特朗获得32.2%的选票，拥护戴高乐将军的选票不过半数，并在第二轮选举中使密特朗的选票超过了1000万张（占总选票数的45.5%）。

开始出现了统一的势头（1965—1967年）

法国共产党终于从长期教条主义的昏睡中苏醒过来，开始进行了对话和思想交锋，加深了党对本国实际和社会现实的分析。1965年出版了三部有代表性的著作：加罗迪的《从革出教门到对话》（重新实行向天主教徒“伸手”的政策），阿尔都塞的《为了马克思》和《读〈资本论〉》。1966年3月，共产党在阿尔让特伊召开了中央委员会会议，探讨了文化和文艺创作的问题，并以新的语言提出了知识分子和工人阶级联盟的问题；同年5月，在索瓦齐-勒-鲁瓦的“活动日”里，深化了对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研究。马克思主义在运动之中。

1966年12月，社会民主左翼联盟同法国共产党进行了讨论，讨论结束后列了一份包括共同点和不同点在内的单子。这如同大门一样，朝着“戴高乐主义以后”的时代半开着，从而加强了统一的潮流。在1967年3月的议会选举中，左翼（共产党，统一社会党，社会民主左翼联盟）在第一轮投票中取得了进展。由于候选人和选民严格的纪律性（前者的纪律性比1936年选举时要强得多），三个组织当选议员的人数有了明显的增长：法国共产党获73席（增加32席），统一社会党获4席（增加3席），社会民主左翼联盟获116席（增加25席）。

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和法国共产党的 基层组织情况

战争使两党的政治地图发生了变化。

在工人国际法国支部的选举地图上，法国北部的工业地区和中部的农村地区党的力量出现了衰退，变得对共产党有利。但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在诺尔、加莱海峡、埃纳、阿登、上维恩和科雷兹等省，仍然保持着牢固的根据地。反之，它在法国西南部取得进展，对激进党特别不利。它同共产党争夺南方地中海沿岸地区（马赛和朗格多克）。

共产党在法国解放的第二天，就获得了在各省扎根的成功。不过，有三大地区是彼此隔开的，即法国北部的工业地区（从法国比利时边界直至巴黎地区），中央高原的北部和西部低地地区（谢尔，阿利埃，克勒兹和科雷兹），法国南部的普罗旺斯和罗纳河地区（加尔，勒纳河口和瓦尔）。

共产党的选民虽然在1958年有了很大的下降（5个选民中有1人抛弃了共产党），但他们看来最忠诚，最坚定不移^①。共产党和工人国际法国支部的选民都是以男性选民、青年和就业人员为主体^②。工人组成了左翼选民的主力军，在共产党和社会党的选票中各占一半左右和1/3强。共产党的基本力量处在工人群众非常密集的地区和城市，而社会党90%的选票来自人口不到10万的地方。共产党选民和社会党选民具有较高的平均生活水平。工人中最贫苦的阶层（除了法国北部经常投社会党票的纺织工人之外）看来远不如熟练工人那样容易接受共产党和社会党的影响。冶金工人支持共产党，公用服务部门（法国电力公司，法国国营铁路公司）和国有化工业部门的工人既支持共产党，也支持工人国际法

① 参阅附件有关1945年至1978年期间议会选举中的选票和得票率演变情况。

② 根据法国民意测验所1965年的民意测验结果与法国民意测验调查所1973年和1978年的调查结果。

国支部。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和共产党对职员、公务员和中层干部施加了较大的影响（在程度上，后者不如前者）。农民——农业工人，扩而广之，在那些传统上投左翼票的地区（法国中部，南部）的小农经营者——则分别占共产党选民的8%^①和社会党选民的15%。

党员的成份结构同选民的成份结构看来没有什么不同。在工人国际法国支部的队伍中，35%的党员是工人（其中公用服务部门的工人将近1/3）；14.2%是公务员，12.8%是退休工人，12.4%是手工业者和小商贩，8%是职员，7.4%是农业耕作者，2.6%是自由职业者，9%是无业人员（尤其是无业的妇女）^②。共产党则具有更加突出的无产阶级特点^③。那些就业的共产党员的社会职业分布情况是很能说明问题的。

工人党员占60.10%：

在私营工业部门中占43.4%

在公用服务部门中占13.5%

在农业部门中占3.2%

职员党员占18.57%：

在私营工业部门中占8.12%

在公用服务部门中占10.45%

知识分子党员占9%：

① 共产党在农村地区，在北滨海、克勒兹、上维思等省取得了最可观的进展，看来这同战时存在强大的游击队有关。

② 根据P·兰贝尔对14500多名党员进行的民意测验结果。

③ 根据共产党1966年所作的调查，调查结果在党的勒伐罗瓦第十八次代表大会（1967年1月）上作了通报。在将近19000个支部中，有17327个支部收到并填写了调查表。

教员和研究人员占4.85%

工程师和技术员占1.93%

农业经营者党员占6.56%

商贩和手工业者党员占5.77%

共产党和工人国际法国支部之间最明显的不同，无疑是党的领导机构的不同。随着人们在等级制的金字塔上攀登，工人的比例在共产党内上升，但在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党内却急剧下降。在社会党的指导委员会和议会党团内部，工人只占极少数。

1968年5、6月间的火热斗争周

1968年2月24日，法国共产党同社会民主左翼联盟发表的共同声明记载了它们之间的共同点^①。由左翼展示的这一前景部分地说明了1968年5月事件的爆发原因，但这次爆发却使这种脆弱的一致化为乌有。

烈火在大学里燃烧起来。对大学的旧体制和教学方法的不满，政府进行的镇压，“左倾分子”的思想（无政府主义这面黑旗以及托洛茨基主义的复活，格瓦拉主义和毛主义的传播），所有这一切都导致暴力浪潮的发生。

在工厂酝酿着的火焰，很快就蔓延开来，变成了熊熊大火。800万和900万雇佣劳动者同时停工，使经济瘫痪数周，并且占领了许多工厂，这在法国还是第一次。这些工人斗争获得的成果就其重要性而言，仅次于1936年和解放翌日取得

^① 两家的分歧则涉及到有关宪法、国有化和国际政策（大西洋公约，共同市场）等问题。

的胜利。

“左倾分子”象在1930年6月，象在1944—1945年那样断言说，“一切都有可能办到”，革命的条件业已成熟；他们还指责政党和工会（共产党，社会民主左翼联盟，法国总工会）的“机构”背叛了这场革命。

共产党和法国总工会的整个战略建立在与左倾分子截然不同的下述分析上面：认为和断言革命形势到来，实际上是散布幻想，这个幻想十分危险，尤其是因为它会导致流血事件。

数以千百万计的罢工者（其中只有少数人去占厂），是否铁板一块呢？他们是否所有的人都赞同社会主义革命的观念，并且准备拿起武器，为社会主义革命而战斗呢？或者只是少数人这样去做呢？他们用什么武器进行战斗？在哪个参谋部的指挥下战斗？至于权力，是否处于空缺状态，或者甚至已经瓦解？诚然，政府陷于混乱状态，被迫转入守势，但是，难道它不准备军队和警察部队的支持下进行反攻吗？全国各地支持政府的人一时蒙头转向，但是，难道他们的力量不是因为害怕无政府主义，害怕动乱，害怕爆发内战而得到加强了吗？

1968年6月23日至6月30日举行了议会选举，选举结果是左翼遭到失败，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左翼联盟在选票和得票率方面明显下降。

从短期来看，在危机结束时，左翼的力量削弱了，变得更加四分五裂了。共产党同社会民主左翼联盟的关系疏远了。社会民主左翼联盟本身土崩瓦解了。共产党还遭到苏联占领捷克斯洛伐克的影响，虽然它对此明确表示不赞成。

1968年5月事件，是否是“加速资本主义集中阶段的第一

次大对抗，一次处于一系列矛盾之中，而整个资本主义制度被卷入矛盾而又无法解决矛盾的对抗呢？”（弗拉松语）是的，但在这次对抗中，人们痛心疾首地感到没有一个牢固的反垄断资本的联盟与之抗衡。

第十二章 左翼联盟

共产党和社会党的演变

左翼联盟既是共产党和社会党演变的动力，又是这种演变的产物。

在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尚巴涅宣言(1968年12月)中，党更加深入地探索和研究了向社会主义民主过渡和民主社会主义这两个相辅相成的概念。党在1971年6月，（甚至在总危机爆发之前）就已经发现了资本主义结构性的总危机，这场总危机影响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其中包括国家和意识形态方面），并且威胁到资本主义制度的永恒性。为了“改变航向”^①，党大步前进和大施压力，争取社会党人同意在共同纲领的基础上建立左翼联盟。

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在1969年总统选举中降到了最低点（德费尔获得5%的选票）。社会党人认识到，同中间派的联盟使“社会党衰败到死亡的边缘”（皮埃尔·莫鲁瓦语），所以同法国共产党恢复了对话，并对党实行了革新。在埃皮纳代表大会（1971年6月）上，前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和共和体制大会党进行了合并，由此产生了新的缩写名字（社会党），大批新党员入党，领导人更新（弗朗索瓦·密特朗当选为党的总书记），党向生机勃勃的群众更加开放，对社会

^① 《改变航向》是法国共产党于1971年10月通过的党纲的题目。

主义的选择更加明确（1972年3月通过党纲《改变生活》），并改变了战略（左翼联盟）。

左翼联盟

1972年6月27日，在法国政治生活中发生了一个史无前例的事件：法国共产党和社会党签署了共同施政纲领。这一天也许是“从图尔代表大会以来，对左翼来说最重要”（福韦语）的历史性日子。虽然这个积极的施政纲领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纲领，但它想要展示一个为“美好生活，改变生活”而革新民主的前景。

左翼联盟符合人们对变革的深刻愿望和对团结一致的渴望，因而取得了重大的成功。在1973年议会选举中，左翼联盟取得了进展，但那时进展还不大；在1974年5月的总统选举中，密特朗作为左翼的唯一候选人，在第二轮选举中接近了多数（49.2%），选票超过了1300万张。这些进展在大区选举和市镇选举（先后于1976年3月和1977年3月举行）中得到了证实。

看来从左翼联盟中得利的主要是社会党。党壮大了队伍。在召开“争取社会主义”会议之际（1974年秋天），许多往往信仰天主教的工人、知识分子中的活动分子离开了统一社会党或法国民主工联，参加了社会党。这种组织上的充实，对摩勒主义的摒弃，“伟大的联合者”密特朗的人品，改良主义对一些虽有不满情绪、但尚未达到革命觉悟的社会阶层所具有的吸引力等，所有这些因素说明了社会党何以夺回了它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在选举方面失去的领先地位。可是，社会党是一个成份很不协调的党：在工人国际法国支部这个本身就非常混杂的旧基础上，堆积起了一些态度变得

激进起来的沉积物（“共和体制大会党”），一些革命的冲积物（“学习、研究与社会主义教育中心”）和自治管理的冲积物。

法国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

二十二大（1976年2月）看来是“法国共产党和工人运动历史上一个决定性的事件，一个极其重要的‘转折点’”（阿尔都塞语）。当然，这个“转折点”早在1976年之前就已经开始，但它远远没有结束。

作为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件，法共二十二大明确地制定了民主的道路，把它看作在国际（和平共处）和国内（法兰西民主结构）局势下有可能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唯一战略。这是一条前人尚未走过的道路：大多数（尽可能最多的）人民群众正在一步一步地攀登（但他们还准备着走回头路），走向“一个日益民主、权力下放、自治管理的社会，一个为劳动人民而建立、并且由劳动人民亲自建立的社会”^①，这个社会会通向“法国色彩的社会主义”，即多元化的、在政治、思想、宗教诸方面尊重多样性的社会主义。

欧洲共产主义^②是一个十分时髦的字眼。应当怎样看待欧洲共产主义一词呢？该词具有模棱两可，不够确切，因而不大科学的特点。诚然，好几个欧洲共产党（不仅是南欧的共产党）遵循着同样的大方向：在对待社会主义国家的判断和行动上保持独立性，特别是批评其对自由的损害；选择一条和平地民主地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这种选择应同时建立在广泛

^① 法国共产党1977年11月7日致工会的声明（1977年11月8日《人道报》）。

^② 欧洲共产主义一词在1975年和1976年之交的冬天出现，在1977年3月卡里略、贝林格和马歇举行的马德里会晤之后曾风靡一时。

联盟和实行普选制之上，建立在坦诚地接受多元化和替代之上。然而，由于各党的民族特点，这些对共同问题所作的趋于一致的回答，已被证明是多种多样的，它们并不涉及各党的模式、组织关系、理论统一与协调一致的政治战略。

采用欧洲共产主义这种革命的新战略（它是否同革命的新纪元相适应呢？），从理论上提出了一些根本问题，而这些问题的重要性，法国共产党一开始是很不理解的。因此，无疑，法国共产党是在事先未作足够的理论思考的情况下，突然放弃无产阶级专政这个观念的。

左翼联盟的危机和挫折

在度完1974年5月总统选举的蜜月之后，三口之家（法国共产党，社会党，左翼激进派运动）发生了争吵、和解与决裂。

在1978年3月的议会选举中，左翼在第一轮投票中赢得了微弱多数，但在第二轮中却遭到了挫折。群众中对选举的胜利抱有希望，所以受挫后出现了失望、慌乱和痛苦的情绪。从法国解放以来，法国共产党（得票率为20.5%）第一次被社会党（22.5%）超过，而社会党的选举结果与其希望（30.0%以上）相距颇远。

对此，即使我们不冒充纸上谈兵的战略家，不充当检察官或法官，难道我们也不能提出一系列解释吗？

在提出左翼政党应承担何种“责任”这个往往被人歪曲的问题之前，让我们确定其活动范围，即其客观条件^①：

1. 统治阶级的战略：（在新闻媒介的帮助下）用粗野的

^① 诚然，这并不意味着左翼政党不能对这些客观条件施加影响。

和精明的反共主义，孤立和削弱法国共产党；在法国创造英国式替代或德国式替代的条件。

2. 1974年爆发了社会的结构性危机，危机非常严重，其后果就是要使在生产增长率高和失业率低的阶段里构思出来的共同纲领“重新适应新的需要”。

3. 改良主义的思想大量地渗入人民群众，使他们能够受到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的宣传（在连续性中进行变革）或社会党的宣传的吸引，受到害怕深刻变革的情绪的感染，从而使拒绝政府政策的成效有限。

4. 社会主义国家赋予共产主义的形象（即使它有点遭到歪曲）。

在左翼联盟中出现“向右转”、“失败的战略”这种相互的指责，是过于简单的指控，因而是不实之词。我们首先要强调指出，时局出现了崭新而错综复杂的情况：正在战斗或者必须进行战斗的革命派既站在改良派一边，又反对改良派。这种既联合又斗争的战略犹如走钢丝一样。难道法国共产党在策略上没有犯过错误，在党的宣传和辩论中没有做过许多蠢事吗？共产党赞成密特朗在1965年和1974年总统选举中担任候选人，从而为密特朗树立左翼“联合者”、“领袖”的形象作出了贡献，这样做是否有理呢？密特朗在1974年总统选举的两轮选举之间几乎被人遗忘，后来，他在秋天恼羞成怒，在完美的和谐之后便是重大的冲突。

如同法国共产党不改变战略一样，社会党也不改变“向右转”的战略。因为到了最后，签署共同纲领的墨汁一干，密特朗就公开地（面对维也纳的社会党国际）、明确地制定了社会党的目标：蚕食和排挤法国共产党，使它变成一个配角。密特朗在总统选举的第二轮中进行的竞选运动，难道不

是一种“改良主义”的姿态和方式吗？不过，社会党主要是从1976年起感到党的发展一帆风顺，所以采用了一种越来越占主导地位的基调：召开南特代表大会（1977年6月），就重新执行共同纲领的问题举行谈判。于是，法国共产党承担了行动的重任：不让法国出现一个遥遥无期的社会民主主义的纪元。

这里，我们远离一般的“小店生意”和政党的“私利”。在深入分析的时候，人们发现实际上已经提出了一个葛兰西式的大问题：是指定哪个阶级来执行其领导权呢？从法国共产党公开放弃在法国使用暴力和强制手段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时刻起，工人阶级就必须承担在精神和道义上领导其所有可能的盟友的重担，还必须争取他们积极赞同和组织他们积极参预。在法国共产党看来，就要求党能够赢得一种“先锋”作用（不是把这种作用强加于人），并确立劳动者在工厂和城市自觉进行参预的具体形式。试问，这样的斗争果实已经成熟了吗？

附件一：

1945年至1978年期间议会选举结果①

时 间	法国共产党选票	工人国际法国支部选票
1945年10月	5005000张 (26%)	4600000张 (24%)
1946年6月	5199000张 (26.2%)	4188000张 (21.1%)
1946年11月	5489000张 (28.6%)	3432000张 (17.9%)
1951年6月	4910000张 (25.6%)	2744000张 (14.8%) •
1956年1月	5514000张 (25.6%)	3180000张 (15%)
1958年11月	3882000张 (18.9%)	3193000张 (15.5%)
1962年11月	4003000张 (21.8%)	2300000张 (12.7%)

• 此外还提出别的数字：2764000张，甚至2783000张。

时 间	法国共产党选票	统一社会党选票	民主社会左翼联盟选票
1967年3月	5039000张 (22.5%)	495000张 (2.2%)	4224000张 (18.9%)
1968年6月	4435000张 (20%)	874000张 (3.9%)	3654000张 (16.5%)

① 表内的百分比是指表态的选票而言。1936年，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及其联合竞选者获22.8%的选票，共产党获15.2%的选票。

时 间	法国共产党 选票	统一社会党和左倾 分子选票	民主社会左翼联盟 (社会党和左翼激进 党)选票
1973年3月	5063981张 (21.3%)	781876张 (3.3%)	4899965张 (21.3%)
1978年3月	5870402张 (20.5%)	953088张 (3.3%)	7055083张 (24.7%) 其中社会 党为6451151张, (22.6%)

附件二:

1978年议会选举情况①

	共 产 党 %	极 左 翼 %	社 会 党 和 命 运 革 命 %	左 翼 运 动 %	各 种 反 对 党 %	法 国 民 主 盟 联 %	保 卫 共 和 盟 %	部 分 多 数 派 和 部 分 右 翼 %
总 数 100%	21	3	25	3	21	22	5	
1. 性 别								
男	24	3	25	3	19	20	6	
女	19	2	25	3	22	24	5	
2. 年 龄								
18岁至24岁	28	9	25	4	17	15	2	
25岁至34岁	26	5	24	6	18	17	4	
35岁至49岁	19	3	25	3	20	24	6	
50岁至64岁	20	1	24	3	22	23	7	
65岁以上	15		25		27	28	5	
3. 家庭户主的职业								
农业耕作者	9	1	17	6	33	31	3	
小商贩, 手工业者	14		23	5	25	26	7	
高级干部, 自由职业者, 工业家, 大商人	9	5	15	4	27	30	10	
中层干部, 职员	18	6	29	5	14	20	8	
工 人	36	4	27	2	16	14	1	
无业者, 退休者	17		26	1	25	26	5	

续表

4. 家庭月收入							
每月低于2000法郎	22	3	26	2	22	20	5
每月2001—3000法郎	26	3	27	3	18	21	2
每月3001—5000法郎	25	3	28	2	18	19	5
每月5000法郎以上	18	4	20	3	23	24	10
5. 文化水平							
小学程度	24	1	26	2	21	22	4
中学程度	15	4	21	4	22	27	7
技校程度	27	5	26	2	14	21	5
大学程度	10	9	19	5	26	20	11
6. 宗 教							
经常遵守教规的天主教徒	2	1	13	4	39	31	10
偶然遵守教规的天主教徒	11		20	3	28	33	5
不遵守教规者	24	3	30	2	17	20	4
无宗教信仰者	49	6	29	4	4	6	2
<p>• “各反对党”包括生态学派运动、抉择运动、民主人士运动和反对党戴派运动候选人。</p>							

① 这是《新观察》杂志所作的民意测验，其结果在1978年4月23日至30日一期周刊上发表。

参 考 书 目

《巴贝夫和巴贝夫主义问题》，斯特哥尔摩国际讨论会，社会出版社1963年版。

J—P贝尔纳：《1921—1939年期间，法国共产党和文学问题》，法国大学出版社1972年版。

L—博丹、J·图夏尔：《1936年的人民阵线》，科兰出版社1972年版。

J·布律阿：《格拉许·巴贝夫和平等者》，贝兰学术书店1978年版。

J·布律阿：《欧仁·瓦尔兰》，法国联合书店1975年版。

J·布律阿、J·多特里、E·泰尔森：《1871年的巴黎公社》，社会出版社1960年版。

J—P布律阿：《共产党的早年时代（1920—1938年）》，法国大学出版社，1972年版。

V·达利纳：《格拉许·巴贝夫》，莫斯科，1976年版。

M·多芒热：《伟大的社会主义者爱德华·瓦扬（1840—1915年）》，圆桌出版社1956年版。

J·德罗兹：《民主社会主义（1864—1960年）》，科兰出版社1966年版。

G·迪珀：《人民阵线和1936年选举》，科兰出版社1959年版。

J·爱伦斯坦：《共产党》，格拉塞出版社1976年版。

J·福韦（同阿·迪阿梅尔合作）：《法国共产党史》，费亚尔出版社1965年版，1977年再版。

J·吉罗：《关于两次世界大战中间法国共产党的组织扎根情况》，社会出版社1977年版。

H·戈德贝尔：《让·饶勒斯》，费亚尔出版社1970年版。

F·布罗戴尔和E·拉布鲁斯主编的《法国经济和社会史》，法

国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第三卷和第四卷即将出版。

J·德罗兹主编的《社会主义通史》，四卷本，法国大学出版社1972年、1974年、1977年和1978年版。

《1920年以来的法国改良主义史》，社会出版社1976年版。

C·于尔蒂格：《从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到新的社会党》，科兰出版社1970年版。

J·朱：《1921—1926年，社会党重建史》，科兰出版社1976年版。

J·朱利亚：《费尔南·贝洛蒂埃和直接行动的工团主义之起源》，瑟伊出版社1971年版。

A·克里埃热尔：《1914—1920年，法国共产党之起源》，穆东出版社1964年版。

A·克里埃热尔和J.J贝克：《1914年，战争和法国工人运动》，科兰出版社1964年版。

J·拉库蒂尔：《莱昂·勃鲁姆》，瑟伊出版社1977年版。

G·勒弗朗：《1875—1940年，第三共和国时期的社会主义运动》，佩约出版社1963年版。

G·勒弗朗：《人民阵线史》，佩约出版社1965年版。

《1936—1937年期间的政府首脑莱昂·勃鲁姆》，讨论会文件，科兰出版社1967年版。

D·利古：《法国社会主义史（1871—1961年）》，法国大学出版社1962年版。

J·梅特隆：《法国的无政府主义运动》，两卷本，玛斯佩罗出版社1975年版。

J·梅特隆：《法国工人运动传记辞典》，工人出版社出版，已出十五卷。

C·马佐里克：《巴贝夫和为平等而密谋》，社会出版社1962年版。

M·佩罗：《工人的罢工斗争》，穆东出版社1973年版。

A·菲利普：《社会主义者》，瑟伊出版社1967年版。

J·波普朗：《法国的左翼，1958—1965年：新时代》，费亚尔出版社1972年版。

《第一国际》，1964年讨论会文件，全国科学研究中心，1968年版。

K·吉里奥：《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和行使权力（1944—1958年）》，费亚尔出版社1972年版。

N·拉西辛、J·博丹：《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间的法国共产党》，科兰出版社1972年版。

P·罗布里厄：《莫里斯·多列士的私生活和公共生活》，费亚尔出版社1975年版。

J·鲁热里：《1871年的自由巴黎》，瑟伊出版社1971年版。

K·蒂埃斯基：《1920—1972年期间，法国共产主义运动》，巴黎，1973年版。

J·图夏尔：《1900年以来的法国左翼》，瑟伊出版社1977年版。

K·特朗普：《1848—1914年期间，卡尔莫的矿山》，工人出版社1971年版。

J·瓦尔兰：《共青团员》，社会出版社1975年版。

C·维拉尔：《1893—1905年期间，法国的社会主义运动：盖德派》，社会出版社1965年版。

C·维拉尔：《从复兴时代到现代的社会主义》，法国大学出版社1971年版。

G·齐埃比拉：《1872—1934年期间，莱昂·勃鲁姆和社会党》，科兰出版社1968年版。

此外还可查阅两份专攻法国工人运动史的杂志：《社会运动》，《莫里斯·多列士研究所历史手册》的合订本。

译 后 记

克洛德·维拉尔先生所著的《法国社会主义简史》是一部短小精悍，但又博大精深的佳作。作为1990年的自修课题，《简史》的中译稿已在去年底完成。事隔半年多，为了出版再来写这篇译后记，不禁感慨良多，仿佛登上了座高山，心里既充满成功的喜悦，也倍感事业的艰辛。

维拉尔先生是巴黎第八大学名誉教授兼杭州大学名誉教授，现任法国巴黎公社之友协会主席，是法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这位七旬老人在将近半个世纪的教学研究生涯里辛勤耕耘，出版了《法国社会主义运动（1893至1905年），盖德派》、《从文艺复兴时代到现代社会主义》等上乘之作，尤其以研究法国工人运动史而著称，在国内外历史学界享有盛誉。

译者是怀着崇敬的心情来翻译《简史》的。译事乃是偶然和必然所致。之所以说偶然，是因为这个选题是由我的挚友、中联部党群外事协调局副局长郭庆仕同志推荐而定的。曾记得1986年10月，维拉尔先生应杭州大学之邀来华讲学。译者有幸聆听过先生的演讲，对先生儒尔文雅的学者风度和学术上的真知灼见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此对郭庆仕同志在陪同先生访问之后对我提出的翻译建议是欣然接受的。之所以说必然，是因为译者近年来对法国史颇感兴趣。法兰西民族是一个英才辈出、群星灿烂的伟大民族。法国史是一部富有政治斗争教益的、典型的文明发展史。译者有志于学习研究

和翻译法国的政治、历史和文学，愿意为此竭尽毕生之精力。正是由于上述两个缘故，翻译《简史》这个选题象磁铁一样深深地吸引了我。在耽搁了三年之后，终于在去年初开译，直到去年底定稿，才算了却了我和郭庆仕同志的一个宿愿。

《简史》中译本三易其稿，断断续续译了一年，确实获益匪浅。首先是粗知了一些有关法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史的知识，尤其是两个世纪以来社会主义运动中出现的主要人物、重要思潮、政党组织、基本分歧、派别斗争等。其次是丰富了法译中的实践经验，认识到在翻译实践中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外语和本族语的矛盾，既要避免主观片面性（宁顺而不信），又要避免机械的唯物论（宁信而不顺），只有这样才能使忠实原著和准确表达尽可能达到完美的统一。第三是明确了进一步加强基本功的必要性，认识到译无止境，要象敬爱的周总理生前谆谆教导我们的那样，学点马列主义和毛主席著作，练好政治思想基本功；通过大量的听说读写译，练好外语本身的基本功；学习一些国际知识、中外历史、地理和自然科学等，练好文化知识的基本功。总之，必须扎扎实实地打好基本功，要锲而不舍，持之以恒。

《简史》中译本即将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这在中国出版维拉尔先生著作方面尚属首次。其重要意义不仅在于为我国译介法国社会主义运动史填补空白，而且在于促进中法两国之间的文化学术交流，并推动中法两国人民之间友谊的发展。值此巴黎公社诞生120周年之际，谨祝维拉尔先生的代表作《简史》早日问世，并以此作为对先生七十寿诞（1992年5月）敬献的一份薄礼。

在《简史》翻译出版过程中曾得到不少朋友的恩惠。

现借此后记，谨向他们致以由衷的感谢！这里，尤其要感谢维拉尔先生在百忙中为中译本欣然撰写的序言，感谢郭庆仕同志拨冗审读译稿，不辞辛劳为《简史》撰写的前言；感谢北京大学教授、中国法国史研究会会长张芝联先生的关怀指教；感谢中共中央党校办公厅秘书王海光同志真诚帮助；感谢中央党校出版社总编室副主任王杰同志以及责任编辑宿华同志的热情支持和通力合作。

最后，承蒙敬爱的老学长、中共中央委员、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薛驹同志以奖掖后生的精神热情为拙译的《法国社会主义简史》中译本题写书名，谨致以深切的谢意！

曹松豪

1991年9月写于

北京紫竹院

封面
前言
目录
正文